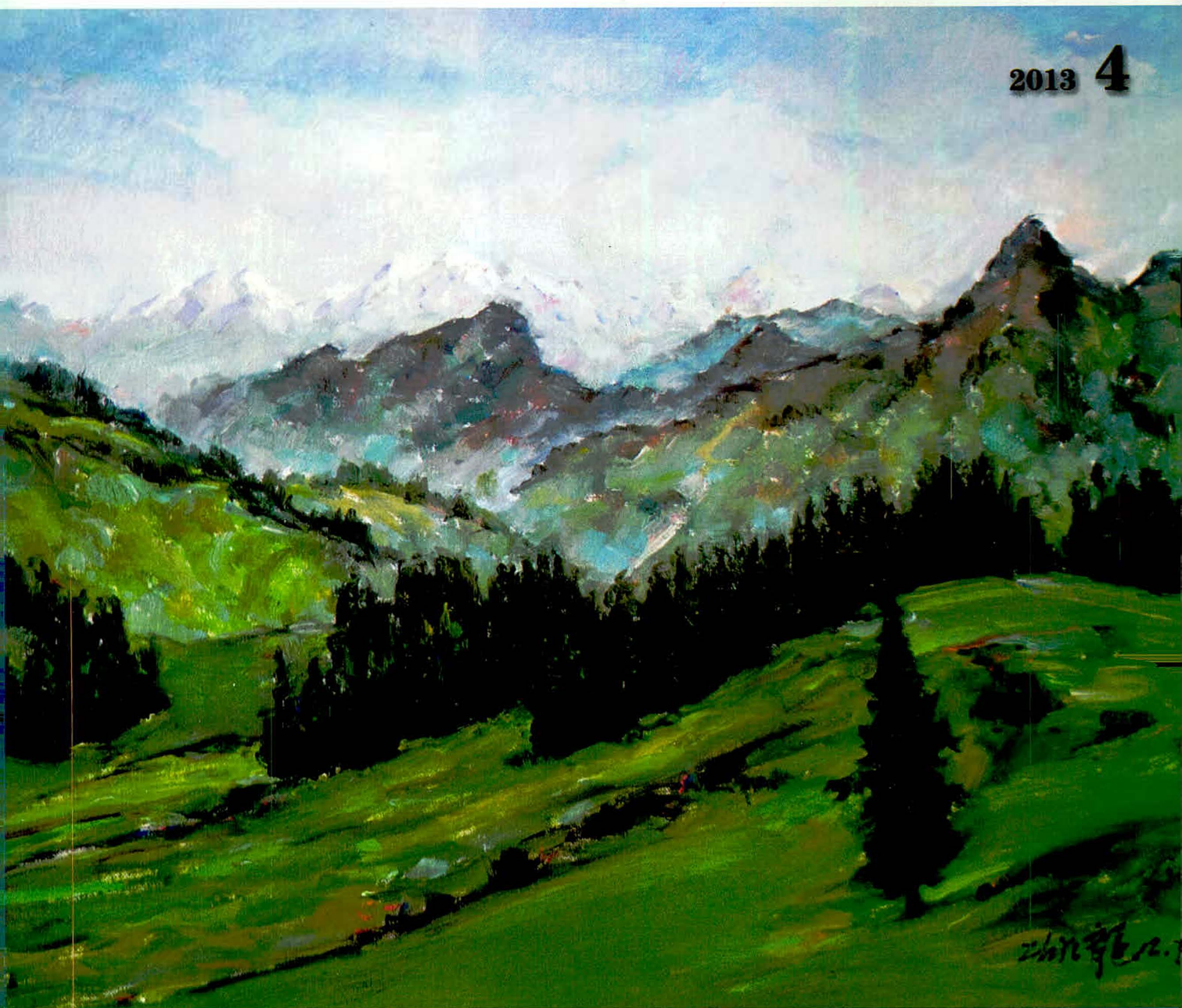




甘肃史志

2013 4



甘肃省地方史志办公室编



省地方史志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李虎（左四）在崇信县检查考核

为全面考核省政府与市州政府签订的2013年度地方史志工作目标责任书完成情况，同时检查省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地方志工作的意见》的贯彻落实情况，12月3日至20日，省政府办公厅会同省地方史志办公室分四个考核组，分赴14个市州听取汇报，现场查看、深入市县抽查，对全省各市州2013年度地方志工作进行了全面考核。



省地方史志办公室副主任车安宁（右三）在武威市检查考核



省地方史志办公室副主任李振宇（右四）在天安市检查考核



省地方史志办公室副主任孙奇明（左二）在和政县检查

我爱写春联

钱旭

每逢过春节,我都想过一把写春联的瘾。

我写春联,是从上小学开始的。当时正值“文革”,我家被迫迁到一个偏僻山村。记得上五年级那一年的大年三十,家里来了很多人,拿着红纸,请我写对联,说村上唯一能写对联的老先生病了,写不成了。我说我不会写,大家鼓励说,贴对联就是图个喜庆,写不好没关系。我推辞不过,就拿出写大楷用的毛笔和砚台,研好墨,战战兢兢地开始写了。我不知道写啥,好在那时候到处都有大字报和大幅标语,我就把它写下来,比如“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就当一幅对联,再比如“阶级斗争天天讲,祖国山河处处红”“斗私批修闹革命,愚公移山夺丰收”等,再配上“普天同庆”“喜迎新春”等横批。写出的字歪歪斜斜,实在难看。即便这样,也使大家过了一个有春联的年,由此,大家亲切地称我为“小先生”。从那年开始,以后各家各户的春联都由我来写,一直写到高中毕业。开始时,我诚惶诚恐,怕人笑话,后来就有了成就感,还很自豪。山里的父老乡亲很朴实,过年期间,各家都要请客,一般都是请大人,但各家都要把我请上,对我给他们写春联由衷地感激。

高中毕业后,我到更为偏僻的子午岭林区当了两年民办教师,那里方圆几十里的春联理所当然地就由我来写了。这时候,我不光是字写得好看些了,而且也不再写政治口号了,写的都是诸如“爆竹声声辞旧岁,红梅朵朵迎新春”“天增岁月人增寿,春满乾坤福满门”等喜庆祥和的内容。有时候,还根据各家的具体情况,自编一些对联,大家看了很是高兴。

后来进城工作了,有好多年没写春联,因为这时候大家都习惯到街上买,包括我自己家里也不写了。有一年腊月回到老家,到一位堂兄家串门,看到堂兄在写春联。我这位堂兄自幼练习书法,虽是农民,但书法功底相当好,多次在县上、市上的书法比赛中获奖。堂兄把对联写好,让孩子拿到集市上去卖。这又勾起了我写春联的瘾,于是也拿起笔写了起来。堂兄写的是楷书,工工整整;我写的

是草书,花里胡哨卖的时候,很多人不懂书法,看到我写的龙飞凤舞,就一窝蜂地买。我明知自己写得不好,还在堂兄面前表现得洋洋得意,自夸超过他了,讽刺他这书法家是怎么当的?奖是怎么得的?逗得大家哈哈大笑。

儿子五岁那年,我把堂兄的孩子卖春联的事情讲给儿子听,想启发他卖春联。儿子果然听话,说:“老爸,你写吧,写好我出去卖。”我喜出望外,赶紧买来笔墨纸砚,写了很多,儿子卖了三天,居然卖了上千元。后来儿子上了小学,说啥都不出去卖了,我也就没再写。

前年腊月二十九我走亲戚,看到一位老先生在小区院子摆了一张桌子写春联,边写边卖,我就凑到跟前看了很久,想写又不好意思。老先生看了看我说:“手冻的不行了,你帮我写一会吧。”我说:“那我试试吧,我写的卖不出去你别怨我。”于是就提笔写了起来,居然也能卖出去。我从中午一直写到下午六点,直到家里打电话叫吃饭才放下笔,着实过了一把写春联的瘾。

去年腊月,我特别想再过过写春联的瘾,于是对儿子说:“上街买些红纸,今年咱们家的春联我要亲自写。”儿子坚决反对,说:“写啥呀,我直接把写好的买回来不就得了。”弄得我没写成。走到街上,看到有很多写春联的摊点,我走到一个摊点前,对写字的老先生说:“我写两幅,写坏了我自己买走。”老先生把笔递过来让我写,我写了两幅,老先生连声说“好”,让我继续写。我正写得起劲,没料想遇到一位同事来买春联,看到我在写,以为是我在摆摊,骂我“是缺钱花还是闲得慌?丢人显眼的。”把我拉走了。

小小春联,由“口号”回归“文学”,由“写着贴”变为“买着贴”,体现了时代特征,反映出社会变迁。爱写春联的情结,包含着对儿时的怀念、对生活的期望,包含着浓浓的亲情友情乡情,包含着热爱中国传统文化的情怀。写春联,使我爱上了书法绘画,也爱上了作诗填词,虽然水平不高,但我用它来陶冶情操,修养身心,何乐而不为?



甘肃史志

季刊

2013年第4期
(总第16期)

(史志资料 免费交流)

甘新出连续性内部资料
准印证 G01—0098 号

卷首语

我爱写春联钱旭(1)

文件选登

张掖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地方志工作的意见 (4)

天水市志编辑部和天水年鉴编辑部组建方案(6)

志鉴编研

年鉴的起源及发展概况李振宇(8)

谈谈地方志的整理和研究

——以《肃镇华夷志》为中心高启安(14)

专业志编写质量亟待提高阎晋平(19)

浅谈新一轮区志编纂如何突出地方特色杜小军(20)

工作论坛

县区级二轮志书编修面临的问题及对策徐鹏(22)

推动地方志事业转型升级之管见朱克雄(26)

重访舟曲简富绩(31)

史海钩沉

包家寨会议的历史意义与作用高恒祥(34)

“两当兵变”在中国革命史上的重大意义

.....魏泽民 卢立峰(37)

录

特载

是谁最先发现了张掖丹霞地貌 ……………车安宁(42)

陇原人物

中国抗日救国军甘肃第一路军司令

李和义事略贡献及其“叛变革命”辨疑 ……………马廷义(44)

杨志范与“杨诗三百首” ……………王杰(50)

历史回眸

从晋昌到甘州 从太守到囚徒

——乐庭瓌和莫高窟第130窟 ……………夏惠(55)

史地考证

秦长城西起地点——铁关门 ……………潘硕珍 王树勋(60)

北宋岷州和尔川寨考 ……………包孝祖(61)

转载

古代帝王赦天下不赦赃官 ……………(41)

乡土民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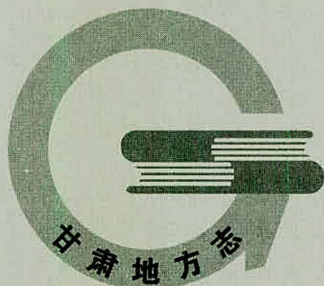
甘州丰富的民间文化 ……………黄杰(65)

解读酒泉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
……………桂发荣 王兰 王霞(69)

简讯

《崇信年鉴(2012)》出版发行 ……………(18)

酒泉市地情信息网建成开通 ……………(59)



《甘肃史志》编委会

主任:李虎

副主任:车安宁 钱旭

李振宇 孙奇明

编委委员:杨东海 李拾良

贺红梅 张正龙

石为怀

主办单位:甘肃省地方史志办公室

《甘肃史志》编辑部

主编:李虎

副主编:钱旭

编辑部主任:贺红梅

责任编辑:梁兴明 陈谦

孔令奇 石战涛

司德芳 高天成

王旭

本期责编:石战涛

联系地址: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广场
南路51号统办一号楼九楼

邮编:730000

电话:0931-8960622

电子邮箱:gsdfz911@163.com

印刷:甘肃省政协办公厅印刷厂

电话:0931-8960384

张掖市人民政府 关于进一步加强地方志工作的意见

为深入贯彻实施国务院《地方志工作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省政府《甘肃省地方志工作规定》(以下简称《规定》)和《甘肃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地方志工作的意见》(甘政发[2013]31号)(以下简称《意见》),充分发挥地方志工作在推动我市文化大市建设、促进经济社会转型跨越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现就进一步加强全市地方志工作提出如下意见。

一、切实提高对地方志工作重要性的认识,明确地方志事业发展的指导思想和目标任务

地方志是全面、客观、系统记述本行政区域内自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历史与现状的资料性文献,是一项重要的文化事业,是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的重要职责。做好地方志工作,对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总结改革开放历史经验具有重要意义,是挖掘、传承和弘扬张掖文化,提升张掖文化影响力、凝聚力的重要途径。做好地方志工作的指导思想是: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全面、系统、准确地记述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就和社会历史的深刻变革。坚持依法修志,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正确处理政治与学术、理论与实践、修志工作与中心工作的关系,为服务宜居宜游首位产业,建设丝路明珠金张掖,实现幸福美好家园梦作出应有的贡献。

按照省政府的要求,结合我市地方志工作实际,今后5年全市地方志工作的总体目标是:坚持党委领导、政府主持、市县区地方史志编委会组织实施、专家参与的工作体制,以“一纳入、五到位”(即把修志工作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和各级政府的任务之中,坚持领导到位、机构到位、经费到位、队伍到位、条件到位)为总要求,基本完成市、县区第二轮志书编纂;全面实现年鉴编纂工作常态化、规范化;完成市、县区地情信息数据库和地情资料展示中心建设任务。

二、全面推进志书编纂工作,确保高质量完成二轮修志任务

(一)及早着手准备,编纂《张掖市志》。编纂《张掖市志》是全市文化建设的一项重要工程,市志办要认真做好篇目制订、编纂论证、进度督促等各项工作;各承编单位要把编纂任务纳入本部门、本单位的工作计划,提供必要的保障条件,力争在今后五年内完成编纂任务。

(二)推进县区修志,确保按时完成。各县区要按照市上的总体要求,确保2015年前全面完成二轮修志任务。要处理好进度与质量的关系,积极发挥地方史志专家的作用,推动县区二轮修志工作顺利开展。市志办要加强对县区修志编鉴工作的业务指导和审查把关。

(三)强化质量意识,争创精品佳志。质量是地方志书的生命,各县区政府及地方志工作部门要认真

执行相关文件规定,在编纂过程中做到资料翔实、内容全面、体例严谨、记述准确、特色鲜明。要建立和完善志书、年鉴质量标准和审定规程,严格执行审定验收制度。要加强对重大问题的审查把关,吸收保密、档案、民政、民族、宗教、外事、军队方面的领导、专家参与审稿,切实把好政治关、史实关、保密关,特别是有关重要人物、民族宗教以及涉外事务方面的政策口径关,确保政治上不出问题,事实上不出差错。

三、认真开展年鉴编辑工作,力争实现一年一鉴

综合年鉴是各级政府的出版物,是编修地方志的基础资料。年鉴编纂工作是《条例》、《规定》赋予地方志工作部门的一项重要工作,是一项涉及全局的系统工程,一个单位、一个环节若不能按期完成任务,都会影响编纂进程。由于部分部门、单位资料报送不及时等原因,我市尚未实现一年一鉴的编纂要求。各县区、各部门、单位要树立全局意识,确定分管领导和专职人员负责此项工作,认真做好材料收集、整理上报工作,确保三年内市、县区年鉴按年度连续出版。

四、创新服务方式,加强地方志资源的开发利用工作

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是地方志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地方志工作部门要牢固树立“修以致用、修用并举”的理念,紧紧围绕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找准地方志工作与经济社会发展的结合点,主动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服务。要重视地方志资源的普查摸底,做好地方志资料和各种文献的征集、整理和归档管理工作,编纂出版地情丛书,为社会提供丰富多彩的文化产品。

将地方志成果数字化、网络化是公共文化服务的重要手段,各县区要把地方志工作信息化建设纳入本级政府信息化建设规划,利用2—3年时间,建立健全市、县区两级地情信息网络。方志馆或地情资料展示中心是服务社会的重要载体,各县区要统筹规划,积极创造条件建设方志馆,在近期内没有条件建设方志馆的,也要建起地情资料展示中心,把各类资料保存好,避免史志资料遗失。

五、进一步健全完善体制机制,形成全社会共同参与支持地方志工作的合力

(一)切实加强领导,提供工作保障。各县区政府要把地方志工作摆上重要位置,不断增强志书“官修”、“官责”意识,切实做到“一纳入、五到位”。各县区政府及机构编制、人社、财政等部门要按照《条例》、《规定》和《意见》要求,从地方志工作部门的职责、任务和地方志事业长远发展的需要出发,合理设置机构编制,配足配强工作人员,不断改善办公条件,足额核定业务经费。要建立地方志工作目标责任考核制度,对成绩突出的集体和个人,给予表彰和奖励;对工作不力的县区和单位,要按相关规定进行问责。

(二)广泛参与配合,注重合力修志。各级党政机关、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应按照所在地政府地方志工作的要求,积极参与地方志编纂工作,并接受当地地方志工作部门的业务指导和督促检查,保质保量按时完成编纂任务。地方志工作部门要加强同高校等学术机构的联系与合作,加强对本地地方志学会等群团组织的指导,形成全社会共同参与支持地方志工作的良好氛围。

(三)加强队伍建设,提高人员水平。市、县区地方志工作部门要进一步加强自身建设,不断增强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意识,着力提高业务素质和履职能力。要通过公开选调、定向培养、进修等多种形式,培养和造就一批具有较高理论素养、较强业务能力的专业人才,打造高层次修志专业队伍。要妥善解决地方志工作者的生活、待遇问题,营造“感情留人、待遇留人、事业留人”的良好环境。广大地方志工作者要发扬兢兢业业修志、严谨刻苦治学的优良传统,大力弘扬淡泊名利、敬业奉献的精神,高标准、高要求做好本职工作。

天水市志编辑部和天水年鉴编辑部 组建方案

为了进一步落实省人民政府与市人民政府签订的《2013—2015年度地方史志工作目标管理责任书》和2013年全市地方志工作会议确定的目标任务,全面推进《天水市志》(1985—2010)和《天水年鉴》的编纂工作,使全员参与修志编鉴,实现地方志资源的优化配制,特制订天水市志编辑部和天水年鉴编辑部组建方案。

一、组建原则

(一)坚持众手成志(鉴)原则,全员参与市志和年鉴编纂,体现人人肩上有担子,个个工作有目标。

(二)实行市志办专职人员与社会聘请兼职人员相结合。

(三)实行编纂项目个人申报制和承编承诺制。

(四)实行地方志资源的优化配制,使编纂项目与个人署名、评奖、晋升、使用配套经费和补助相结合。

(五)集中时间,集中人力,整体推进志鉴编纂。

二、机构组建

(一)在市志办机关内部通盘组建市志和年鉴两个编辑部,开展市志和年鉴编纂工作。

(二)所有参与申报市志和年鉴编纂的市志办机关人员进入两个编辑部,市志编辑部同时聘请社会兼职人员为特邀编辑和工作人员参与市志编纂。特邀编辑和工作人员主要由以下人员组成:

- 1.熟悉志书编纂的市、县区离退休人员和已完成部门志编纂的在职主笔人员。
- 2.有相当社会、工作阅历和专业研究能力,热爱志书编纂但不熟悉编纂规则的人员。
- 3.有资料收录、整理能力,毕业待就业的大学生。

(三)市志编辑部下设市志编辑部办公室,设在市志编纂科,年鉴编辑部下设年鉴编辑部办公室,设在年鉴工作科,科室负责人兼任办公室主任。

三、工作职责

(一)编辑部工作职责

1. 市志编辑部主要负责《天水市志》(1985—2010)的编纂工作,年鉴编辑部主要负责每一年度《天水年鉴》的编纂工作。

2. 编辑部根据编纂工作进度,定期不定期召开编辑部会议,部署安排编纂工作,听取编辑人员工作汇报,议定重要编务事项,协调推进编纂工作。

(二) 编辑部办公室工作职责

1. 负责制定市志和年鉴编纂工作计划、工作措施,搞好编辑部会议会务工作,督促落实编辑部会议议定事项,负责编辑部会议记录和有关材料的整理。

2. 负责了解并掌握各责任编辑和特邀编辑编纂工作进度,定期向编辑部汇报编纂工作进度、问题和经验。

3. 编辑部办公室主任全面负责办公室工作,并负责向编辑部汇报工作。

(三) 编辑和特邀编辑工作职责

1. 按照承编承诺书所确定的任务、质量及时限要求,完成编纂工作。

2. 按编辑部部署安排和地方志业务规范,全面负责承编任务的篇目细化、资料搜集、志稿编纂和修改工作。

3. 充分发挥专长,不断优化工作方案,博采众长,努力提高编纂水平。

4. 遵守地方志职业道德,认真钻研地方志业务规范,继承并发扬修志的优良传统,保持良好学风和工作作风。

四、运行机制

(一) 科室职责与编辑部职责相结合,市志编纂科具体起草市志编纂初步提纲,年鉴工作科具体起草年鉴编纂年度提纲。

(二) 编辑部实行编纂项目个人申报制。根据初步提纲,分别由机关全体人员根据市志和年鉴编纂立项情况具体申报志书编、章、节和年鉴类目承编项目,做到个人申报与编辑部研究分配相结合,使编纂项目任务具体到人。

(三) 编辑部实行编纂项目承编承诺制。根据编纂项目分解情况,由承编人员签订志书和年鉴承编承诺书,明确工作目标和任务、完成时限、工作要求,实行篇目细化、资料搜集、志稿编纂和修改承编专人负责制。

(四) 按满负荷工作的原则,参加年鉴编辑部的机关人员可根据年鉴编纂工作量大小,适当申报志书编纂项目。

(五) 市志办机关人员在规定时间内,不申报项目,且不参加市志编辑部和年鉴编辑部者,原则上不予署名,不评奖,不推荐提拔,不使用相关配套经费和补助。取消福利,补给聘用人员。

(六) 聘请的特邀编辑和工作人员,未按承诺书确定的要求,完成阶段性工作目标者,视为放弃,终止工作,另行聘请。

年鉴的起源及发展概况

李振宇

年鉴的雏形是历书,现代形式的年鉴始于欧洲,它是工业社会的产物,迄今已有500多年的历史。本文拟从年鉴的起源、年鉴在海外发展的概况、年鉴在我国发展的概况等方面做些探讨和介绍。

一、年鉴的起源及其在海外发展的概况

1. 年鉴的起源 年鉴的一个重要源头是古代历书。古代历书是人们用来记录天象(含天文、气象)及其对天象进行祭祀、占卜等情况和事物的文献,是人类认识和把握天象的重要工具。迄今在国外发现的古历书最早形成于公元前13世纪,是埃及国王拉美西斯二世(公元前1290年—前1223年)在位时编写的一本古历书,现存于大英博物馆。它用古埃及的文字、符号对年、月、日的天象进行了记述,用红黑两色来占卜预测吉凶。我国是个农业古国,据史书记载,我国在公元前21世纪就有夏历,有人认为在黄帝时就有黄帝历、颛顼历等。但据专家学者研究考证,最早传入欧洲的历书不是古代中国的历书,而是古代中东的历书。

那么,历书究竟是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演变为年鉴的?据1907年德国出版的《梅耶大辞典》说:“从16世纪开始,欧洲的年鉴才逐年出版。从17世纪起,才在天文气象资料之外加上各种情况报道”。这里讲了“逐年出版”,“各种情况报道”这两点,而这两点也正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现代形式上的年鉴的基本特征(年鉴的定义就是以全面、系统、准确地记述上年度事物运动、发展状况为主要内容的资料性工具书。由这一定义可知,辑辑上一年度的重要时事、文献和统计资料,按年度连续出版是年鉴的两个重要特征),也是对历书演变为年

鉴的重要标志的明确记述。并且,从目前已发现的、最早的现代形式上的年鉴的实例——1534年编辑出版的《英国法院年鉴》。因而,大多数专家学者认为现代形式上的年鉴应是从16世纪开始。

那么,为什么历书会在16世纪时,会在欧洲逐渐发展演变为现代形式上的年鉴呢?这是由于当时,欧洲文艺复兴在13世纪兴起发展后,到了16世纪极大的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社会科学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日新月异,人们产生了对新知识、新技术、新信息的迫切需求。特别是商品生产的社会化,资本对国内国际信息的需求日益迫切,信息成为商品经济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条件。作为信息载体的年鉴便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而发展,并随着各门学科的发展、分化,种类越来越丰富,分类越来越细密,功能越来越多样,远远超出天文、气候和一般的生产、生活知识的范畴,逐步成为记录许多专业学科的年度进展的资料性出版物,成为社会进步和科学发展不可或缺的工具书。所以说,年鉴是工业社会时代的产物。或者说,农业社会需要历书,工业社会需要年鉴。这也是历书与年鉴区别的重大标志。

但是,对年鉴到底起始于何时,目前学者有不同的意见,国内有文章说,年鉴始于公元前13世纪的古埃及。这个结论是站不住脚的。因为那时中国的造纸术还没有发明出来(中国的造纸术在西汉时期已有,公元105年,东汉时期的蔡伦进行了改进),古埃及当时用的是泥版,在这种情况下,不可能逐年出版,而内容也仅限于天象。因此那时的书是历书,不是现代形式上的年鉴。

还有学者认为,在1292年时英国罗杰尔·培

根(Roger Bacon, 1214~1294)曾编纂过一部年鉴(Almanac),说它是欧洲年鉴之始。实际上经考证,罗杰尔·培根只是用了年鉴这一词汇(Annalac),并没有编过年鉴,这可由1920年出版的《大英百科全书》中罗杰尔·培根的词条为证,这一词条说罗杰尔·培根编辑的是历书,不是年鉴。

还有学者认为,1475年,德国天文学家、数学家雷乔蒙塔努斯,编写并印刷出版了一部年鉴,据《大英百科全书》对雷乔蒙塔努斯的词条的记述,说他编的这部书是《航海历书》,发表于1474年。据哥伦布航海日记载录,他和他的航海助手正是凭借该年鉴中的一张天文图表而发现了美洲新大陆,这一记载,也说明了这部书是历书而不是年鉴。

2. 年鉴在海外发展概况 纵观海外年鉴发展的历史概况,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即初创阶段、形成阶段、发展阶段、多元化、信息化、无纸化发展阶段。

现在,简要介绍一下这四个发展阶段。

(1) 第一阶段,从16世纪英国创刊的《英国法院年鉴》(1534年)到18世纪中叶(1731年),是年鉴的初创阶段。这一阶段,英、法、德、意、美等国出版了大量年鉴,如1636年法国出版的《列日年鉴》(Almanach Liegeoi),这是法国的第一部年鉴;1639年美国出版的《新英格兰年鉴》(An Almanack for New England for the Year),这是美国最早的一部年鉴;1679年德法合编的《巴黎外交年鉴》等。这些年鉴的内容从偏重对天象的记述、向综合反应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科学等多方面发展,内容十分丰富,形式灵活多样,人们对年鉴的编撰十分重视。年鉴的地位十分高。如英国年鉴的出版,当时要由英国女王特批。

(2) 第二阶段,从18世纪中叶(1732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1914年),是年鉴的形成阶段。这一阶段,年鉴发展的中心从英国扩展到美国,年鉴在美国发展十分迅猛,品种十分多,如美国当时就有2000多种年鉴出版,出现了一些至今仍具有重要影响的综合性年鉴。例如:美国在1868年创刊的《世界年鉴》,现在是美国最畅销书之一,是图

书馆和家庭必备图书,据说销售量仅次于《圣经》,到1990年,其累计销售量已达5400万册。英国在1869年创刊的《惠特克年鉴》至今仍是英国综合性年鉴的佼佼者。这些年鉴已成为欧美各国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化发展的忠实记录者和颇为珍贵的资料库。

(3) 第三阶段,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到1979年,为海外年鉴的发展阶段。随着第一次工业革命(蒸汽时代)的完成,在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后,年鉴迎来了大发展阶段,许多主要年鉴继续出版,又新创刊了一批重要年鉴,如《美国百科年鉴》(美国,1923年创刊)、《不列颠百科年鉴》(英国,1938年创刊)、《欧罗巴年鉴》(英国,1926年创刊)、《朝日年鉴》(日本,1924年创刊)、《日本都市年鉴》(日本,1931年创刊)等。第二次世界大战(1939-1945)后,英、美、德、日等国年鉴的发展又进入一个新阶段。特别是日本的年鉴,在这一时期尤为突出。日本是明治维新以后才开始传入年鉴,但引入后发展极其迅速。据统计,从1939年~1964年这25年间出版的年鉴就有2774种之多,人均拥有量已高于美国。日本还称得上是最善于利用年鉴的国家之一,不仅各县都有自己的年鉴,而且许多大工厂、企业也有自己的年鉴;不仅在政治、经济、科技、文化、教育各领域有年鉴,在各个行业也分门别类地编辑专门年鉴,如在食品工业方面,连调味品、红肠之类也出专门年鉴,还有家具、汽车、超级市场等年鉴,名目繁多。

(4) 第四阶段,从1980年以来,为海外年鉴发展的多元化、信息化、无纸化阶段。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世界年鉴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尤其是中国年鉴奇迹般的发展和信息化时代的到来,促使世界年鉴进入到多元化、信息化、无纸化阶段。这一阶段的特点主要有:一是年鉴的种类越来越多,内容越来越丰富,不但许多国家编辑出版综合性和专业性年鉴,不少国际性的机构也出版各类年鉴。如联合国有《联合国年鉴》《联合国司法年鉴》《人权年鉴》《国际教育年鉴》《贸易年鉴》《联合国统计年鉴》;世界卫生组织有《世界卫生统计

年鉴》;世界粮农组织有《谷物统计年鉴》等。二是名牌年鉴越来越多,如美国除历史上著名的《世界年鉴》《老农夫年鉴》外,又涌现出许多名气较大的年鉴,如1923年创办至今的《美国百科年鉴》、1938年创办至今的《不列颠百科年鉴》,1975年创办至今的《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年鉴》等。英国除著名的《惠特克年鉴》外,还有1826年创办至今的《政治家年鉴》、1926年创办至今的《欧罗巴年鉴》、1961年创办至今的《世界大事年鉴》,以及《简氏武器系列年鉴》等。日本有1919年创办至今的《每日年鉴》、1924年创办至今的《朝日年鉴》、1949年创办至今的《读卖年鉴》、1949年创办至今的《时事年鉴》等。三是无纸化年鉴问世。从光盘到电子年鉴、网络年鉴,发展势头十分迅猛,现已与纸质年鉴共分天下。

3. 海外年鉴的特点 纵观海外年鉴五百年的发展历史,可以看出以下七个特点:

(1) 年鉴是工业社会的产物,它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发展,其发展中心也随着经济发展的中心转移而转移。从其发展历史来看,其中心首先从英国开始,向欧洲大陆移动,接着向美国移动,接着向多中心发展,目前形成了美国、欧洲、日本、中国多个中心。

(2) 海外年鉴不是靠政府财政编修的,非官书性质,要通过市场竞争,来维持生存。

(3) 海外年鉴编纂的内容与定位牢牢紧扣读者的需要,为读者提供准确有用的信息和资料。如《威斯康星州年鉴》的定位是:这本年鉴是祖父母们从中寻找实践和智慧的有益娱乐,是工匠和家庭主妇获得各种信息的源泉。海外年鉴在强调信息资料性的同时,以年鉴的历史传承为亮点,吸引读者的眼球。由于海外年鉴的非官书性质,在内容的选取上也会因为本地的特色而有所调整,甚至是偏向和偏好。如《加利福尼亚州年鉴》内容主要是介绍该州的州情,并加之“最酷的学校”、“书店”、“州情智力试题”等篇目,还列举“加利福尼亚”为标题的BBS论坛,以方便学生的生活。

(4) 海外年鉴的时效性非常强,一般都在当年的11月底就能出版,当然内容的涵盖时间也有

所调整,上溯上一年的11月至当年的11月。而标题却以下一年的时间编序。如2011年11月出版的《世界年鉴》,涵盖时间是2010年11月至2011年11月,卷号为2012卷。

(5) 海外年鉴的内容一般都由固定内容与年度内容结合而成。所以在每本年鉴中,都有一部分内容是固定的,比如美国的年鉴,就载有历史、历书、历史上的今天等固定内容。年度内容在突出时间性,重视对本年度大事要事的报道。

(6) 摒弃古板的文字,采用新闻化、文学化的叙述风格,以增加年鉴的吸引力、可读性。例如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年鉴》,在介绍各类渔船时,就采用一段诗歌的形式来描述当地人民对于船的热爱。同时,海外年鉴在编排形式上,也采用了十分新颖和灵活的方式,如在编排形式上,不囿于黑白两色的窠臼,大胆使用色彩,封面设计有些突出地方特色,有些使用撞色的色块以吸引读者的注意力;内页设计多用图文混排,并使用不同颜色标明不同的内容,区分各栏的同时也凸显了重要文字和表格。如日本的《大阪统计年鉴》,该页是介绍大阪本地农业特产,不仅使用漫画的手法在日本地图上标出了相应的农业特产,在右面更是用照片的形式列举了当地的特色蔬菜和花卉。对于不是很了解农业的人来说,这样的方式既一目了然又能增加自己的相关知识。

(7) 海外年鉴一般定价不高,大都在10美元至20美元之间,但发行量比较大,在出版时,还附带出版各种各样的副刊和衍生产品。其主要原因是,因为海外年鉴,没有政府财政拨款的经济支持,也不允许做内页广告,办刊经费的来源主要靠年鉴的发行收入。例如,每年《世界年鉴》在出版的同时,都会附带一本《儿童版世界年鉴》,从内容体量到装帧设计都极尽可能地迎合少年儿童心理。封面会印有当年的具有巨大影响力的年轻人的照片,比如美国著名选秀节目“美国偶像”的冠军。正文内容形式也不仅仅是表格和文字,多以答题形式出现,寓教于乐。据称美国小学生在开学时,每人都会得到一本儿童版的年鉴,对于他们这既是一本工具书式的百科全书,也是了解国情地情的

最好教材。对家乡和祖国的热爱,浓缩在了这一本小小的年鉴里。

二、年鉴在我国发展的概况

纵观年鉴在我国发展的历史,大致可分为四个时期。

1. 第一个时期,大致为1864年到20世纪初。据上所述,年鉴是由历书逐步扩充内容,最后发展成为年度性工具书的,也就是我们所称的年鉴。它起源于16世纪文艺复兴时代的欧洲,迄今已有500多年的历史。年鉴传入我国,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洋务运动”、“以夷治夷”、“西学东渐”之风,作为“舶来品”传入中国的。但是,对这一说法,国内学者有不同看法。第一种观点认为,我国是世界上最早有历书的国家,早在宋代编写的《宋史》卷二百六《艺文五》中就有“年鉴一卷”的记载。据此,有的学者认为,我国年鉴编纂起源于宋代;第二种观点认为,《宋史》这本书已失传,其内容现今已无法考证,不能因有年鉴一词就望文生义(就像高尔基(原苏联)在1916年~1918年创办过名为《年鉴》月刊,这是一个政治性、文艺性刊物,即名为年鉴,但不是年鉴性质的刊物。一些文章和书籍还宣称马克思、恩格斯都曾为《德国年鉴》写过文章,说马克思还曾主编过《德法年鉴》,以此强调年鉴的光荣历史。事实上,《德国年鉴》和《德法年鉴》都是哲学类人文杂志,既不是年鉴类工具书,也不是年鉴方面的杂志。还有人说,年鉴界有法国年鉴学派。殊不知法国年鉴学派是一个历史学派的名称,不是年鉴界的理论学派。1757年日本创刊的《古今净琉璃剧目年鉴》被误称为日本第一部年鉴,据考证事实上它是一本古典音乐剧目的选集,即名为年鉴,却不是年鉴方面的书籍。《宋史》到底是不是一部年鉴,一定要按其内容才能确定,现在这本书已失传,书中的内容无法确定,很难说它就是我国的第一本年鉴,也很难断定它是否与现代形式上的年鉴名副其实;第三种观点认为,该书的内容可能与天文占卜有关,与我们现在讲的年鉴无关,《中国大百科全书》关于年鉴这一词条的表述,就采用了这一观点。

从1864年开始到20世纪初这一时期,年鉴的

发展大致有四种类型:一是外国人在中国创办的类似年鉴的年刊、年鉴。如清同治三年(1864年)创办的《海关中外贸易年刊》,是由当时把持中国海关大权的海关总税务司主办,这是一个洋人掌权的机构。这是中国现代年鉴的先驱,被认为是中国最早出现的年鉴性质的工具书,它一直出版到1948年才停刊。二是外国人用外文出版的有关中国内容的年鉴。1912年日本在东京出版日文的《第一回支那年鉴》。同年英国在伦敦出版英文的《中华年鉴》。三是我国知识分子通过翻译国外年鉴而摘编的世界年鉴。清宣统元年(1909年)7月奉天(今沈阳)图书馆出版的《新译世界统计年鉴》,内容是世界各国1907年统计资料。这是我国最早编译出版,也是第一部现代意义的年鉴。四是我国出版机构和个人编辑的各类年鉴。1913年,上海神州编译社出版的《世界年鉴》,这是一部综合年鉴,主要反映世界各国的历法、天象、地理、文化、教育、军事、经济、工农业生产、交通运输、风俗习惯等。内容较简略,资料不够新,但对中国人当时了解世界起了重要作用。这是最早由中国人自行编辑出版的第一部年鉴。

2. 第二个时期,大致为20世纪初到40年代。这一时期,中国年鉴出版数量逐年增多,内容涉及经济、统计、财政、金融、内政、外交、司法、劳动、教育、图书、文艺、电影、美术、卫生、交通等各个方面。据统计,从20世纪初到20世纪40年代末的大约50年时间里,我国编辑出版的各类年鉴总数约有200多种,其中,影响较大的是1924年商务印书馆组织编纂出版的《中国年鉴》。这是一本综合性年鉴,内容分为土地人口、政治军事、财政金融、交通水利、农业商业、教育、宗教等类,并对各种典章制度的沿革和近况加以简要说明,篇末附有多种资料。全书统计资料约占全书篇幅的三分之二,到1928年,共出四册。上海《申报》年鉴社编辑出版的《申报年鉴》,1933年创刊,为综合性年鉴,出版到1936年,还有1942年本,共出5册。其中综合性年鉴11种,地方性年鉴26种,专业性年鉴30种,统计性年鉴12种。这一时期由于受政局变动、编纂经费短缺等诸多因素影响,年鉴的编纂出版很不正常,大多数只出版了一两期就

夭折了。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在1927—1937年,是南京国民政府的黄金十年,在这十年中,年鉴编纂工作也出现了一个热潮。10年里,至少创编了104种年鉴,平均年创刊10种之多。这一时期,比较有名的年鉴有:1933年8月由上海现代书局出版的《中国文艺年鉴》,1933年由上海《申报》年鉴社编辑出版的《申报年鉴》,1934年5月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教育部编纂的《中国教育年鉴》,1936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英文中国年鉴》。

3. 第三个时期,大致为新中国建立后到70年代末。这一时期,虽然我国的出版事业发展很快,30年间全国一共出版图书48万多种,但年鉴出版的品种却屈指可数。这一时期出版的年鉴有1950年天津进步出版社的《开国年鉴》,这是建国后第一部综合性年鉴;1950年大公报社创办《人民手册》,从1950年逐年出版,一直出到1965年,这是不以年鉴命名的年鉴,这本年鉴内容丰富翔实,为综合性年鉴,是中国年鉴史上一部重要年鉴。1953年世界知识出版社创刊的《世界知识年鉴》只出版了一、二期的《中国摄影年鉴》和《中国体育年鉴》。“文化大革命”期间,这5种年鉴全部停刊,仅有科学出版社于1973年翻译出版美国的《科学年鉴》1种,我国年鉴事业出现了长达15年的空白,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年鉴事业才迎来了灿烂的春天。

4. 第四个时期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到目前。1979年11月,邓小平在接见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出版公司编委会副主席吉布尔时,对陪同接见的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第一任总编辑姜椿芳说:“编辑出版年鉴,很有必要,这是国家的需要,四化建设的需要”。基于此,自1980年的《中国百科年鉴》创刊开始,中国的年鉴事业进入到一个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快速发展时期。据统计,截至2011年年底,全国各类年鉴约有2555种,17198部。

纵观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年鉴的发展,主要有以下五个特点:

1. 数量急速增长,品种基本齐全。就专业年鉴而言,大多数社会经济文化部门、行业都有自己的年鉴;就地方年鉴而言,全国所有省级行政区域

都有综合年鉴,大多数地级行政区域和几百个县级单位都有自己的综合年鉴。近几年,年鉴品种细分化的趋势更加明显。大型企业和著名院校、科研机构也在大办年鉴。

2. 内容严肃、健康,社会效益好。绝大多数年鉴由政府、政府部门、行业组织以及企业院校科研机构主办,属于“官书”的范畴,私修民办极少,因而年鉴的内容严肃、健康,权威性强,社会效益较好,发挥了应当发挥的作用。

3. 注重年鉴学术理论研究。我国新时期年鉴事业一开始就特别注重理论研究,先是引进、学习、借鉴国外年鉴理论成果和其他学科的成果,后来逐步向构建独立的“年鉴学”体系的方向发展。我国年鉴从业队伍是一支善于学习,勇于钻研的队伍,学术研究的气氛很浓,成果层出不穷。

4. 出现集团化、数字化、网络化趋势。进入21世纪,我国市场经济的框架已经基本建立,各级政府的体制、功能与管理方式正在发生深刻变革,社会信息化程度迅速提高,以计算机和网络为基础的信息技术的发展,正在改变着人们寻求、处理、接受和传播信息的思维与习惯。在这样的背景下,过去20多年年鉴界形成的编纂体制、思想、方法、工艺的固有模式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为顺应社会信息化趋势,年鉴界自觉而又迅速地走上了数字化、网络化的道路。在编纂工艺、方法方面,年鉴界普遍运用了信息技术,有些单位还实现了网上编纂。越来越多的信息技术成为年鉴工作的有力工具,工作效率和编校出版质量都得到了提高。在年鉴信息传播方式方面,很多年鉴出版了光盘版和网络版。

5. 创新成为年鉴发展主流。20世纪末一些年鉴工作者鉴于当时年鉴出版工作受到体制限制和市场化浪潮的冲击而陷入僵化的实际情况,提出年鉴改革创新的主张。经过这些年的发展,创新成为近几年年鉴界发展的主旋律。

三、简要介绍中外年鉴发展史上比较有影响的几本年鉴

1. 美国现存最古老的年鉴——《老农夫年鉴》。这部年鉴创始于1792年,至今已有219年的

历史。其间虽历经两次世界大战,却仍坚持每年定期连续出版,从未间断。在该年鉴创办的第二年,即1793年,其发行量就猛增了3倍,从3000册增加到了9000册。这部年鉴的受众非常明确:主要为海边的人们提供潮汐表,为农场的人们提供日出日落表和种植表,为在厨房的人们提供菜谱,为关心天气的人们提供天气预测。现今的《老农夫年鉴》已形成系列产品:有4种区域版本、3种“参考”类刊物和6种“日历”类刊物,依然为美国的民众发挥自己的作用。

2. 美国最畅销的年鉴——《世界年鉴》,这部年鉴在1868年创刊,现在是美国最畅销书之一,是图书馆和家庭必备图书,目前除了在美国发行英文版本之外,还有日本版和意大利文版。《世界年鉴》的发行量非常可观,达8200万册,以美国人口总量考量,平均4个人不到就有1本当年的《世界年鉴》。据说销售量仅次于《圣经》。

3. 英国持续时间最长的年鉴——《惠特克年鉴》这部年鉴创刊于1868年,创始人是约瑟夫·惠特克,因此叫惠特克年鉴。这部年鉴的内容主要为,向读者提供有关天文、地理、历法等知识。如提供有关星座、太阳、地球、月亮、九大行星、日食、月食、掩星、海潮甚至人造卫星等方面的信息,还介绍全球主要的年历,如印度历、穆斯林历、古罗马历等,对中国的农历及十二生肖也有介绍。如2000年的年鉴就注明2月5日为中国新年,即龙年的开始。还结合读者的需求,向读者提供最需要的信息。例如,年鉴简介了英国各旅游景点、博物馆和艺术馆,并提供地址、电话号码、电子信箱、开放时间甚至门票费。出国旅游方面,年鉴提供的信息包括如何申请护照和签证及申请的地点、电话号码、电子信箱及注意事项。在健康顾问栏目中,还说明了去哪些国家需要预防哪些疾病及如何打免疫针等生活琐碎细节,面面俱到。

4. 我国最早以年鉴为名出版的年鉴、同时也是第一部编译出版的海外年鉴——《新译世界统计年鉴》。这部年鉴,是清宣统元年(1909年)7月由奉天提学司图书科科员谢荫昌奉提学司使卢靖之命从日本国统计局长伊东佑谷所编的《世界年鉴》中“世界之部”部分辑译而成,内容取材于

1907年世界各国的统计资料。由奉天图书印刷所印刷,奉天图书馆发行。该年鉴为大16开线装本,统计数据为汉字竖排,多为1906年的情况。全书设各国主权者(各主权国的自然概况)、土地、人口、宗教及教育、财政、国防、产业(经济实力与农业、工业)、商业、船舶及水运、交通、银行及金融等11章,204个分目,1879个版面,约30万字。这部年鉴用大量的统计数据,反映了20世纪初世界上主要国家社会经济各部门的发展情况。为便于国际间的对比,在附录中列有中外度量衡制的比较,各国的货币单位比较和主要国家的货币与中国银价比较。

5. 由中国人自行编辑、最早出版的年鉴——《世界年鉴》。这部年鉴是由上海神州编译社年鉴编辑部编辑、该社发行部于1913年开始出版。内容包括世界各国历法、天象、地理概况、国际关系、文化教育、军事、经济、工农业生产、交通运输等以及各国的风俗习惯。这本年鉴内容比较简略,资料也不够新颖,但对当时中国人了解世界概貌,起了一定的参考作用。

6. 中国学者自己编纂以反映中国情况为内容的综合性年鉴——《中国年鉴》(第一回)1924年2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第一回中国年鉴》(The China Year Book No 1),为32开本,300多万字,标价大洋4块。封面为硬壳纸。除《新著世界史》《世界教育会议之经过》等介绍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新书新刊广告,以及上海四明银行等七页广告之外,全书有2123页。书名《中国年鉴》由时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海外部部长林森所提。《第一回中国年鉴》涉及面较广,全书由六大板块构成,包括土地人口、政治军事、时政金融、交通水利、农工商业、教育宗教。此外,该书设有“二十年来中国大事记”。每个板块,下设若干小节,如“农工商业”,又下置农业、林业、渔牧、矿业、工业、商会、公司、外国贸易和度量衡。这种从大到小等级式的编写结构,使得年鉴编辑思路十分清晰,体例也较为完备,查检快捷便利。

(作者系甘肃省地方史志办公室副主任)

谈谈地方志的整理和研究

——以《肃镇华夷志》为中心

高启安

地方志的作用和价值

古代地方志是一地重要的文化资源和承载者,在今天的文化建设中,其地位越来越彰显,越来越重要。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大国的进程中,地方志的作用尤其不能低估。可否这样说:地方志所承载、记录的地方特色文化信息,正是此地区与他地区文化传承之区别所在。

中国古代的地方志,保存有大量的各种文化信息。这种文化信息,随着认识的深入,会有新的发现和放大。尽管地方志是按照当时人的认识所撰,难免与今日的认识有差别,但不能苛求于古人。如果我们用新的角度去认识,仍可挖掘出许多新鲜的内容。这些内容有历史、人物、语言、地理、沿革、人口及其迁徙、宗教、政治、经济、出产、天文、灾害、艺文、民俗等等。这些,需要科学的整理,但光整理显然远远不够,还需要研究。这种研究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校勘,一方面是校注。校勘就是订正文字,还原来的面貌;校注就是运用已有的知识,予以科学合理的解释。其目的是为读者阅读提供方便,发挥其最大的价值,运用其所有信息。

在社会生活史受到历史学研究重视的今天,方志的价值进一步凸显。如不同地区的方言、服饰、饮食、谚语、民间信仰的价值信息,对于了解地区的文化传承有着正史所不具备的特殊作用。

目前地方志整理中的一些问题

1. 全面搜集整理仍有工作要做

由于资金、认识等问题,对地方志的全面整理尚有许多工作要做。比如,我与郇惠莉校注的《肃镇华夷志》,是河西走廊最早的地方志(除藏经洞出土之地方志外),珍贵的信息非常丰富,即就裕固族以及明代河西走廊中西端民族史、中央政权的民族政策及其实施等,都有不可估量的价值,我

常常称之为裕固族的专史。但长期以来不为人所知。而据我所了解,解放前甘肃各地地方志基本上都重新校注出版了,并为新时期各地文化建设提供了宝贵资料。但尚有许多地方志没有整理,研究更是落后。

比如,在晚清开风气之先的《采访录》或《乡土志》,整理出版者尚少。

据《永昌县乡土志·序》:“戊申(光绪三十四年,1908)……秋九月,上宪札催编辑乡土志。杨公集书吏询之,始知奉文丙午(光绪三十二年,1906)至冬,正前任史公升调之日,接篆者李公铭九。李公以此事未经造入交册,故停阁两年之久。杨公遂责书吏以误事,即可亲造学宫,与雷公商之,因命树桢等采访编撰,限以一月成书。桢自惭鄙陋,何敢修辑?幸赖旧乘俱在,故管窥蠡测,不辞僭妄,征诸古书,询诸父老,有者仍之,无者续之。杨雷二公综括其纲,维剪裁其枝叶于说之,存疑者则削之,于词之稀美者,则汰之,阅月余而事竣。谨遵例目,编成两函,缮写清本,以备採择。”由此可知,各地的《采访事略》《乡土志》等,是光绪末年清政府一次全国范围内修撰地方乡土志的产物。

《乡土志》的采写源于清末维新改革派欲从爱国、爱乡土来激发国民性的一次文化革新举动。

“光绪27年(1901)1月底,清政府在军政、财政、教育等多个方面进行改革,废科举、立学部、兴学堂等措施陆续出台。翌年7月,《钦定学堂章程》(即‘壬寅学制’)颁布,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试行现代意义的全民小学义务教育。‘史学’、‘舆地’是小学阶段规定必修的两门课程。具体要求:初等小学第二学年‘舆地’讲‘本乡各境、本县各境’;第三学年‘舆地’讲‘本府各境’。虽然这时还没有明确提出‘乡土史地教育’的概念,但‘本乡各境、本县各境’,实际已经把乡土史地课程纳入教学内容。

光绪 29 年 11 月,新出台的《奏定学堂章程》(即‘癸卯学制’)对小学乡土史地教育提出明确要求:‘历史,……尤当先讲乡土历史,……令人敬师叹慕,增长志气者。为之解说,以动其希贤慕善之心’;‘地理,……尤当先讲乡土有关系之地理,以养成其爱乡土之心’。”京师编书局制定《部颁乡土志例目》,以学部名义颁发全国试行。

《部颁乡土志例目》像编定教学大纲一样拟定了十五门内容为程式:历史、政绩录、兵事录、耆旧录、人类、户口、民族、宗教、实业、地理、山、水、道路、物产、商务。于是,全国各地,都开始着手撰修乡土志。《乡土志》的内容并纳入小学课程,被认为是终结以科举考试为目的的旧式封建教育、开启近现代新式教育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

这样的乡土志,在我省有十几种,尚未得到科学系统整理。如《永昌县乡土志》《皋兰县红水分县采访事略》《安西采访录》《甘肃巩昌府会宁县乡土志》等等。说明就我省而言,旧志的整理出版尚有许多工作要做。

纵观目前地方志整理工作,目光只盯在县志、府志、省志上,缺乏对地方史志、地方史资料的全面、总括认识。

各地的地方“正史”应当予以整理。但这远远不够。就目前所知,除各地、各县的《志》外,尚有《采访录》《乡土志》《方言志》(如李鼎超所撰《方言》《水道》二志)、民族志(《肃镇华夷志》可列其中)等都需要关注。

如果将范围扩大,地方史料可列如下:

本邑人的著作;本邑碑铭资料辑存;正史中本邑相关资料;本邑人物传记;其他相关志书、资料的隗辑、历代有关本邑的文学作品的隗辑等。

在这方面,凉州先贤张澍先生为我们做出了榜样。其《二酉堂丛书》《凉州府志备考》等,于他史料中辑佚了武威乃至河西的大量史料。不仅保存了史料,也为今人的研究提供了诸多便利。其中对许多史料作了甄别和研究。

就河西而言,明清以来的许多著作都涉及到了河西的历史、地理、民族等。《甘肃镇考图略》(明周一敬撰)、《三镇并守议》一卷(明翁万达撰)、方

孔昭《皇明九边考》、张雨《边政考》、瞿九思《万历武功录》,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张萱《西园闻见录》、嘉靖《陕西通志》,各种游记(陈诚《西域行程记》等)、各种奏章(《皇明经世文编》等)及与河西有关的边事大臣的奏章、文集,如王琼《西番事迹》《北边事迹》各一卷;马文升《约斋集》《马端肃公奏议》《马端肃公三记》《明实录》等。

清代有关著作更多。有清一代,西部边疆烽烟四起,外国列强虎视眈眈,“西北学”应运而生,诞生了许多著作,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肇域志》;梁份《秦边纪略》,祁韵士《蒙古回部王公表传》《西陲总统事略》《西域释地》,陶保廉《辛卯侍行纪》,杨应琚《据鞍录》等。不烦多举。

散见于文学作品中的史料更多。幸而近些年一些有识之士正在做此方面的工作,编选历代吟诵本邑的诗选,如《历代咏陇诗选》等。

除此外,不得不关注由外国人修撰、在国外以其他文字修撰的中国地方志。这就是奇特的《支那省别全志》和《新修支那省别全志》。

说《全志》奇特,是因为它是一部完全是由外国人策划、调查、编纂,用外国语言、在外国出版发行的一部中国地方志书。关于此书,后任日本首相的近卫文麿的《序言》直言不讳:

追求东亚大陆的和平以及幸福和繁荣,应当是我东亚诸民族共同的目标。因而必须依靠东亚各民族的努力,为此,要追求互相帮助(提携,协力),则必先审视大陆的实情。东亚同文会刊行的《新修支那省别全志》的旨趣即在于兹。依据所了解的大陆实情,因而知其所以;依探寻的资源,以图大陆之繁荣。《新修支那省别全志》主要基于实地调查编纂而成,依此可明了大陆的地理、交通、产业、经济、历史、风俗等诸般实况。我深信,寄希望于大陆的繁荣和各民族共存共荣者应从中大有所得。因以此书荐之于公众。于昭和十六年七月十五日东亚同文会会长公爵近卫文麿

时任“东亚同文书院”院长的根津一为《支那省别全志》所作的序言中也毫无掩饰:“我邦于中国政治、经济上有特别重要之紧密关系,自毋庸赘言。况一战结束后,须知中国已成为世界问题之中

心,国人须尽快熟知中国之国情民物。夫深谋远虑者,必在诸事未然时即筹划其善后,不可无备。语曰:凡事不豫则不成;又曰:未雨而绸缪户。事物之经历运用,必先知己知彼,真见敌而矧矢,捕盗而縲绳,固非智者所为。然则今日明确中国之国情民物,岂非我国人之一大急务?独憾缺乏对国情复杂、民物繁错中国研究之良书,是以我邦人士虽位居一苇带水比邻位置,而精通中国情势者甚鲜。”

《支那省别全志》,共十八卷,始于1917年,完成于1920年,主要依据同文书院学生的调查报告所编。分别为广东省、广西省、云南省、山东省、四川省、甘肃省(附新疆)、陕西省、河南省、湖北省、湖南省、江西省、安徽省、浙江省、福建省、江苏省、贵州省、山西省、直隶省。每卷近千页不等,

《新修全志》始于1941年,至1946年,除依据同文书院大学学生调查资料外,还参考了中国出版的各种资料。原打算出22卷,由于日本投降,原出版计划中断,只出了9卷就没再编下去。9卷分别为:四川省(上)、四川省(下)、云南省、贵州省(上)、贵州省(下)、陕西省、甘肃省、宁夏省、新疆省、青海省、西康省。从一些省有两卷分析,《新修》计划更为庞大,篇幅有较大扩充,内容更为详细,资料更为丰富。如《陕西卷》将近1300页。

“东亚同文书院学生在中国国内这样有组织、大规模的调查旅行,不仅在当时的世界上没有先例,即使在今天,由日本人着手进行的海外调查活动中,也仍然可以说是最大规模的。”根据调查所得编辑而成的《全志》可谓第一次以近代科学方法调查而成,所用均为第一手资料。《全志》体例也迥异于以往的方志,深深地打上了近代科学研究方法的烙印。可以说,这是第一部以近代科学方法为指导,在内容、体例、材料选用甚至用语上都开近代中国方志先河的崭新之作。

第一,这是第一部新型志书;体例新,方法新,材料新,内容新。

第二,真实可靠。

第三,详尽细致。

第四,视角不同。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这两部由日本人修撰的

地方志,具有他史料不可替代的重要价值。

2. 对地方史料的研究较为薄弱

如果说地方志的整理和重新出版,经过这些年的工作,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工作,但整理出版中存在的问题也不容忽视。作者(撰修者)、版本流传、撰修背景、特色评价等等,都需要在整理时向读者交代。但目前存在的情况是部分整理校注者,对此都没有作深入细致的研究,使旧志的信息和价值得不到充分揭示。

就学界而言,由于指导思想、课题引导等原因,关注地方文化建设、研究地方志的学者和成果越来越少,研究的眼光大都紧盯所谓的“重大”课题,研究的领域越来越趋同;眼光越来越关注所谓的国计民生,范围越来越窄。只是在研究他项目时偶尔涉及一些地方志材料。基础性的资料以及研究,往往不被重视,得不到经费支持,研究成果无处发表,发表了也被认为是雕虫小技,是地方的小问题。而当今科研成果的评价标准和体系也以所谓的中央、地方来划分,研究地方文史的文章很难登上所谓的中央级刊物,这种认识上的误区和实际存在的不公平,使研究方志和地方史、地区文化的学者越来越少。

方志的研究有两个层次:一是文本的整理和研究;二是内容的研究,是其价值的揭示。整理本身寓有研究,所谓寓研究于整理之中。文本整理是进一步研究之基础;而没有研究的“整理”则不能揭示其价值。前者应该是整理中的必须;后者则是根据其内容的专门论述。

文本的研究,应该包括撰修背景、撰修者、版本流传、记载失误的订正、时间的订正、价值特点的说明、内容的介绍等。

3. 校注整理中有许多需要注意的问题

我们发现,在整理校注中也存在一些问题。

A. 全面整理与节选的问题。改革开放初期,出了一些“节选”的整理方志。由于认识的局限,以为舍弃部分不重要或与当前形势无关,于是随意删节,使令人难以完整利用。除了有尊重原著的问题外,所删节部分未必没有价值。整理应该是全面整理,以保持资料的完整和系统性。

B.繁简体问题。这个问题,不光是地方志的问题,其他古典著作的整理都有这个问题。我认为旧志整理应该使用繁体,繁体保存了那个时期重要的地方使用文字的诸多信息,在文字、方言史上有重要的作用。

C.错讹字的问题。保持原貌,但应该出小注。不能一改了之。

D.避讳问题。缺乏完整、尊重原著的精神,以当前的政治形势来随意删节。其实,这是中国的一大特点,清代开恶劣风气之先。历来相沿,使今人难以应用。

所谓封建糟粕、迷信,民族称谓等。文革后期,鉴于当时形势,在校注出版地方志时,对所谓的“封建糟粕”、“迷信”等内容随意删节、打叉,使方志的价值大打折扣。古代确有贬称少数民族称谓的现象,尤其清代的地方志,多视少数民族为“犬羊”。在文字上做勾当,给少数民族称谓的字加上侮辱性的偏旁。但须知这本身却有文字学、当时文人的心态、认知、政策、态度的文化信息。不能一概改过或用打叉的方式处理。

这些问题,在近些年校注、整理中已有好转,但不是完全没有了。

我自己的观点还是文献学的一般原理:尊重原著,反映原貌,不减不删,不增不加。一个浅显的道理,我们尊重原著,并非认同原著的一些看法、观点。

E.不同版本由于抄写、誊录中出现遗漏的问题,应该补齐,但需要出注,或加以技术处理。对于原版出现的年代、历史事实的错误,保持原貌,但需要出注。也不该一改了之。

F.校注过于简略。有些几乎没有校注。校注是校对和注释。其原则应该是人物、资料来源、地名变迁、错讹字、时间、事件、地名、断句等等,均需要技术处理,以最大限度揭示方志的文化信息。

《肃镇华夷志》校注的点滴体会

现存河西地区地方志中,除敦煌藏经洞出土之数种唐五代时期敦煌地方志和张澍所辑几种早期文献(《西河旧事》《凉州记》《凉州异物志》《沙州记》等)外,最早的,要数撰修于明万历四十四年

(1617)的《肃镇华夷志》了。

近代由于《肃镇华夷志》只有善本存世,部分图书馆存有缩微胶卷,而台湾影印、名之为《肃镇志》的抄本的发行,使许多人误认为彼《肃镇志》即此《肃镇志》,使这一宝贵资料少有人关注。许多古籍丛书都没有收录,如“中国公共图书馆古籍文献珍本汇刊”、邵国秀编《中国西北稀见方志》,“中国西北文献丛书·西北稀见方志”及“中国西北文献丛书·西北稀见方志续编”“续修四库全书”等。《肃镇华夷志》藏于深闺无人识,学者利用不多。

《肃镇华夷志》以《肃镇志》之名,只中国国家图书馆存万历刻本,上海、甘肃、南京图书馆存缩微胶卷。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前,研究者很少利用该书。我自己在研究裕固族历史时,第一次运用该书资料。随后,感觉到该书修撰时间较早,体例特殊,保存有大量河西西部明代珍贵的历史史料,于是,着手誊录校注研究。据此先后撰写发表了多篇关于裕固族研究的论文,并就其名称、性质、特点、价值等发表了专文《〈肃镇华夷志〉文献价值初探》等文章,后来,这些内容收入《校注》的前言中。

首先是书名问题。在这之前,该书均以《肃镇志》为名,经过考证其修撰历史,细审李应魁之序言,考证出该志书原名为《肃镇华夷志》。“华夷”二字,殊为重要。它透露了该志书不同于他志书的特点,其相当篇幅记录了当时环肃州周边东迁之少数民族部落的事实,作者加“华夷”二字,使这部史书的性质、特征更为明显。而后世重刊者,擅自将此二字删除,透露了前后对此志书性质认识上的不同。因此,在校注时,正本清源,“名仍其旧”,恢复其本来面目,也使读者一目了然而知其特点。

其次是版本流传问题。由于台湾学生书局在上个世纪70年代影印出版了台湾故宫博物院所藏顺治抄本的《肃镇志》,于是,此《肃镇志》与彼《肃镇志》的版本问题,就成了校注该志中不可回避的问题。经过仔细比对,故宫博物院所藏抄本《肃镇志》原来是《甘镇志》内容,其作者、修撰时间等都存在张冠李戴的问题。虽然没有仔细研究为何会发生这样的问题,也没有就《甘镇志》的作者、顺治刊印者等问题作进一步研究,但也顺便指出

《甘镇志》的作者非杨春茂。

古代地方志书的修撰与出版,同样存在抄袭、据为己有的学术问题。应该正本清源,还历史以本来面目。应该在可能的情况下,正确评价修撰者的历史功绩。《肃镇华夷志》原为张愚所创修,完成于李应魁,所谓的修撰者高弥高只是重印了一次而已。这不仅是对原修撰者历史功绩的肯定,也是对修撰该志历史背景的揭示。

其三是对该志特殊价值的介绍。这是我们在校注中用力较多之处。最后形成了篇幅较长的《前言》。对其民族迁徙、物产、肃州周边的农业、水利开发、贸易、兵防等,都作了较为全面的阐释。本志的校注完全是出于学术研究,为宝贵资料不至于长期埋没,为学界提供可信的宝贵史料,诚如著名敦煌学家在为该校注本所写的序言中所言:“《肃镇华夷志》之校注出版,使璞玉一拂尘蒙,兰田再耀莹光;秘笈得公于世,而孤本从此不孤矣。”因此,约请了著名敦煌学家写序推介,鞭辟入里,剖切要义,评论中肯,不像由非学术背景的官员所写序言,冠冕堂皇,对其内容、价值揭示无多,读者不得要领。

其四,为使读者进一步了解该志书的价值,本《校注》附录了《秦边纪略》《边政考》以及嘉靖《陕

西通志》等所载明代重要的丝绸之路史料《西域土地人物略》及其插图,并列予以对比、校勘,以为读者尽可能提供相关资料。

有关这些,已有评论者予以置评。

在今日看来,本志书的校注也存在许多不足和不尽人意之处:

- 1.应该用繁体字;
- 2.应该有原版本之图录;
- 3.许多注解条目还可以再细究、准确;
- 4.未睹原本面目,台湾所存亦未亲见;
- 5.应该用大开本;
- 6.各烽燧、墩台与今存未加以对照。如能一一对照,则为后人提供诸多便利;

7.在与《光绪肃州新志》《重修肃州新志》等的对比中,没有采用更好的本子,致使校录中出现了新的错误。对此,评论者业已指出。这些问题,客观上由于经费、时间等原因,但主要还是对旧志整理认识不到位所致。

(作者单位:兰州商学院)

《崇信年鉴(2012)》出版发行

2013年11月,由崇信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中共崇信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写的《崇信年鉴(2012)》出版发行。

该书是全面、系统、真实地记载2012年崇信县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建设与发展的年度综合史册,设特载、大事记、县情概况、政治、经济、社会

事业、乡(镇)管委会及街道社区、人物、附录、后记共10个部分,共47多万字,图片310多张,内容丰富,资料翔实。并配有大量具有史料和艺术价值的照片,图文并茂,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地方地情资料库。它的出版发行,对社会各界人士了解、投资、开发崇信具有积极指导作用。

专业志编写质量亟待提高

阎晋平

专业志是指以某一专项事业或事物作特定记述对象,客观反映其历史与现状的专志。它是地方志中最基本的部分,主要通过百科百业发展变化的记载,从不同侧面反映境内自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各个领域的历史与现状。同时,它也是综合志书的精华部分。编纂专业志,总体上应以专业构成为主体,横排门类要以事物的专业属性及其基本构成要素为依据,按各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及事物的运行程序编排篇目;竖写时应顺时记叙、勾勒主线,横陈现状、展现全貌,精选典型、深化记述,脉络清晰,避免重复。

目前,出于对追溯历史、陈述现状、总结工作、资鉴未来的需要,一些单位编纂专业志的兴趣非常浓厚、热情也很高。这固然是一种好现象,也可以说是地方史志业兴旺发达的一个标志。但回过头来“检视”一下,就可以发现一个明显的问题,那就是所编专业志相当一部分都存在质量问题。俗话说:“质量是志书的生命”,质量不高,也就意味着该志的生命力不强,或是经不起历史的检验,或是经不起读者的检验,或是经不起时间的检验。

专业志质量不高,主要体现在体例不规范、要素不全面、涵盖不全面、份量不均衡、写法公文化等方面。体例不规范,一种是把“志”写成了“史”,以历史时期为纵轴,对同一门类、同一事项、同一事物作分期记载,比如,明清时候怎么样、民国时候怎么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又怎么样;另一种是把“志”写成了“文”,也就是资料汇编,里面领导讲话也有、工作总结也有,甚至让“预拟性”的工作计划摇身一变而为已取得的工作成绩。要素不全面,对应具备的述、记、志、传、图、表、录“变通”应用,随意取舍,而不考虑诸种要素各有其功用。涵盖不全面,不是从需要出发搜集整理资料,

而是有什么就编什么,这样一来,无形中就使许多该写的内容没有写进去,显得“没有丰满之身,瘦的像个瘪三”。份量不均衡,曲解“详今而略古”,成了“详今而略昔”,尤其对现任者的政绩挥毫泼墨,不惜千言万语,对其他的则轻描淡写,有时一带而过。写法公文化,语言的句式、语气、角度、用词均脱不开公文的表述痕迹,变成了“去志化”的表述方式。

造成专业志书质量不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的有三点:一是急功近利,编纂者没有十年磨一剑的恒心,没有坐得冷板凳的耐心,没有头悬梁、锥刺股的决心,没有囊萤映雪的劲头,唯求志书“速生”,早日问世,印刷出版万事大吉,哪怕它只是形似而非神似,这种心态在即将离任的行业负责人身上表现更明显;二是浅“掘”辄止,不是深入搜集、挖掘资料,而是把手头现有的材料七拼八凑,像小孩拼图、堆积木一样,套在一起就行了,这种“志书”必然难现事物全貌,缺乏典型性;三是无视“行规”,在编纂专业志时不能按制度和程序办事,让地方志部门给予指导、审核和评审,好像压根儿就不存在这道“门槛”一样,只是随性而编、随性而出,自己打球、自己裁判。

提高专业志书编纂质量,一是要树立正确的修志理念,以存史鉴今为第一要务,切忌功利化;二是要树立正确的修志态度,唯实、客观、公正,认真、细致、周到,切忌敷衍塞责;三是修志人员要“知己知彼”,既掌握修志规范,又熟悉工作情况,切忌“盲人骑瞎马”;四是与地方志部门密切联系协作,诚恳接受业务指导,切忌花拳绣腿、单打独斗。

(作者系会宁县地方志办公室主任)

浅谈新一轮区志编纂如何突出地方特色

杜小军

内容摘要：新一轮地方志书编纂如何突出地方特色，成为衡量志书质量高低的重要依据，而《地方志工作条例》相关内容的规定，更显示了地方特色在志书中应占据重要地位。修志者应结合当地的政治、经济、地理、民族、历史文化等特点，深入把握和研究当地地情，准确概括提炼出地方特色，这样才能编写出地方特色鲜明的志书。另外，要突出地方特色，必须要合理布局，在设计篇目时，适宜安排特色内容并从详记载，同时也要突出现时代主题，在社会发展变化中突出地方特色。

《地方志工作条例》规定，“地方志书，是指全面系统的记述本行政区域自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的资料性文献。^①”可以看出，区域性是地方志的首要特征，方志的区域性决定了它应具有地方特色，志书突出记述地方特色，各级修志同仁对此已形成共识，在新一轮修志中，各地对这个问题也是普遍重视的，下面我就结合编纂新一轮《秦州区志》和学习参考兄弟县区修志同仁们的修志成果，就新一轮区志编纂如何突出地方特色谈几点想法：

首先，应深入研究和把握当地地情，准确概括提炼出地方特色，为突出地方特色奠定基础。

从根本上说，一部志书整体质量的高低，内容的充实与否，是由编纂者特别是主编对当地地情了解把握的程度所决定的，因为“地方特色是反映

当地地情的手段，同时也是当地地情最集中，最重要的真实体现。^②”所以，我们需要站在全局的高度，采用全方位的视角，掌握全面资料，并对当地重要的、重大的、特有的事项的来龙去脉及详细状况彻底搞清楚，在此基础上总结归纳，深入研究，先把握地情，再准确概括提炼出地方特色，这样才能编写出地方特色鲜明的志书，结合天水市秦州区的具体区情，我认为，秦州区的地方特色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秦州区历史悠久，是中华民族的主要发祥地之一，有“羲皇故里”之称。“1992年8月13日，江泽民同志视察天水时，亲笔题写了羲皇故里。1994年，天水市被国务院命名为第三批全国历史文化名城。^③”漫长的历史演变，留下了丰富的古迹遗址，荟萃了灿烂的自然文化景观。秦州区内有新石器遗址十多处，有国家和省、市、区级文物保护单位41处，区内风景名胜众多，形成了伏羲文化、秦文化、明清建筑文化、民俗风情文化等多元文化景观。

第二，秦州区地理位置独特，区位优势明显。扼陕甘川要道，自古为陇右门户、战略要冲和商贸中心。古往今来，这里人流物聚，商贾云集，是古丝绸之路上一颗璀璨的明珠。现为天水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陇东南最大的交通枢纽和商品物资集散地，受西安、兰州两大城市的双向辐射，是联系西北与中原、西南的交通枢纽。G30连霍高速，

G310、G316线,天宝、天定高速公路,与省道和县(区)乡公道形成健全的交通网络。

第三,秦州区多样的地形和气候条件为全区提供了良好的农业发展条件。区内资源丰富,农产品品质优良。秦州区横跨长江、黄河两大流域,四季如春,素有陇上“小江南”之称。区内盛产小麦、玉米、马铃薯等10余种农作物和苹果、梨、杏、桃等果品,农副土特产品质优品繁。

第四,秦州区工业基础良好,科技教育比较发达,区内有大中专院校10多所,部、省、市属科研单位10余个,驻区部、省、市直属企业达40多家,初步形成了塑料化工、电子电器、工艺美术、机械制造、建筑建材、食品加工、轻工纺织等地方工业体系。

通过以上我结合秦州区地情对秦州区地方特色的概括梳理,地方特色已了然于心。笔者认为,地方志工作者必须全面、详实、深入、准确的掌握当地地情,做到基本地情的阶段性资料连贯,能充分反映事物发生、发展、演变、消亡的过程。在变化中准确、恰当的提炼出地方特色,这是编纂出地方特色鲜明志书的重要基础,是突出地方特色的重要前提。

其次,合理谋篇布局,精心设计篇目,从详记载并多角度反映地方特色内容,突出地方特色。

篇目是志书的骨骼和框架,篇目设计有其基本格式和基本要求,但决不是说志书篇目要千篇一律,展示不同的地方特色成为一篇目区别于其他篇目的重要标志。因此,新一轮志书在篇目设置上要避免平淡,突出地方特色,具体做法是可以采用将本地独具特色的事物与同类事物分离,作升格处理。新一轮《秦州区志》篇目,在有些方面采用这种方式,为了反映秦州区悠久的历史文化这一亮点,“我们在第四编《城乡建设》中专设《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一章;在第九编《商贸旅游》中专设《旅游业》一章,又专编了第二十三编《文物古迹》,其内容包括《文化遗址》《名胜古迹》《馆藏文物》《金石》《古树名木》^④。”而对于秦州区独特的地理位置;丰富的区内资源;良好的工业基础等地方特色,“我们分别在第一编《自然地理概述》、第七编

《工业》、第八编《农业》、第十编《教育》和第二十编《科学技术》中设专章从不同方面进行了升格反映^⑤。”同时,在编纂过程中,我们不惜笔墨,用丰富的资料详细记述能够体现秦州区地方特色的内容,力求实现新的突破。正如胡乔木同志曾指出:“地方志应做到详细,同时也应做到简略。所谓详细,指它应讲到的方面都讲了;所谓简略,就是指每个方面的说明要像打电报,编辞书那样精炼,要惜墨如金^⑥。”所以,除了详细记载反映地方特色的内容外,可以对人所共有,反映不出特色的篇目进行精简,以便腾出空间设置特色篇目。另外,在内容安排上,地方特色要多角度反映,可以通过总述、大事记、分述和概述等不同部分来体现,达到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完整而浓墨重彩地突出地方特色的目的。

再次,突显时代主题、反映时代风貌,在社会发展变化中突出地方特色。

朱佳木在《全国省级方志工作机构主任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要提倡把各级地方志办公室建设成学习型、研究型、创新型和服务型的方志办^⑦。”所以,开展地方志工作,必须与时俱进,不断创新,抓住时代发展的主旋律,即以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为主线,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与之相适应的体制为依据,以大发展、大变化为主要内容,在社会发展变化中来突出地方特色和时代特点。《秦州区志》在具体记述时,力求做到不断创新,地方特色鲜明,侧重变化发展。秦州区作为天水市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城市面貌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我们在第四编《城乡建设》、第五编《基础设施》、第六编《经济总情》、第九编《商贸旅游》和第十一编《经济综合管理》中详细的反映了这一变化。作为历史文化名城,秦州区有许多历史文物和名胜古迹,并以此为荣,我们在记录原有旅游资源的同时,着重记述概括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的新要求,不断开发出新的旅游资源。另外,我们也结合社会各方面的变化,多方面反映我们当地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如人口老龄化、留守儿童、网络建设、环境保护等问题。我们在《秦州区志》中结合本地的变化,在社会变化中突出了地方特色。

以上是我对编纂新一轮区志如何突出地方特色的浅显的认识,或者说是成熟的观点,不足之处,敬请各位同仁批评指正。

参考文献:

①《地方志工作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 第 467 号 2006 年 5 月

②陈启生《首轮志书的不足与二轮修志应重点探讨的几个问题》,《天水市二轮修志培训资料》天水市地方志办公室 2008 年 9 月

③《天水市年鉴》天水市地方志办公室编中国文化出版社 2011 年 12 月

④⑤《秦州区志大纲》秦州区地方志办公室编

⑥《胡乔木与地方志》《陕西史志》1994 年第二期

⑦朱佳木《全国省级方志工作机构主任会议上的讲话》,《2010 年全国二轮修志培训材料》中国地方志领导小组办公室 2010 年 6 月翻印

(作者单位:省天水市秦州区地方志办公室)

县区级二轮志书编修面临的问题及对策

徐鹏

内容摘要:编修地方志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一项系统工程。本文全面总结了兰州市所辖三县五区二轮修志工作的开展情况,特别对其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深入地探讨和分析,并从加大社会调查力度,改进资料征集方式,加强修志队伍建设,完善编纂机制等四个方面提出了对策,以期推进地方志事业的健康发展,使其在新时期文化建设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关键词:二轮修志 县区级 问题 对策

地方志是一定区域内的地情“百科全书”,其

固有的“存史、资政、教化”功能,在新时期文化建设中占有重要地位。2004 年,兰州市全面启动二轮修志工作,到目前为止,所辖 8 个县区中仅有 2 县 1 区完成了修志任务。这对地方志事业的健康发展及其在我市文化建设中作用的发挥极为不利。笔者曾参与一部区志的编撰工作,后在市志办承担县区修志工作的指导业务。结合自己的实践和体会,认真研究县区二轮修志工作中的经验和教训,特别对其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并提出对策,是十分必要的,也是本文的初衷。下面谈几点粗浅看法,愿和同仁们商榷,请专家们指正。

一、县区二轮修志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一)社会调查的力度不够。进行社会调查、实地考察是在编纂志书过程中获取第一手资料的有效途径。因此,根据社会现实的需要,研究和制定社会调查课题,以准确的史料反映地情资料就显得尤为重要。在首轮修志中,由于对社会调查工作的忽视,兰州市各县区人志资料中通过社会调查所取得的第一手资料都很少,尤其对一些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的内容几乎没有,志书在记载内容上出现了缺失,也缺乏深度。二轮修志工作启动以后,各县区开始普遍重视社会调查工作,根据本县区实际情况,制定调查课题,组织人员开展社会调查,获取了一些珍贵资料。但由于受人员、经费和交通条件的限制,社会调查工作多处于一般化的状态。有的县区制定的调研课题过于简单笼统,内容没有涉及到必须要调查的方方面面,社会调查的广度不够;有的县区虽然调研课题详细具体,但对一些问题浅尝辄止,没有追根溯源,社会调查的深度不够;个别县区甚至没有开展社会调查,对一些问题有被迫空缺或主观臆断的现象,这些对志书资料的完整性、严肃性和权威性造成了损害。

(二)征集资料的方式滞后。第一轮修志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启动的,征集资料主要采取行政命令的组织形式,也基本满足了修志工作需要。然而,二轮志书所要求记载的时限恰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和完善时期,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层次的变化,社会上新事物、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近几年,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人类逐渐进入信息时代,文化事业进一步繁荣,传播载体和渠道日益广泛。显然,再以那些陈旧的、单一的行政手段和滞后的征集方式搜集资料则根本不能满足二轮修志的实际需求。因此,顺应时代变化和要求,改进工作方式,运用先进的互联网、多媒体等科学技术,抓紧和做好资料征集工作就是势在必行。但从兰州市各县区修志工作的进展来看,二轮志书的资料来源基本仍靠各单位报送,以档案、官方文件、报刊、年度总结等为资料主体,资料征集工作经常陷入网络单一、渠道狭窄、搜集困难的窘境。这一点在县区征集企业、商贸和三产、社区、社

会管理、民风习俗等等资料时表现得尤为突出。就拿作为兰州石化工业区的西固区来说,在志书记录的时限内,企业经改制、重组、破产、搬迁和发展,经营由单一的国有、集体所有,发展为国有、国有控股、国有参股、合作、集体、私营和外资等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的局面。加之政企分开和机构改革,政府职能由管理转向服务,用行政手段向企业征集资料遇到诸多困难。西固区对部分企业资料的搜集不得不采取了“曲线救国”(选找人情关系)的方式,历尽艰辛,虽有所获,但仍留下了不少缺憾。

(三)修志人员素质难以保障。修志人员的综合素质是决定志书质量的关键因素。而文化事业发展的核心是人才,修志人员的水平参差不齐,必将会影响到地方志事业的发展。二轮修志工作启动后,就兰州市各县区而言,县区志办大多与党史办合署办公,专职修志人员很少,普遍出现了修志人才匮乏、青黄不接的状况。近三年,兰州8个县区中史志办主任已更换6人,其中5人由其他部门、行业调整而来。这些同志尽管工作热情很高,创新意识很强,但专业知识缺乏,编纂史志的经验有限,难免出现工作衔接不上的问题。加之优秀干部不愿到清贫的史志办工作,即便来了也不安心,跳槽现象频繁。由抽调、借调、聘用人员组建的修志队伍,多数人没有参加过首轮修志工作,缺乏基本理论素养和必要的业务知识,总纂人选更是成为县区志书编撰工作的“短板”。以史志办在职人员现有水平大多不能胜任,只有广开贤路,多方聘请。因对所聘任的总纂人员业务水平和敬业精神有时不甚掌握,出现了有的总纂把握全局能力不强,志书完稿后,发现在内容记载和记述上存在问题,需要进行返工的现象,有的总纂兼职过多、精力分散,按期不能完成志书初稿,拉长了修志时间,这对志书的质量和编纂进度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四)“马拉松”现象依然存在。地方志编纂是一项政策性、原则性、专业性很强的工作,涉及面广、任务量大、质量要求高。在总结首轮修志工作时,志书成书时间过长的“马拉松”现象引起了方

志界的注意和讨论。特别是当前,我国文化消费进入快速增长时期,人民群众的文化消费能力日趋增强。然而二轮修志工作启动后,从兰州各县区修志工作的开展情况来看,“马拉松”式的拖延现象依然存在。这种现象势必对我们新时期的方志文化事业造成极大的危害。兰州市二轮修志工作从2004年启动到现在已八年,所辖8个县区中完成修志工作任务的仅有3个县区。有的县区在市志办的督导下,已加大力度,迎头赶上,志书不久将正式出版。但还有个别县区因受多种条件的限制(如经费匮乏、人员流失等),修志工作仍处于半停滞状态,志书的出版发行还遥遥无期。这种“马拉松”现象不仅增加了志书编修的成本,损害了方志文化事业的健康发展,也让修志工作者产生畏难情绪和消极思想,志书的时效性得不到保障,其“存史、资政、育人”以及服务地方经济发展的作用大打折扣。

二、解决县区二轮修志问题的对策

(一)加大社会调查、深入分析研究。社会调查是运用科学的方法去考察各种社会现象,收集必要的社会资料,并分析各种因素及其相关联系,从而达到掌握实情、把握规律、科学预见的目的。现代文化产业的发展要求修志工作加强公共服务能力,为群众提供详实而准确的文化服务成为一种必然趋势,而过去那种伏在故纸堆中的做法显然已经跟不上时代的发展步伐。因此,加大社会调查力度至关重要,也是志书突出地方特色和时代特征的保障。作为方法科学,社会调查有着严格的程序和很强的针对性。首先要确定调查课题,选取合理可行的调查方式,有步骤、有计划地开展调查工作。特别应注意的是,在志书反映的时间界限内社会上产生的新问题,出现的新情况,涌现的新事物,发生的新变化都是社会调查的重点对象。它们游离于政府部门之外,通过传统的行政手段无法全面反映,若不加以记述,会对志书的全面性和系统性造成损害。其次要制定调查计划,包括调查目的、调查对象、调查规模、调查提纲、调查时间、调查人员等内容。而确定调查方法就是根据调查对象的不同有针对性地选取最有效的工作模式,主

要有文献法、问卷法、观察法、访谈法、个案法等。再次要重视调查结果的分析 and 归纳整理。社会调查一定要实事求是,深入细致,该扩展的扩展,该深究的深究,做到宏观与微观、定性与定量、历史与现实、静态与动态相结合,不能有任何主观臆想和凭空推测。对调查所得资料应认真审核、评价、分类和汇总,使之条理化、系统化、清晰化,以集中简明的方式反映出调查对象的总体情况、具体要素和典型事例等,使之转化为志书可用资料。对一些新生的文化、社会习俗、民俗事物和社会现象还应进行深入分析研究,还原其本来面目,得出全面系统的观点,将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并实事求是地撰写高质量的调查报告,一方面,为党委和政府决策提供客观依据,另一方面,为群众提供准确的地情资料公共服务。

(二)改进征集方式、拓宽网络渠道。资料是志书的基础。一部高品质的志书,其所记载的内容必定是全面、系统、翔实和准确的。这就要求资料报送必须网络健全,渠道畅通。因为志书是“官修”的地情书,在我们现行体制下,依靠行政命令征集资料还是最直接、最有效的方式,但其限制性也显而易见,尤其在现今这个信息时代,社会发展日新月异,网络不健全、渠道不通畅的弊端更是暴露无遗。为了弥补其缺陷,近年来,全国许多地区在行政组织征集和开展社会调查的前提下,在改进征集方式、拓宽网络渠道方面做了大量的探索和尝试,很值得我们学习借鉴。如许多地区开展了综合年鉴的编纂工作。地方综合年鉴是系统记述本行政区域自然、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情况的年度资料性文献,它全面系统地汇集了本区域上一年度的重要文献信息,而且是逐年编辑出版,这为志书的编修提供丰富的素材(但这项工作在县区这一级开展得并不广泛)。有的地区对于一些单位、团体本身无法提供资料的,采取了化整为零的办法,从统计、税务、工商部门及有关行业协会进行了搜集;对一些没有部门行业承担的社会问题资料,如反映人民群众衣、食、行、用以及民俗风尚等方面的内容,列出专题,通过向社会公开招标,交由专家和学者去完成。有的地区利用区域优势,与

辖区有关单位按照“资料共享、互惠互利”的原则共建起地情数据库,搜集分散于媒体、互联网等社会各个层面的相关资料,作为志书资料的一个重要来源;同时,切实推进方志馆和方志网站的建设,以方志馆和方志网站作为方志文化事业的载体和渠道,为群众提供方便快捷的公共服务。广州市在全国率先建起了地方资料年报制度,报送网络遍及市属行政、企事业单位和中央、省驻穗等160多家单位,资料年报工作已进入了常规性运行。以上这些措施使一些资料难以征集的问题迎刃而解,也对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基础建设大有裨益。志办在管理模式上要与时俱进,大胆创新,在内部要选定专人,承担常态化的资料征集、积累和整理工作;在外围,要组织联络一批地方文史爱好者、有关专家学者组成专家咨询机构,提供资料 and 开展文史、地情研究,形成深度化资料,不断推动方志文化事业向纵深发展。

(三)加强队伍建设、提升人员素质。修志工作是一项系统工程,没有稳定的、高素质的人才队伍,修志工作难以开展,编纂质量无从谈起。因此,加强队伍建设,提高人员素质,加强人才培养,是方志文化事业健康发展的根本保证,也是在更高层次上寻求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一种必然选择。修志队伍建设要按照“老、中、青”三结合的原则,坚持专职修志人员、部门修志人员和兼职修志人员一起抓,以老带新、动态管理,形成人才培养的“传、帮、带”机制。在选配志办行政领导时,要考虑修志工作的实际需要,对初步拟定人选,要征求上一级业务部门意见,将热爱修志事业,工作能力强,有责任心的干部选配到志办领导岗位上来。对志办工作人员要从政治和生活上多关心、多照顾,用待遇留人,用事业留人,用感情留人,并要积极吸收一些有一定理论素养和编撰基础知识、肯钻研的中青年人才来志办工作。在组建修志队伍时,要将每个单位、行业中“懂业务、熟地情、善文章、乐奉献”的人员选择进来,还要吸收一些熟悉情况、有经验、有热情的老同志、老专家以及社会贤达人员。同时,要强化新进入修志队伍的人员培训,帮助他们学习和掌握修志工作的基本常识和

一般程序,增强修志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学习培训可采取发放专题学习资料,开展学习交流、开办主体培训班次等形式。有条件的地方还可组织人员到工作起步较早、工作卓有成效的城市去考察学习、观摩交流,开阔眼界,增长见识。对困扰县区的总纂人选问题,市级志办可在广泛调查摸底的基础上,按照个人自荐和考察选拔的方式,建立起较高层次的修志人员人才信息库,实行滚动管理,对符合总纂条件要求的,加强业务培训,颁发资格证书,向县区和相关部门推荐,进行双向选择,对不符合要求的人员随时调整。这样,既可掌握和贮备一定的修志人才,解决总纂人员难觅的实际难题,又可保证志书的统一性和整体质量,为人民群众提供科学丰富的精神文化食粮。

(四)完善机制制度、落实工作责任。地方志编纂工作是一项庞大的基础性文化系统工程,工作难度大,持续时间长,只有在较高的行政权威、学术权威和强有力的组织协调下,方可举全社会之力,攻坚克难,众手成志。但在现行体制机制下,组织领导的松散,方志办公室职能的弱、软,致使出现的成书时间过长的问题,削弱了志书在“三个文明”建设中其独特“资政”功能的发挥。认真贯彻《地方志工作条例》,加强组织领导,坚持依法修志,全面落实“一纳入、五到位”是克服修志工作中“马拉松”现象的重要举措。将修志工作纳入地方党委政府的议事日程,把承编任务列入责任单位年度工作目标,建立健全各级领导负责制、督查通报制和评优奖先等制度,加强目标管理,形成工作合力,首先从机制制度上消除“马拉松”现象滋生的温床。其次,作为地方文化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官方提供地情资料的机构,地方志办公室要切实担负起组织协调、业务指导、督导落实的职责。以为历史高度负责的态度开展方志编修工作,启动时要结合实际制作详细的工作流程图和相关的内部规章制度,根据断限内本地区的特色,在方志内部酝酿构建篇目框架,进行科学论证。启动后,要组织人员开展社会调查,广征博采,巨细毕收,尽可能确保调查资料广泛、翔实、准确;督促有关单位按要求上报文献资料,提供相关信息,到承修

单位检查指导,解决业务难题;组织编纂人员对征集上来的资料去伪存真、去粗存精、由此及彼、由表及里,进行认真细致地鉴别、考证和编辑;适时召开编纂人员和部门编写人员会议,解决编纂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协调分纂和总纂之间的分歧;定期通报修志工作进展情况,指出问题不足,推介经验作法,确保工作整体推进。待把关统稿、内审定稿完成后,及时组织开展方志文化系统专家初审、复审、终审,做到环环紧扣、步步衔接,直至正式出版,彻底清除修志工作中“马拉松”式的拖延现象。同时,还要组织人员进一步做好(因一些原因)未能入志资料的整理、编纂和志书(包括旧志)的宣传、推介、文化遗产保护以及志书产业的延伸发展工作,拓展和丰富方志文化的领域、内容,使之成为地方文化事业的有机组成部分,特别要加大修志工作与科技新技术的融合,推进方志网站建设,向社会提供网络化、数字化的咨询服务,以满足人民快速增长的文化消费需要,为社会主义文化事

业的繁荣昌盛贡献自己的力量。

参考文献:

1、金钰铭《城市志探索与实践》兰州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

2、高书生《关于文化产业若干问题的思考》2012 年 10 月

3、兰州市 8 县区 2012 年工作总结

4、注“一纳入、五到位”:纳入政府年度目标责任考核;领导到位,机构到位,经费到位,队伍到位,条件到位。

(作者单位:兰州市地方史志办公室)

推动地方志事业转型升级之管见

朱克雄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能否牢牢把握机遇、沉着应对挑战,关键取决于我们的思想认识,取决于我们的工作力度,取决于我们深化改革推进发展的步伐。这也完全符合地方志事业发展的实际。促进地方志事业转型升级、科学发展,必须正视地方志事业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以改革创新为动力,立足本地、放眼全国、把握大局,积极吸收借鉴各地地方志工作的经验做法,善于分析研究新阶

段地方志工作发生的新变化、出现的新问题、而临的新任务,采取切实可行、积极有效的措施办法,不断开创地方志事业科学发展的新局面。

一、努力在构建地方志事业全新格局上实现转型升级

当前,地方志事业发展面临的发展机遇主要有:地方志事业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重要内容,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地方志工作迎来了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文化需求

的日益增长、文化投入的不断增长、文化事业的蓬勃发展,为地方志工作者提供了广阔的舞台;地方志工作由原来主要靠行政推动而迈入法制化轨道,赋予地方志工作机构明确的法定职能,为推进地方志工作科学发展提供了法律法规保障;源远流长的地方志是中华民族独特的“文化瑰宝”,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必然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建设的重要途径;倾力推进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建设、平凉特色文化名城建设和“平凉智慧城市”建设,都要求充分挖掘历史文化资源,强化文化遗产的保护、开发和利用,这又为发展繁荣地方志文化事业提供了良好机遇。再加之新时期大规模首轮修志基本始于上世纪80年代,大体结束于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现正处在二轮志编修阶段,经过30多年的探索实践,地方志工作从小到大、从弱到强,总体上已经形成了新的工作格局。对此,我们要有充分认识和准确把握,善于在新的格局下思考、谋划、安排、推进地方志工作。具体来说就是要“强化三个认识”:一是强化地方志工作不再是单一或专项工作,而是一业为主、多业并举、全面发展的事业的认识。过去,大多数地方的地方志工作承担的主要任务就是组织编纂志书,后来开展了综合年鉴的编辑出版,很长一段时间里工作性质单一、工作领域狭窄,工作格局有限,被称作“一(志书)两、(志书和年鉴)本书”。而现今,在全国范围内,地方志工作已经形成了志书、年鉴、资料库、方志馆、地情网和开发利用“六位一体”的工作格局,加上方志刊物、方志学(协)会、方志理论研究,又被概括为“九位一体”。无论是“六位一体”,还是“九位一体”,这都说明地方志工作格局已经发生转型。面对这一转型,我们必须积极适应、全力顺应,做到与时俱进,尽快实现思想和工作的提升,达到转型升级。要破除地方志全部工作就是编书出书、就是编纂志书和年鉴的陈旧观念,摈弃干其他工作就是不务正业的错误认识,在做大做强志鉴主业的基础上,按照志、鉴、库、馆、网、刊、会、研、用“大方志”格局来布局谋篇、整体推进,在方志的舞台上干出一番事业。二是强化地方志工作不再是临时性、一次性、阶段性工作,而是

需要世代代、连续不断进行的经常性、持续性工作的认识。国务院《地方志工作系列》明确规定今后20年左右修编一次,还要求在本轮志编修期间适时启动下一轮志的资料长编工作。此外,由于年鉴及库、馆、网、刊、会、研、用等工作的展开,地方志工作内容越来越丰富,工作节奏越来越紧凑,日常性、年度性、阶段性工作有机结合,经常性、持续性特征日益显现。为此,我们必须破除临时思想和短期行为,树立长期作战的思维意识,注重谋划中长期发展,并将其纳入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确保地方志事业可持续发展。三是强化地方志不再是可做可不做或做多少算多少的自选动作、软任务,而是必须做、必须做好的规定动作、刚性任务的认识。国务院《地方志工作条例》的正式颁布施行,标志着地方志工作从此进入了依法修志的新阶段。《条例》明确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本行政区域地方志工作的领导。地方志工作所需经费列入本级财政预算。”“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负责地方志工作的机构主管本行政区域的地方志工作。”这说明,各级政府有责任设立地方志工作机构,并且要给与该机构相应的级别、职责、编制、经费。《条例》的出台,使各级政府做好地方志工作的责任更加明确,使各级地方志机构的职责更加清晰。我们要理直气壮地开展工作,不折不扣地履行使命。

二、努力在构建地方志事业全新文化产品生产方式上实现转型升级

目前,全国出版第一轮省市县三级志书5800余部,第二轮三级志书370余部,编纂部门志、专业志、行业志、山水名胜古迹志16000余部,乡镇村志2000余部,地情书6000余部,编辑年鉴2000余种,整理历代方志2000余部。这无疑是一项辉煌的成就,是一笔宝贵的财富,更是一个基础、一个开端,也是新时期地方志工作向高质量和高效益事业发展转变的基本前提。我们不仅要看已经生产出的地方志文化产品的数量,更要看地方志产品质量;不仅要看政治观点是否正确,还要看史实的准确性、布局的合理性、体例的规范性、文字的简洁性、要素的齐全性和编纂的严谨性;还

要看地方志这种品牌性很强的资源和产品是否已经走出深闺,为社会广泛接纳,在经济社会发展的舞台上发挥出应有的影响力。客观地讲,地方志文化产品的生产尚未走出重数量、赶进度、粗放经营、资源浪费、低质低效的发展模式。因此,必须做到“三抓”:一要抓精品。质量是志书的生命,必须始终坚持质量第一的原则,进度服从质量,严把资料关、体例关、史实关、保密关和审核关。志稿形成后,要仔细推敲,反复打磨,广泛征求各方面意见,认真加以修改完善,不能因为赶进度、急于出版而降低志书的质量标准,更不能为限期完成任务而草率收场,使质量不高甚至粗制滥造的志书出版发行。中国地方志领导小组制定出台的《关于第二轮地方志书编纂的若干意见》和《地方志书质量规定》,就是针对目前业已出现的某些重进度、轻质量的不良苗头,从总体上对提高志书质量提出的统一标准和要求。我们要善于运用这些意见和规定尤其是借助国务院《地方志工作条例》来推动方志产品质量的管理,组织实施精品工程,多出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的佳志、良志、传世之志。二要抓活动。活动也是产品。地方志文化活动有着传统地方志文化产品不可媲美的社会吸引力和影响力。除了地方志界的学术研讨活动外,我们要更加重视策划组织一些体现地方志特点、发挥地方志优势,便于各方参与、助力地方发展的群众性文化活动。如围绕建党、建国、建市等重大节点开展的宣传纪念活动,志鉴书籍走进社区活动,以及配合地域精神提炼和弘扬、地方形象对外宣传推广、先进模范人物评选、招商引资、城市建设、会展旅游、抗灾救灾等开展的活动。三要抓传播。要主动加强与新闻媒体的互利合作,善于运用大众传媒宣传地方志工作知识和成果,推介地方志资源,放大地方志声音。要善于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将地方志信息转化为电子书、网络版等社会喜闻乐见的载体形式,通过地方志馆、网站等平台,广泛提供给社会共享。还要以志书资料为基础,参与创作文学作品,制作电影、电视剧。

三、努力在构建地方志事业全新方式方法和体制机制上实现转型升级

国务院《地方志工作条例》明确规定地方志工作机构要履行组织、指导、督促和检查地方志工作,拟定地方志工作规划和编纂方案,组织编纂地方志书、地方综合年鉴,搜集保存地方志文献资料、组织整理旧志和推动方志理论研究,组织开发利用地方志资源五个职责。这就标志着地方志部门已经由修志单位、志鉴编纂单位向地方志工作机构转变。与此相适应,地方志工作的方式方法和体制机制也随之转变,必须靠“提高四个能力”来适应:一要提高“管”“办”结合的能力。在组织实施好本级工作的同时,重视抓好对有关部门和下级机构工作的指导和管理。二要提高运用规划推进工作的能力。认真做好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以规划的制定和落实执行好法律法规,同时以规划明确地方志机构的工作任务、工作程序和配套经费,让管理者和执行者有章可循,不因人事变化和工作重心的转移而兴废。三要提高依法督促工作落实的能力。依法敦促地方政府负责人和有关部门履行修志职责,依法向机关、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其他组织及个人征集地方志资料,依法严格审查验收志书、保证志书质量,依法开发利用地方志资源。四要提高应用激励引导机制的能力。定期开展地方志先进集体和个人的评选表彰,开展志鉴评奖和质量评比,开展地情开发利用成果展览和作品评优评奖,不断增强地方志工作队伍的自豪感、责任感,充分调动和激发他们的积极性。

四、努力在构建地方志事业全新工作力量上实现转型升级

传统的地方志工作组织结构,是一种典型的封闭式组织结构。为了某部志书的编纂,当事者就组织一个编纂班子,这个班子一旦组建完毕,就独自承担起编纂的职责,等到这本书编纂完成班子也就自然解散。这一直是历代志书编纂工作班子组建、力量组织沿用的模式。现在,这种模式已经不能适应地方志工作机构的要求,这是因为现在对地方志工作机构的职能已经有了十分明确的规定,不履行到位就是渎职失职,但很多工作又仅靠地方志工作机构在自己内部就难以完成。因此,地方志机构只有转变组织方式,从闭门修志转变到

开门修志,统筹协调处理好“点”、“线”、“面”的关系,建立既相对独立又相互依存的开放性、整合型工作队伍和力量,才能圆满完成工作任务。一要注重“点”的建设。“点”就是地方志人才队伍。在采用封闭编纂模式的时候,主事的地方主官都用延聘的办法,从社会上选择那些有德才的人士来担任编纂工作,事竣人散,是一种因事择人的人才选用模式,不承担培养的职责。地方志工作机构实行常设之后,特别是随着依法修志、开放式管理、强化服务功能之后,地方志工作机构要代表地方政府履行地方志工作职责,开展多方面的工作,对地方志工作者的要求大大提高,单靠面向社会选用的人才工作模式已经不能够适应时代发展要求。到了这个时候,地方志机构每一个工作人员都要长期担负或者部分担负起过去由地方主官履行的修志职责,如果没有相应的专业技能和决断能力就不能胜任岗位要求,在制定和落实编纂方案、实施项目管理、确保编纂质量等方面就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地方志工作机构要转变人才选用模式为人才培养模式,完善培养、教育和奖励人才工作制度,加强对专业修志人员的定期岗位培训和继续教育,按照志书编纂、年鉴编辑、地情开发管理的方向,依据学习型、研究型、创新型、服务型的标准,建立一支具有一定专业和理论功底、又具有实践能力的地方志常备力量。二要注重“线”的建设。“线”,就是地方志战线。各级地方志工作机构,要指导督促各地区、各部门建立专兼职地方志工作队伍,负责开展本地本部门的地方志工作。同时,通过举办业务培训、成果展览、经验交流等多种形式,提高整条战线的战斗力、凝聚力。三要注重“面”的建设。要学会从“大地方志”的理念来理解“地方志人”的概念,从而在更广泛的意义上推进方志力量建设。这样的“地方志人”,既包括从事地方志编纂的各专门机构的组织者、领导者、行政管理者、编纂人员和地方志学家,也包括各种科研院所、高等院校、文化机构、新闻单位及其专家学者和社会各界的热心者、爱好者、研究者。为此,我们要注重培育和建立多种载体和平台,比如传统的编辑出版地方志刊物、建立地方志学会,比如现代

的地方志馆、地情信息网站、地情研究会,打破专业和区域界限,鼓励和吸纳社会各界学有专长的人员以各种方式和渠道参与地方志工作。此外,制定管理办法,设立专项资金,确定重点项目,扶持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地方志资源开发利用,更是一种行之有效、值得推广的做法。

五、努力在构建地方志事业既能垂鉴后世更能服务当代社会全新功能上实现转型升级

对地方志功用的认识是随着社会发展和时代演进而有所变化的。最初的地方志是顺应当时封建统治的需要,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其功能主要在于“辅治(资治)”。随着地方志实践及其理论发展逐渐成熟,地方志界对地方志功能认识趋于统一,普遍解释为“存史、资治、教化”。新时期,社会主义新地方志的记载范围更广泛,门类更加齐全,大到包括一个地区的天文地理,政治经济,科学文化,工农业生产等各方面,小到涉及一个地区的风俗、方言、古迹、特产、水利、交通、军事、人物等史料,几乎无所不包,无所不有。在此基础上,人们对地方志服务现实的功用有了更深入的认识。认为地方志“存史”主要用于垂鉴后世,而“资治”与“教化”则主要体现于服务当代。因此,修志不能只是为了“存史”,有益后世,更应服务当代,可以在为地方发展战略研究和各级领导决策提供依据,为爱国主义教育、地情教育提供教材,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提供基础资料,为地方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提供研究资料和经验教训,为地方走向全国、走向世界起到宣传作用,为旅游开发提供新的资源等方面发挥独特的功能和作用。国务院《地方志工作条例》开宗明义地提出“发挥地方志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也体现了对地方志服务当代的要求。由此可见,地方志的作用是全方位的,并将随着时代的发展和进步,在经济社会生活中的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我们应该认真加强研究,使地方志的作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充分发挥出来,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应有贡献。为此,必须着力强化“四种意识”:一要强化用志意识。修志的目的完全在于用志,除此之外没有第二个目的。无论是

“存史”，还是“资政”、“教化”，说到底都是用志。用志是新时期地方志事业的新特点、新发展，用志是服务当代、以志为鉴的重要任务。我们要克服修完志书就万事大吉、束之高阁“一修了之”的错误做法，走出把开发利用修志成果当做可做可不做工作的认识误区，通过编写简志、专题书、地情丛书、地情刊物，在媒体上开辟地方志专栏，制作志鉴书光盘，开办地情网站，建设开放地方志馆等多种形式，积极研究和开拓社会读志用志途径。二要强化融入意识。要转变地方志是边缘部门和边缘工作，靠近不了“中心”，进入不了“大局”，帮不上忙使不上劲，摆不上位置引不起重视的错误认识。积极主动贴近中心、融入大局，努力在服务大局中认知地方志的责任与价值，在服务大局中找准地方志工作的位置，在服务大局中发挥地方志的社会功用。当前，要主动融入加快转型跨越、促进科学发展、与全国同步建成全面小康社会的大局，融入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大局，融入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大局，融入建设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平凉特色文化名市和“平凉智慧城市”的大局，融入加强和改善民计民生、建设幸福美好新家园的大局。“有为才能有位”。只要我们以对历史、对未来、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兢兢业业、恪尽职守，有思路，有作为，有成效，就一定能展示出地方志独有的魅力。三要强化地情意识。地方志信

息是关于一个地区最全面、最系统、最权威的信息。地方志工作就是区域信息工作，地方志工作者就是地情信息工作者，地方志机构是一个地区综合信息的整理者、整合者、储存者、发布者和把关人。所以，我们要努力将地方志书编纂成地情书，将地方志网站办成地情网站，将地方志馆建成地情馆，将地方志工作机构打造成地情记载、研究、开发和管理机构。要通过广泛深入的地情研究活动，准确把握国情、省情、市情、县情、乡情、村情，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强大的地情资料保障、精神支撑和智力支持。四要强化惠民意识。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要实现地方志工作社会功用的转型升级，就必须树立“地方志为民”、“地方志惠民”的新观念，主动登上公共文化服务的平台，开辟服务窗口和渠道，提供独具特色和魅力的地方志文化服务；必须放下居高临下的“教化”姿态，在满足群众不断增长的对地方志文化和地方历史文化的需求中发挥好提高人、塑造人的作用；必须改变“官书官看”的旧观念，注重增强地方志工作的大众性和志书编纂的社会性，编纂出版更多的“公民书”。

（作者系平凉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



重 访 舟 曲

简富绩

2010年8月8日,甘南藏族自治州舟曲县因暴雨引发特大山洪泥石流灾害,造成1510人死亡,255人失踪,4.7万人受灾,6万多间房屋损毁,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甘肃乃至全中国最为严重的山洪泥石流灾害。灾难发生后,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紧急部署,全力救灾,国务院紧急成立了舟曲县灾后重建前方协调指导小组,2010年11月舟曲县灾后重建正式启动,确定了三个群众重点安置区域,分别为老城区原地重建区、峰迭就近新建区、兰州秦王川转移安置区,重建采取中央投资、甘肃省代建及舟曲自建相结合的方式,经过建设者近900个日夜的艰苦奋斗,与2013年8月8日三周年之际,舟曲县灾后重建任务已经全部完成。这座经历了巨大劫难的“藏乡江南”,在废墟上屹立起了一座美丽的新家园,舟曲人民的新生活如期而至。甘肃省委、省政府决定以志书的形式将舟曲特大山洪泥石流灾害以及灾后重建的过程系统完整地记载下来,保存历史资料的同时,也资鉴后世。在舟曲灾后重建完成之际,甘肃省地方史志办公室组织《舟曲8·8特大山洪泥石流志》全体编纂人员于2013年8月14日至17日对舟曲进行了为期四天的实地调研考察,舟曲新貌给大家一个全新的感受!

一、灾区重建工作有力有序,成果显著

三年前,特大山洪泥石流夜袭舟曲,甘肃南部的这座藏乡小城陷入慌乱、惊恐、悲伤之中,泥浆满地,江水淹没县城三分之一,千余条生命瞬间离去,数百个家庭支离破碎;三年后,这个被灾害重创的小城,在灾难中顽强地站起,在悲伤中坚强挺立,雨水、泥浆、骄阳,白龙江、翠峰山、三眼峪,一同见证了书写“藏乡江南”的传奇。

老城区,焕然一新,令人难以置信,明快的特

色民居、美丽的现代场馆、错落有致的民居将一个安居乐业、生态文明、安全和谐的新家园呈现在我们的面前;峰迭新区魔术般地拔地而起,成为我省小城镇市政基础设施和基本功能最完善的城镇,平坦宽阔的新区主干道两边,是一栋栋设计新颖的楼房,漫步在绿地鲜花点缀的步行街上,就像走进了一个宜居宜家的现代化小区,这一幕幕重建发展的奇迹,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再一次彰显。灾难面前,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各方力量迅速调动起来,有力有序推进舟曲灾后恢复重建,国务院舟曲灾后恢复重建指导协调小组迅速成立,《舟曲灾后恢复重建总体规划》在灾后3个月内迅疾出台,国务院各相关部门、甘肃省各级政府相互协调,科学高效地组织规划实施。老城区规划1.5平方公里,容纳剩余的2.3万人(见图1)。离老城区十几公里的峰迭作为就近新建新区,规划1.2平方公里,安置城镇人口1.5万人(见图2);兰州市秦王川新区规划1平方公里,安置受灾群众和学生0.8万人。截止2013年8月8日灾后重建共完成186个项目,累计完成投资52.85亿元,灾区基本生产生活条件和经济社会发展全面恢复,明显超过灾前水平。



图1:重建老城区鸟瞰图



图 2:峰迭新区全貌鸟瞰图

二、坚持以人为本,民生建设提升了舟曲人民的“幸福指数”

在三年前的这场重大地质灾害中,舟曲县教育、文化、卫生等公共服务设施都遭到重创。之后,国家规划实施公共服务类项目 63 个,共投资 7.83 亿元,重点对学校、医院、文化设施进行恢复重建。在峰迭新区我们看到邮政服务、卫生综合大楼、粮油蔬菜市场等公共服务场所已经逐项完工开始运营,新建成的可容纳 360 名幼儿的峰迭新区幼儿园也即将在秋天正式开学,重建的各类中小学校完全达到国家规定的校舍建设标准,新建成的舟曲县医院和峰迭新区综合服务楼的硬件设施也将达到优级医院水平。这些设施的投用,将极大地改善舟曲群众的医疗条件。舟曲县副县长姜鸿荣指着老城区 46 栋灾后重建安置楼(见图 3)说:“将有 1208 户受灾群众很快住进这里,现在正在抓紧的道路硬化小区里面,还有部分正在做室内的门窗安装阶段,46 栋楼确保要达到入住条件。”今天的舟曲,民生建设、公共服务设施有了很高的提升,建设标准更高,功能配套更全,服务能力更强(见图 4)。



图 3:舟曲老城区新建的安置住房工程



图 4:老城区重建后的广场

三、坚持科学发展,加强灾害安全防范意识

重建,不是简单的“房倒建房,路坏修路”。因舟曲独特的地质特点,舟曲是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多发地,如何避免“毁了建、建了毁”,在更高水平上的建设,在更高的起点上发展,成为舟曲灾后重建的首要考量因素。这次灾后重建把群众生命安全放在首位,对老百姓的安危想得细、想得远。目前,舟曲县整合了地质灾害预警系统、山洪灾害防治系统、气象信息与短信预报系统,新建起统一高效的灾害监测预警决策指挥平台。为了给县城北部的三眼峪、罗家峪重新留出排洪沟、泄流的地理空间,将舟曲老县城 1.5 万人分流到峰迭新区,0.8 万人转移到兰州新区(见图 5、图 6)。在这次灾后重建中,地质灾害治理、生态修复和白龙江舟曲段治理等灾害治理与预防的投资,占到总投资额的四分之一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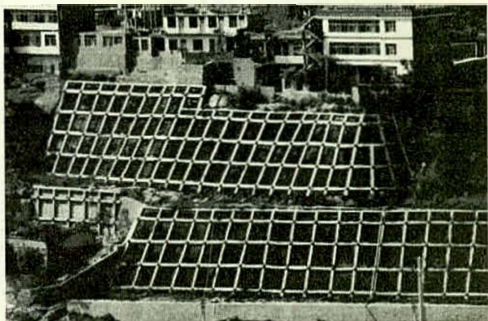


图 5:舟曲老城区滑坡治理工程



图 6: 舟曲三眼峪生态修复工程

四、类似泥石流这样的自然灾害能预防吗？

舟曲属高山峡谷地貌，区内沟谷陡峻，舟曲泥石流灾害规模巨大，舟曲县地质条件恶劣，用地十分紧张，通过这次实地调查，编纂组全体成员感慨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舟曲人民面对灾难不屈不挠重建家园的决心，同时也感受到灾害发生后国家举全国之力进行资源的有效配置，那么为什么不能把防治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工作提前做好，而只能在灾害发生后被迫去大力救灾呢？类似泥石流这样的自然灾害能防治吗？据有关资料介绍：1969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为避免或减少地质灾害可能对市地区造成的危害和损失，开展了全州城市地质总规划。经研究认为：1970—2000年内，加州城市化地区的地震、海啸、土地损失、滑坡、膨胀土、断层位移、火山和地面沉降等地质灾害问题，可能造成550亿美元的经济损失。针对存在的地质灾害问题采取措施后，可减少损失380亿元，为减少损失所采取的防治措施的总费用只需60亿美元，其效益与费用之比为6.2:1。显然，如果站在全局的立场去考虑问题，地质灾害应该实行“防治为主，救济为辅”的方针，这是利国利民的正确方针。

笔者认为从思想认识上来说可能存在几个问题：对于灾害是否会发生，存在侥幸心理，由于所预报的灾害在未来的某个时期才会发生，暂时还没有到“火烧眉毛”的地步，这就存在一个如何处理

眼前的短期利益与长期利益之间的关系问题；是不是有的人还会存在“一切等待上级”的思想拿不到上级拨给的防治经费，我没有责任；有了大灾害，上级和国家必然会来救助的，全国人民都会来“买单的”。

国土资源部地质灾害防治专家，归纳了他们的意见，认识到存在五个具体的人为因素影响全国地质灾害的防治：1、行政管理力量薄弱，普遍存在专职人员缺少的问题，很多县甚至一个专职人员都没有；2、基础调查程度较低，县地质灾害调查及部分详查成为当前防范工作的基础，但此项工作投入有限，工作程度不高，还存在盲区；3、全国还有很多地方没有地质灾害监测机构，现有的监测机构对地质灾害灾险情分析、调查排查巡查、监测预警、应急处置等方面的专业技术支撑能力还很薄弱；4、防灾减灾经费不足，地质灾害防治在调查、排查、巡查、监测预警、应急处置、搬迁避让、工程治理等需要大量资金投入。近年来，地方各级政府用于地质灾害防治的资金逐步有一些投入，但多数未纳入财政预算，没有形成固定的经费投入机制；5、群测群防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不完善，在地质灾害监测预警预报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挽救了大量生命的群测群防员队伍，现在全部是兼职人员，没有给予必要的经济待遇和基本的设备配备，多数人是在艰苦的条件下，义务承担地质灾害隐患的监测工作。

总之，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预报与防治，不仅仅是一个科学技术问题，更涉及到思想认识、经费、行政管理和防止腐败等许多问题，亟待我们一个一个地去解决。应该说，舟曲特大泥石流灾害的发生，不能仅仅把它归结为人类无法控制的“天灾”所致，我们人类应该尊重大自然，尊重科学规律。防灾减灾，任重道远，让我们共同为之努力奋斗。

(作者单位：甘肃省信息中心(经济研究院)国土室)

包家寨会议的历史意义与作用

高恒祥

内容提要:1933年11月3日,中共陕甘边区特委、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和红军临时总指挥部在包家寨召开会议,在认真总结寺村塬游击根据地和照金根据地失败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经过全体认真讨论,清算了杜衡的“左”倾错误,从危急中挽救了陕甘边区的党和红军,并且确定了陕甘边地区革命斗争的战略重点和根据地发展的基本格局,成为陕甘边区革命斗争的一个历史转折点。被史学家称为北方的“遵义会议”,毛泽东喻之为“狡兔三窟”之策。

关键词:陕甘边根据地 包家寨会议 历史意义

1933年11月3日,中共陕甘边区特委、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和红军临时总指挥部在包家寨召开联席会议,史称包家寨子会议。这次会议从危急中挽救了陕甘边区的党和红军,认真总结了陕甘边革命斗争的经验和教训,确定了建党、建军及建立革命根据地等一系列正确的重大决策,从而把陕甘边党和革命的路线转到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轨道,迅速地推动了陕甘边革命斗争的胜利发展,为推动西北革命斗争的胜利,迎接党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一、包家寨会议召开的历史背景

1933年6月至10月,陕甘边区乃至整个西北地区的革命连遭挫折,形势恶化,进入了最艰难的阶段。当时红二十六军红二团南下终南山,因孤军作战,在敌军重兵“围剿”下,弹尽粮绝,几乎全军覆没。党经过千辛万苦创建的第一支西北红军主力部队,被“左”倾机会主义执行者断送,加之共产党人王泰吉领导的耀县起义遭强敌镇压而失败。红二十六军政委杜衡等人被捕叛变,中共陕西省委得到破坏,陕甘边区一些党的基层组织也遭到

袭击。与陕甘边区斗争遥相呼应的陕南红二十九军和陕甘边照金根据地相连的渭北游击队根据地,在敌人的进攻下,也没有保全。敌军又向照金发动全面进攻,使照金根据地失陷。西北地区的革命形势急转直下,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危机关头。陕甘边的形势非常严峻,革命处境生死攸关。

为了挽救革命、寻找革命新道路,研究解决今后的战略方向和行动方针等重大问题,1933年11月3日至5日,陕甘边区特委、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和红军临时总指挥部负责人刘志丹、习仲勋、王泰吉在合水县蒿嘴铺(今甘肃省庆阳市合水县)包家寨子召开联席会议。这次会议,以毛泽东同志的红色政权理论为指导,总结了照金根据地斗争和薛家寨失守的经验教训,彻底清算了杜衡的“左”倾冒险主义,统一了思想,对当前党和红军面临最迫切、最重要的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因此,包家寨会议是在陕甘边区党和红军在无立足之地的最困难时刻及时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

二、包家寨的地理特点

包家寨是甘肃省合水县蒿嘴铺乡的一个小稍山原,人烟稀少。中共陕甘边特委选择包家寨作为地点召开会议,是因为包家寨有以下特点:

- 1.地势高亢,视野开放,四面沟壑纵横,周边为稍山密林,敌人无论从哪个方向来犯,都能及时发现,早先撤离。
- 2.地形独特,道路崎岖,敌人骑兵奔驰不开,步兵又不易到达,即使派飞机到达,也不容易找到目标。
- 3.距当时国民党重兵把守的西峰、庆阳(今庆城县)较远,即是风吹草动,也能妥善隐蔽,安全转移,免遭伤害。
- 4.邻近民众厚道,轻易不会走漏风声。这里当

地民团的团头是陕北迁来的刘世清，与刘志丹同籍同宗，早有交往，关系密切。

5.地理环境了如指掌，道路熟悉。刘志丹等早期西北共产党人自从“太白夺枪”、倒水湾整编，乃至照金革命根据地建立以来，往返穿梭奔波，无数次经过这里。

三、包家寨会议作出的决策

1933年11月3日至5日，陕甘边区特委、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和红军临时总指挥部负责人刘志丹、习仲勋、王泰吉在合水县蒿嘴铺包家寨召开联席会议，清算杜衡的“左”倾错误。刘志丹、习仲勋、高岗、张秀山、王泰吉、秦武山等党政军负责人出席了会议。这次会议以毛泽东关于红色政权的理论为指导，在认真总结寺村塬游击根据地和照金根据地失败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经过全体认真讨论，集中智慧，作出三项重大决策：

1.撤销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恢复红二十六军，成立四十二师，将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大队和耀县三支队合编为红三团，将红四团改编为骑兵团，以适应长途奔袭、快速出击和步骑协同作战的需要。

2.向陇东南梁进军，坚持在陕甘边界桥山山脉中段的南梁地区建立中心根据地，发展和壮大主力红军，建立红色政权，开创“工农武装割据”的新局面。

3.划分三个游击战略区，组建三路游击队总指挥部。陕北为第一路游击区，以安定为中心；陇东为第二路游击区，以南梁为中心；关中为第三路游击区，以照金为中心。三路游击区又共同以南梁为中心，红二十六军居中策应，并沿桥山子午岭山脉向南北发展。

四、包家寨会议的历史意义

包家寨会议各项战略决策的制定，推动了陕甘边革命的大发展。其核心是开辟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将陕甘边武装斗争重点转移到陇东南梁地区，为陕甘边根据地的发展绘制出了新的蓝图。这样，就解决了“在哪里建立根据地”这个关乎全局而又长期没有解决好的问题。习仲勋后来说：“从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到1935年

的8个年头内，在与敌人斗争中，在与地方党内机会主义斗争中，在毛泽东和朱德在南方发展革命武装与建立革命根据地的号召下，使我们在摸索中，找到了正确的道理，锻炼出了一条正确的路线。”明确创建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对于习仲勋来说，是其思想认识的一个新的飞跃。在此之前，根据地的中心已经两移其地点，一次为正宁的寺村塬，一次为耀县的照金，都建立了革命的临时政权，但是都失败了。包家寨会议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中心选在南梁，这是以刘志丹、习仲勋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充分运用马列主义和毛泽东“工农武装割据”思想理论，坚持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正确路线的关键，也是西北红军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未来斗争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后来，毛泽东十分赞赏地说：“刘志丹创建的根据地用了‘狡兔三窟’的办法，创出局面，这很高明。”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将这种多个根据地相互配合的方法推广到整个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实践中，同时将这种模式用围棋中的术语“做眼”称之。形象地说明了多个根据地的相互依托、相互配合，敌我相互包围和反包围这种根据地建设的新模式。我们知道，在下围棋时，任何一方要想在对方的包围中生存，必须“做眼”，而去必须做两个以上的“眼”才能生存和获胜。用“做眼”这个来比喻刘志丹、习仲勋等创造出来的根据地建设的新模式是再恰当不过了。

1934年2月，国民党陕甘军阀对南梁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一次的反革命“围剿”。当时根据地的红军和游击队总共不过1300多人，而且武器装备极差，敌我力量悬殊很大，形势十分严峻。刘志丹、习仲勋按照“狡兔三窟”的灵活战略战术思想，自觉排除“左”倾军事冒进主义的影响，针对敌人平分兵力和战线过长的弱点，制定了打破敌军大规模“围剿”的方针：充分发挥游击战争的优势和特点，集中主力红军，跳出外线，诱惑敌人，寻找战机，歼灭弱敌，达到彻底粉碎敌军“围剿”的目的。决定由第三路游击队牵制南线之敌，及时抓住有利时机，各个击破，彻底粉碎了敌人的第一次大规模“围剿”，在斗争中壮大了红军，巩固了根据地，

扩大了党的影响。到1934年10月后,陕甘边革命武装力量迅速壮大,军事斗争连续取得胜利。按照包家寨会议制定的以南梁为中心创建根据地战略构想,红二十六军首先开辟南梁中心苏区,经过艰苦奋斗,第二路游击区各游击武装相继建立,以桥山中段的南梁为中心,东到陕北的洛河川,西至陇东的悦乐川,边区县、区、乡各级红色政权相继成立,创建南梁革命政权的条件已经成熟。1934年11月7日,陕甘边苏维埃政府(南梁政府)在南梁正式成立,这标志着陕甘边区的革命斗争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这是毛泽东红色政权理论在西北地区的具体实践,是包家寨会议英明决策的成果,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于此同时,陕甘边区红军主力从南北两翼以跃进方式实施战略展开,分别在陕北和关中两个区域帮助创建根据地。

包家寨会议彻底摆脱了“左”倾错误的影响,标志着以刘志丹为代表的陕甘边党和红军在政治上的进一步成熟。在陕甘边游击战争蓬勃发展和照金根据地初建之始,党内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直接危害到了陕甘边区的革命斗争。王明“左”倾路线的执行人杜衡等人,在陕甘边党和红军中极力推行“左”倾错误,排斥刘志丹、谢子长等人的正确领导,诬蔑刘志丹同志的正确主张是“右倾机会主义”“上山逃跑主义”“土匪路线”等,进行排斥打击和残酷斗争。在杜衡等人的“左”倾错误的阻挠下,使陕甘边革命遭到了重大的挫折。包家寨会议在提高思想、统一对正确路线认识的基础上,对杜衡等人“左”倾错误进行了深刻的剖析,指出杜衡“左”倾错误主要是:一方面,在有利的形势下,提出打倒一切的“左”倾政策,放弃广泛地开展游击战争和扩大根据地的机会;另一方面,在强敌进攻面前搞军事上的冒险主义、退却逃跑,强令红军主力孤军南下,放弃照金根据地,结果给革命造成了不可弥补的重大损失。因此,包家寨会议的历史功绩,不仅在于确定了一系列正确的战略决策,更重要的是使陕甘边党和红军摆脱了“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干扰,也标志着以刘志丹为代表的陕甘边党和红军在政治上的进一步成熟,从而

在领导陕甘边革命斗争中,能够自觉地沿着正确的革命路线前行,顺利进入全盛时期。

综上所述,包家寨会议是陕甘边革命斗争走向胜利的重要转折点,是以刘志丹为代表的陕甘边党和红军自觉运用毛泽东关于红色政权理论解决陕甘边革命实际问题的一次重要会议。这次会议在全国率先摆脱了“左”倾错误路线的干扰,从危急中挽救了陕甘边区的党和红军,并且确定了陕甘边地区革命斗争的战略重点和根据地发展的基本格局,在西北革命史上有着重大的历史意义,被史学家称为北方的“遵义会议”。

参考文献

刘凤阁、任愚公主编《红二十六军与陕甘苏区》,兰州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710页。

赵鸿藻、丑万涛主编《合水史话》,甘肃文化出版社,2005年3月版,第105页。

李忠全、胡民新:“陕甘革命根据地史研究综述”,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党史通讯》1986年第3期,第26页。

曲涛主编《习仲勋在陕甘宁边区》,中国文史出版社,2009年9月版,第96、99、116页。

习仲勋:“跟着毛泽东走就是胜利”,《习仲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12月版,第165页。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忠心耿耿为国》《刘志丹纪念文集》,第7页。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29、427-472页。

郭含殿、乔孝堂主编《华池史话》,甘肃文化出版社,2005年版,第77、78页。

(作者单位:正宁县地方史志办公室)





“两当兵变”在中国革命史上的重大意义

魏泽民 卢立峰

“两当兵变”是中国革命史上一次具有重要的政治、军事意义的革命暴动，它不仅创建了陇南境内第一支红军队伍——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五支队，唤醒了陇南人民，鼓舞了陇南人民的革命斗志，在陇南播下了红色的火种，还策应了刘志丹开辟陕北苏区的斗争。部队北上探路的尝试尽管失败了，但为三年之后红二十五军长征征战两当，挺进陕北，扩大苏区奠定了基础，也为三大主力红军北上，把中国革命的大本营安放在大西北立下了特殊的功勋。本文拟从“两当兵变”的发生发展过程探究和发掘“两当兵变”在坚持党的领导、改造旧式军队、创建红军队伍、探索革命道路等方面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从1932年春季刘林圃、习仲勋等共产党人发动“两当兵变”，到1935年8月红二十五军征战两当，再到红二方面军发动成徽两康战役……两当成了陇南境内红军进入时间最早、活动最频繁的县份之一。红军在两当县留下了革命的火种，点燃了陇原红色革命的星星之火，为推动革命形势发展、实现三大主力会师做出了重要贡献。

一、“两当兵变”点燃了陇南红色革命的圣火，创建了陇南境内第一支红军队伍——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五支队

从1929年至1931年，中共陕西省委曾先后秘密派遣习仲勋、李秉荣、李特生、陈策、吕剑人、刘书林、陈云樵等人到杨虎城将军的国民革命军第十七路军警备三旅二团一营驻地凤县双石铺开展工作。习仲勋等到该营后，秘密建立了党组织。警备三旅二团一营的地下党组织遵照中共陕西省

委的指示，积极开展兵运工作，为发动兵变积极创造条件。

1932年初，举行兵变的条件基本成熟。警备三旅二团一营党组织向中共陕西省委汇报了兵运工作开展的情况后，省委同意在条件成熟时发动兵变。恰在此时，机遇从天而降。1930年蒋、冯、阎“中原大战”爆发，陕军为遏制马廷贤在陇南的势力，派陕西警备师第三旅第二团曹润华部从宝鸡到凤县、两当、徽县驻防。团部就设在徽县。其中王德修的一营驻防凤县双石铺、两当县杨店，杜子材的二营驻防徽县、成县。但曹润华不服陕西警备司令兼一师师长马青苑的调动，马青苑以此为由率部到徽县，想灭了曹润华的警备第二团。1931年9月中旬，驻防徽县的曹润华得到情报后，联合驻防成县的杨竹松警备第一团反击马青苑，爆发了“徽县战役”。双方激战七昼夜，曹润华兵败徽县，马青苑兼任了陇南绥靖司令。1932年4月初，曹润华下令一营与二营换防，这样，陕西警备三旅二团一营要奉命开往甘肃省徽县与二营换防，而一营官兵大部分是陕西乾县和礼泉县人，不愿到离家更远的陇南山区去驻防，所以士兵们的抵触情绪很大。利用士兵们的抵触情绪发动兵变，是千载难逢的机会。为此，一营的地下党组织即时秘密召开党员会议，决定抓住一营与二营换防的机会发动兵变。方案确定之后，党组织派遣地下党员、一营营部文书刘书林前往西安，向中共陕西省委第二次汇报兵变的具体行动计划，省委同意换防的机会发动兵变，并指示兵变发动后，要迅速将部队拉到旬邑，与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刘志丹部汇

合。随后,中共陕西省委派省军委秘书刘林圃为特派员,由交通员张克勤做向导护送,一同前往凤县,具体指导兵变行动。

刘林圃到达凤县后,在双石铺丰禾山庙内秘密召开了一营党员会议,决定乘一、二营换防,在甘肃两当县城宿营时,于午夜12时举行兵变。根据省委指示,兵变由刘林圃协助一营的地下党组织全面领导。几天后,一营果然接到团部命令:开往徽县换防,接替二营。

1932年4月1日拂晓,国民革命军第十七路军陕西警备三旅二团第一营的一、二连和机枪连(三连驻两当城),从凤县双石铺出发,向甘肃两当、徽县开拔,刘林圃等随军前行。黄昏时到达两当县城,与驻守两当县城的三连会合。当晚就在县城宿营。

晚上八点多钟,刘林圃与一营的地下党组织决定,在县城北门外外的一个马车店内秘密召开营党委扩大会议,全营所有共产党员共计30多人全部参加了会议,拥护发动兵变的非党干部也列席了会议。会议期间,习仲勋简要向大家讲明会议意图,并介绍了中共陕西省委派来指导兵变工作的特派员刘林圃。刘林圃在会上传达了中共陕西省委的指示,讲述了全国的革命形势和举行兵变的意义,分析了兵变的有利条件及兵变后去陕甘边与刘志丹、谢子长率领的陕北红军会师的计划,到会人员一致同意。会议推选许天洁为兵变总指挥,并拟定了晚上发动兵变的具体详备的安排部署。会议作出以下三项决定:

一是推举许天洁为兵变总指挥;

二是兵变在午夜12时(4月2日零时)举行。由许天洁鸣枪为号,各连先将反动连长处决,不是党员的排长下枪带走;

三是吕剑人负责一连并收缴机枪连的枪械;二连一排长高瑞岳带领全排士兵去营部解决陕西警备第三旅二团一营营长王德修和警卫班;左文辉、张子敬带领本排战士分别把守东、西两城门。各连、排完成任务后,迅速将队伍带到北门外集合。

1932年4月2日零点,兵变总指挥许天洁发出行动信号,各连起义战士开始按计划纷纷行动起来。4月2日凌晨兵变开始,各连驻地枪声大作,

起义官兵先后杀了一连连长韩生信、二连连长唐福亭、三连连长张玉锡。左文辉、张子敬等带领各排坚守东、西两城门。高瑞岳带领全排去抓陕西警备第三旅二团一营营长王德修,王德修听到枪声,急忙翻墙越城,逃往西山。机枪连代理连长被一名战士击毙,但机枪连凭借其强大的火力,与吕剑人率领的一连形成对峙局面,战斗进行得非常激烈,机枪连始终把握主动权,吕剑人无法解除其武装。形势严峻,起义总指挥许天洁下令三个步兵连200多人在各连负责人率领下迅速撤出两当县城,到北门外姚沟渠集合,刘林圃问起义战士愿不愿回陕北找刘志丹当红军,战士们一致表示愿意。随后部队连夜北上,沿广香河向太阳寺方向前进。

4月2日凌晨,从两当县城拉出来的200多人的起义部队,沿两当河北上,急行军70华里,4月2日上午到达两当县境最北端的太阳寺休整。刘林圃利用休整的机会宣布,起义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五支队”,这是中国共产党在陇南境内乃至甘肃境内创建的第一支红军队伍。经民主推举,刘林圃任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五支队政委;习仲勋任中共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五支队队委书记;许天洁任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五支队支队长、作战总指挥;吕剑人为一连连长,高瑞岳为二连连长;左文辉为三连副连长,协助许天洁带兵。

当天下午,整编后的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五支队从太阳寺向北继续进发,约一周后到达陕西省宝鸡县(现宝鸡市陈仓区)西部的渭河岸边,渡过渭河后,经过洞峪、赤沙、香泉,沿千阳——陇县边境进入陇县八度、娘娘庙一带,不久进入千阳县北端的高崖、花花庙。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五支队沿途与敌军发生了多次战斗,取得了一些胜利。但当部队行至甘肃省灵台县页岭一带时,被国民党杨子恒部阻断了去路。为保存实力,起义部队进入麟游县以北的催木一带。指挥部根据部队当时的处境,决定由吕剑人、刘林圃去乾县侦察消息,设法把部队拉到乾县去;习仲勋、左文辉侦察秦包公路是否有国民党军把守;由许天洁、李特生率部去永寿县的岳御史村休整,待两路侦查人员回来后再出发。

当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五支队开到岳

御史村时,由于对沿途道路和民情不熟,结果遭到盘踞在这一带的大土匪头子王结子匪军的包围,激战数小时,终因环境不熟,缺乏经验,加之起义部队长途行军,疲劳过度,力量悬殊,寡不敌众,弹药不足,伤亡惨重,使起义部队陷于失败。

在敌强我弱,实力悬殊,经过几场恶战后,部队伤亡和减员非常严重,已经失去了战斗力的情况下,最终在陕西永寿县岳御史村被打散,没有完成北上的计划。尽管如此,“两当兵变”的历史意义仍然不可低估:

1.“两当兵变”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下发生在西北地区的一次武装暴动,也是在甘肃境内发动的最早的一次武装起义,党的坚强领导是兵变成功的根本保障;“两当兵变”极大地震慑了敌人,沉重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嚣张气焰,还唤醒了陇南人民,鼓舞了革命斗志,在陇南播下了革命火种,锤炼了革命意志,坚定了革命信心,积累了斗争经验,锻炼和培养出了一大批革命骨干,显示了中共地下党组织卓越的组织能力和旺盛的战斗力的,显示了中国共产党人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不盲从上级指示,避免了武装起义功败垂成,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在党的革命军事史上写下了重要的一页。

2.“两当兵变”虽未完成山西省委关于北上与刘志丹部队会合的战略计划,但为三年后红二十五军征战两当,北上与刘志丹、谢子长领导的陕北红军会师做了探路工作,从这个意义上讲,“两当兵变”就成了红二十五军北上会师的前奏。

此后,习仲勋化装逃往彬县亭口镇,找到党的地下联络点——亭口镇的一个骡马店。他躲进骡马店的一个拐窑子里,一病不起。不久,街道墙壁贴出印有习仲勋头像的国民党西安市政府告示,上写:“赤匪习仲勋,年19岁,陕西省富平县人,参与指挥了两当兵变。谁若抓住习匪赏洋一千元,报信者赏洋五百元。”当时的习仲勋,一边养病,一边托人打听刘志丹的下落。决心寻找陕甘游击队和刘志丹,建立以子午岭为轴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此后,病情缓解后,习仲勋秘密潜回他的家乡富平县。

1932年6月的一天下午,在富平县立第一高

小院子里,19岁的习仲勋,坐在一座教室的房下石台阶上,仰望天空,神情痴呆。“两当兵变”的过程又一幕幕浮现在他的眼前。正当他沉浸在痛苦回忆之中的时候,一个头戴礼帽、身穿长袍的中年人迎面走来,他叫程建文,是中共陕西省委的负责人之一。习仲勋向他提出要去陕甘边苏区工作,程建文同意他的想法,于是,在一个夏日的傍晚,习仲勋和程建文每人戴了一顶大草帽,悄悄出了富平城,行走在田间小路上。此后,习仲勋又转赴渭北、三原等地开展革命工作,参与创建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

1933年3月,习仲勋任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部政委、中共陕甘边特委军委书记、陕甘边革命委员会副主席。从1934年2月起,习仲勋先后任陕甘边革命委员会主席,中共陕甘边特委代理书记、军委书记,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主席,领导陕北红军反击国民党军队对陕甘边苏区的多次“围剿”。

1935年,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毛泽东在几处村落墙壁和大树上,看见张贴的《陕甘边苏维埃政府布告》,上面署名“主席习仲勋”。后来,毛泽东在瓦窑堡见到习仲勋后,十分惊讶于他的年轻,此时习仲勋年方22岁。

二、红二十五军是进入陇南的第一支长征队伍,两当成了红军进入陇南的第一站

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是在第四方面军主力离开川陕革命根据地开始长征后,由中共鄂豫陕省委于1932年在鄂豫陕根据地重建起来的一支革命武装。

1934年11月11日,中共鄂豫皖省委在河南省光山县花山寨召开会议,决定率领红二十五军向平汉铁路以西实行战略转移。11月16日,红二十五军高举“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旗帜,由河南省罗山县何家冲出发开始长征。12月10日,进入陕南,成立鄂豫陕省委,并创建了鄂豫陕苏区。

1935年7月中旬,徐海东等人从缴获的《大公报》上获得一则“共军一、四方面军在川西会师后,继续向北逃窜,先头部队到达松潘”的消息,得知红军主力正在过草地向川甘边界行动后,中共鄂豫陕省委代理书记、红二十五军政委吴焕先在长安县沔峪口主持召开了紧急会议,作出了西出

甘肃,破坏敌军后方,配合主力红军行动的决定。7月16日,红二十五军攻占了陕西省留坝县江口镇,在那里进行了休整和整编。

1935年7月31日,结束休整的红二十五军继续长征北上,迅速攻占了川陕公路上的重镇双石铺,并俘获一名敌军少将参议以及报纸、文件若干。其中有一份1935年7月16日的《大公报》,上面有“松潘西南连日有激战”的字样;7月22日的报纸又有“朱、毛部已越过六千公尺的巴朗山,向北行进……似有窥甘青交界之洮州、岷县、西固等处”的文字。红二十五军在没有电台的情况下,根据俘虏的口供、《大公报》等报纸的消息和缴获的敌军文件等综合分析判断,中央红军正在北上,国民党军队的部署,主要意图是堵截中央红军北上之路,决定立即进入甘肃,威胁敌人后方,牵制并消灭敌军有生力量,减轻敌军对中央红军的压力,积极配合中央红军北上。

8月2日晚至3日晨,红二十五军撤离双石铺后西进,上午10点左右,进至距两当县城13公里的灵官殿村。先头部队从县城东山的北崖沟、祖师山、刘坪、贯沟一带分三路向两当县城发起进攻。甘肃两当县与陕西凤县毗邻,公路距离约30多公里,在红二十五军攻占凤县双石铺后,两当守军及国民党地方政府早就有了准备。据当日驻守的两当保安队第一分队长董全德后来回忆:“红军来的前几天,县政府就布置守东山的一个碉堡,西山上的二个碉堡。”说明敌军实际上早有准备。

当时,驻守两当县城的保安队由3个分队组成,县长朱志和兼任队长,副队长是乔玉良,一分队队长是董全德,二分队队长是朱玉川,三分队队长是张兴汉。每个分队25人,共计75人。保安队有步枪22支,手榴弹300枚。另外,两当县城还有一个警察队,下辖3个班,共20多名警察。

据《红二十五军战史》记载,3日早上,红二十五军以手枪团和军部交通队一部,已化装潜入城内。红二十五军进攻两当县城的战斗打响后,县保安队副队长乔玉良、分队长朱玉川带了一分队先在南门外死命抵抗,但由于红军战士火力很猛,他们无力抵抗,只得后退守西山的碉堡中负隅顽抗。又据董全德的回忆,在红二十五军攻城开始时,实际上把守东山碉堡的姚有德,把守西山碉堡的一

分队长董全德都已事先逃跑,只有副队长乔玉良、二分队长朱玉川带领的30多名士兵死守野狐嘴碉堡抵抗。双方交战不到2个小时,红军战士已有7人伤亡。红军指战员通过察看地形,旋即派一部分兵力迂回到野狐嘴后面的刘家沟,再顺沟上到山顶,最后迂回包抄,活捉了乔玉良、朱玉川及30多名保安队士兵。

在红军战士攻打两当县城时,国民党徽县驻军还派了一个保安分队驰援两当,当增援的士兵行至距两当城数公里的老鹄梁时,碰见了从两当溃逃出来的保安队士兵,说两当县城已经失守,徽县保安队随即又退回徽县。

红军进入两当县城时,国民党两当县政府军政官员和豪门富户都已逃之夭夭。红军进城后打开监狱,释放了多名在押人员,对被俘士兵进行教育后管了一顿饭,给每人发了5块银元,全部放回。当晚在东城门外的河滩上,红军处决了两当县长乔玉良、保安二分队队长朱玉川和两当县第五区副区长罗朝礼。

红军在两当县县政府门口用锅墨写了“只有苏维埃才能救中国”、“红军保护邮政、学校”、“打倒土豪劣绅”等标语,还以化名马子游司令的名义发布了安民告示。

攻占两当后,红二十五军参谋长戴季英在县城发现了一家由叔侄俩开办的照相馆,就让他们把照相机带到部队里来,给徐海东、吴焕先和其他军领导拍了几张照片。

红二十五军在两当县城住宿了一夜,军部就设在东街小学(现公安局旧址)。次日凌晨,红二十五军离开两当县城,沿着两当河北上太阳寺,上午10点左右到达太阳寺村,在太阳寺村共抓了4个人,一是国民党两当司法庭庭长丁玮,一是两当县第五区区长张公生,这两个人被红军押到前川村处决。另外误抓了两个人,一个是陕西小商人魏加科,误当成声名极坏的联保主任魏顺玉,也在前川村被杀掉;另一名穿着干净的凤县老头,是一名教书先生,红军弄清了他的身份后,将他放回。

8月4日晚,红二十五军在两当县太阳寺前川村宿营,次日凌晨进入天水利桥。此后,红二十五军经过一段艰苦的战斗历程,先后在甘肃秦安、静宁、隆德、平凉等地打击国民党军队,切断西兰

公路达18天，牵制了国民党军队大量有生力量，冲破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配合了中央红军的北上，继续向北进军，实现了与陕甘边区红军胜利会师的战略目标。

红二十五军在两当的活动，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宣传了红军，使国民党对红军的丑化宣传和毒化宣传不攻自破。红军到来之前，国民党对红军的毒化宣传早已广为流传。红军到来后，除通过“安民告示”标语等正面宣传手段消除负面影响外，还通过严明的军事纪律教育群众，不但对群众财物秋毫无犯，买卖公平，还给在押人员和国民党普通士兵给吃的，发路费，说明红军打的是土豪劣绅，

解救的是贫苦老百姓，让老百姓感到红军确实对穷苦人好，是贫困老百姓的军队和救星。

红二十五军与陕北红军的胜利会师，成了三大主力红军北上的先导，为三大主力红军北上打了前站，做了探索道路的工作，把“两当兵变”后成立的陕甘工农游击队第五支队没有实现的北上与刘志丹红军会合的战略意图变成了现实，为把中国革命的大本营安放在大西北，建立了特殊的功勋。

(作者：魏泽民，陇南市西和一中高级教师
作者：卢立峰，中共西和县委党史办主任)

古代帝王赦天下不赦赃官

中国古代封建帝王为彰显其“仁德行政”，常以“施恩”为名大赦天下。有时是赦免释放一些轻罪的犯人，有时是大赦到底，连死刑犯也免罪释放。但纵观封建帝王“大赦天下”的史实，就会发现每次的“大赦天下”，都未曾赦免贪官污吏。

据史料记载，唐王朝下诏大赦天下在中国历史上最为频繁。唐太宗贞观四年(公元630年)，国力强盛，四夷臣服。在这种大好形势下，唐太宗李世民便下诏大赦天下，规定不论罪恶轻重，包括死刑在内均予以赦免，但赦令中却特别申明：“官吏枉法受财罪犯不在赦免之列。”

天授元年(公元690年)，武则天称帝，改国号为周。久视元年(公元700年末)，300多名囚犯在监狱墙上伪造了“圣人迹”。到半夜，这些囚犯一起大叫，内使推问，这些人道：“昨夜有圣人见，身长三尺，面作金色，云‘汝等并冤枉，不须怕惧。天子万年，即有恩赦放汝’。”内使便点燃火把照看，果然见墙上有巨大的足迹，于是报告武则天。武则天

认为此乃“祥瑞”，便于第二年初颁诏改年号“大足”，并下令大赦天下，但明确规定“其犯十恶、官人枉法受财、临主监守自盗……及常赦所不免者，并不在赦列。”可见，武则天也把贪赃枉法、监守自盗、知法犯法、执法犯法的官员大吏，与世人从来不容的“十恶不赦”者同等看待，仍然坚持不赦贪官。

唐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安禄山、史思明起兵发动政治叛乱，史称“安史之乱”，唐朝自此由盛而衰。第二年，玄宗李隆基逃往四川，肃宗李亨即位于夔武，改年号“宝应”。为安定民心，挽救残局，肃宗一即位，就下诏“官吏犯枉法赃，终身勿齿。”意思是说，贪官到死也不再录用。同时颁布大赦令“天下囚徒，凡死罪者减为流放；流放罪以下者，一律赦免”，但也申明“官吏贪赃枉法者不在赦之列”。

(原载《党课》)

是谁最先发现了张掖丹霞地貌

车安宁

近日,看到央视四台《远方的家·百山百川行》栏目拍摄的《百山百川行(115)——祁连山:七彩丹霞》(2013.10.10播出),向观众介绍了位于甘肃省河西走廊中段的张掖丹霞地貌,片中除了展现气势磅礴的七彩山峰和山脉,逶迤陡峭的奇岩怪石外,还特别采访了彩色丘陵第一人,一位当地的雷姓农民,述说着他与七彩丹霞的不解情缘。

应当说,这部专题片拍得很好,很有感染力,但是,其中却把发现张掖丹霞地貌的第一人搞错了,属于调查研究不够。

如果上网查看,还有一位姓乔的当地农民,退伍军人,也被介绍为发现丹霞地貌的第一人。据说在当地还有多人都自称自己是丹霞第一发现人。但是,据我掌握的第一手资料,发现张掖丹霞地貌的第一人应当是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原张掖军分区政委、中共张掖市委常委郑复新先生。

为什么这样说?

首先,我们得搞清楚,在现代社会对于类似地貌的发现人应当怎样认定。我以为需要具备以下五个因素或五项条件:

- 一、亲历现场,亲眼所见,并发现其独特之处;
- 二、最先用公认的现代技术手段加以记录,如:摄影、摄像等;
- 三、最先揭示其发现价值,并给予发现对象以科学命名;
- 四、最先得到官方或学术界的认可;
- 五、最先利用正规的社会媒体公开发布并传播。

如果我们承认以上认定条件,那么,该纪录片中的那位雷姓农民固然可爱,虽然他也为这块独特的丹霞地貌的传播做出了贡献,但是,从科学发现的角度讲,他却并不能成为发现彩色丘陵的第

一人。

其次,郑复新先生可否有资格称为彩色丘陵的第一人呢?请看以下发现过程的详细情况。

一、2003年10月12日的《兰州晚报》用一个整版的篇幅,以《张掖丹霞地貌揭秘》为题,在国内首次发表了郑先生的部分摄影作品,并全面介绍了其发现和拍摄经过。次年3月19日《甘肃日报》也以《截取“丹霞”作画观——郑复新和他的丹霞地貌摄影作品》为题,做了相关介绍。文中介绍道:“20世纪即将结束的时候,郑复新调到了张掖工作。在此后的约6年时间里,他利用一些闲暇,几乎跑遍了张掖周围方圆数百平方公里的山梁沟壑,用自己的镜头发现并记录下了许多震撼人心的精彩瞬间。其中最令他激动最令他自豪的发现,当属张掖南群丹霞地貌群中一处尚未被摄影界所注意的非常绮丽的丹霞景观,这就是笔者从郑复新摄影集《丹霞奇观——张掖丹霞地貌揭秘》中的作品中所看到的景观。”

客观地说,张掖独特的彩色丘陵已经在地球上存在了几百万年,几千年来在华夏大地上不乏亲历现场、亲眼目睹的人,特别是最近几十年,在这块人迹罕见的山区,也不乏有牧羊人和发菜捡拾者的足迹,但他们都是当地的百姓,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甚至有个别摄影爱好者偶尔所至,走马观花,匆匆而过,也并没有发现其独特的存在价值,如同片中那位雷姓农户所述,他自小就看惯了这里的山川地貌,还“以为天下的山都是这个样子”,因此并不觉得有什么稀奇之处。

郑先生作为一名职业军人,不仅对山川地貌有着独特的敏感性和洞察力,并且见多识广,业余又爱好摄影,善于捕捉大自然的奇妙之处,因此才会在2002年10月的那个假日,在梨园河两岸拍

片时,当第一眼看到彩色丘陵时,产生“最令他激动”的感触,而不会认为“天下的山都是这般”。这应当就是他发现了该地貌的存在价值。

二、郑先生在亲临现场的第一时间,就用公认的现代技术手段做了最全面的记录。据他个人回忆,当时他不辞辛苦,带着一名士兵,在根本没有路的地方,十分艰辛地登上了几座山峰,欣喜中一下子拍完了十几个摄影胶卷,甚至还在回来的时候迷失了路,有差点回不来的感觉。

三、据郑先生回忆,在其后的2002年10月至2003年8月间,他又几次亲临山区及周边地带,全面地对该地形地貌进行了全方位拍摄。起初,他并不敢认定,这种地貌就是丹霞地貌。为此,他专程去兰州大学地理系,找到了他并不相识的系主任王乃昂教授,王教授在仔细看了他拍摄的多幅照片时,给予确定,说这种地貌就是丹霞地貌无疑。这样就给了郑先生对此命名的科学依据。后来王教授也多次带领学生去作了实地考察。

四、2003年底,以中共张掖市委、张掖市人民政府的名义,率先正式出版了由郑复新署名的《丹霞奇观》彩色画册(香港科文出版公司出版)。画册之首,时任中共张掖市委书记李希、张掖市市长田宝忠合名作序,中国摄影家协会理事、甘肃摄影家协会主席王杰撰文介绍并做责任编辑。画册所选44幅精美作品,全部源自郑先生亲手拍摄。这就说明,这一发现是最先得到官方和学术界的认可的。

五、继2003年10月12日《兰州晚报》和2004年3月19日《甘肃日报》刊文披露之后,2004年第四期《读者欣赏》、《摄影世界》、2004年第6期的香港《中国旅游画报》、2004年第5期《中国西部》杂志、2004年6月18日《中国摄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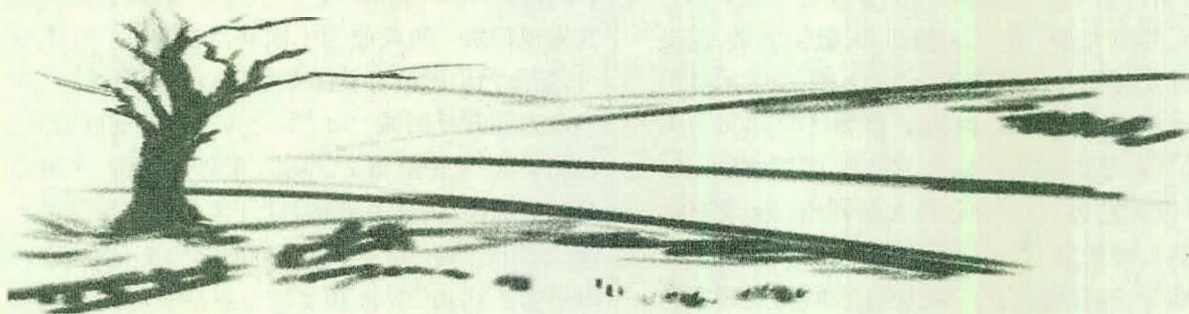
报》等刊物都分别以较大篇幅,登载了郑复新的摄影作品并对其做了相关介绍。

之后,2004年,郑复新的10幅“张掖丹霞”组照,入选参加了第21届全国摄影艺术展,并获优秀奖;同年,其20幅作品组照入选参加第6届中国摄影艺术节展览,其间,张掖电视台也作了专题采访报道;次年,2005年第1期《西北民兵》以一个版面专门刊登了其摄影作品;特别是2005年《中国国家地理》杂志增刊以两个版面的篇幅,在专载了相关的作品和介绍之后,并把张掖丹霞评为全国七大丹霞的第六名,这也是张掖丹霞首次得到了国家级专业权威刊物的认可。此后,又有多家出版社及杂志、刊物从不同角度,以不同方式刊载过郑复新的作品和介绍。还有2013年《中国体育彩票》和《甘肃旅游明信片》也都分别采用了郑复新的摄影作品。

以上这些情况充分显示,郑复新的发现行为和发现过程都完全符合前文所述的五项条件。

值得一提的是,如今,张掖丹霞已经被评为中国“最美七大丹霞之一”,成为国家地质公园,国家4A级旅游景区,为当地政府和百姓带来不菲的收益,但是郑先生多年来从未因此发现而得到一分钱利益,反而自己花了不少钱和时间精力去做宣传,包括他接待、陪同了许多素不相识的摄影爱好者,也包括他离开张掖工作以后,对于这样一个好人,《远方的家·百山百川行》栏目拍摄组有所遗漏,实在让人们在感慨之余不免有些遗憾。难道我们就不能给予他一个第一发现者的名分?

(作者系甘肃省地方史志办公室副主任)



中国抗日救国军甘肃第一路军司令 李和义事略贡献及其“叛变革命”辨疑

马廷义

1936年，红四方面军进入甘肃南部地区，成立了以岷县为中心的甘肃工委和抗日救国军总司令部，朱德任总司令，张国焘任总政治委员，王维舟为“甘肃抗日救国军”司令。8月14日红四方面军第二纵队四军之十师、十二师及妇女先锋团在军长陈再道、政委王宏坤的率领下，占领临潭县城新城。8月19日，红军在临潭新城召开各阶层代表参加的千人大会，朱总司令从岷县三十里铺赶来参加会议，会上宣布成立临潭县苏维埃政府，甘肃省工委西路工委书记黄火青代表中国抗日救国军总司令部宣读了朱德总司令任命李仲芳（即李和义）为中国抗日救国军甘肃第一路军司令、张先进为政治部主任的任命书，李仲芳当日就任中国抗日救国军甘肃第一路军司令。

一、李和义事略

李和义（1901—1939），原籍甘肃省临夏州尹集，字仲方，有的资料中写为仲芳。清光绪年间，随父李吉庆迁居夏河，曾任拉卜楞保安司令黄正清司书。据新修的《李氏族谱》载：李仲方，学业恪成，教学俱佳，写一笔好字，说一口流利的藏语，与夏河地方德高望重的僧俗人士交往甚密，当时亦结识夏河拉卜楞保安司令黄正清。并受聘担任衙门师爷一职，人称“李师爷”。

民国19年（1930年），鲁大昌持蒋介石颁发的“甘肃讨逆军第二路司令”的委任状赴拉卜楞找李和义共图大业。二人一拍即合，盟誓结义，遂决定各自发展势力，同谋政事。1931年，鲁大昌被国民党统编为甘肃新编14师，鲁委任李和义为团长，派其率部驻临潭县温旗。李在临潭搜罗枪支弹药，继续扩充势力。之后，鲁大昌利用李和义剪除了岷县劣绅张忠，为鲁立足岷县扫除了障碍，李立下了功劳，遂升任旅长。李为应变所需，又将家迁

至临潭冶力关，后李和义被鲁派往武都驻防。时有马廷贤盘踞陇南，兰州刘郁芬特请四川军阀邓锡侯、牛锡龄等率部入甘援讨马廷贤。川军入陇南后，李和义部队突袭其后卫部队，截获大批武器。鲁闻讯命李将战利品运交岷县，李违命不理，欲另立山头。后有陕西孙蔚如部与川军对峙，川军败退武都，李不容川军入城，川军以调虎离山之计大败李军。李逃至文县，收罗残部再投鲁大昌，鲁下令毙李，经左右恳求，免李一死。为利用他，授营长职，李请求鲁派他驻守临潭冶力关。1934年新疆军阀盛世才托鲁大昌在洮岷一带招兵买马，鲁派李和义招兵赴疆。李遂从临夏及洮岷招千余人，从临潭出发，至玛曲黄河渡口时遭马步芳军阻击，伤亡颇重，李率残部返回。鲁闻知后，为除后患，派一营骑兵截击，李和义率30余骑逃往冶力关，暂避锋芒。当时民谣有：“李和义上新疆，上不去者下来了，下来和红军汇合了”。

1936年8月，红二、四方面军长征抵川甘交界，李率部迎接，为红军充当藏语翻译，从腊子口进入岷县，再到达哈达铺休整，得到朱德、徐向前的接见。李和义建议红军先占领临潭，后攻取临洮、兰州。红军纳其建议，朱德派李和义随红四方面军于8月14日进驻临潭新城，并让他当向导，发动群众开展工作，并给李的任务是迎接从黑措（今合作）下来的红军，让他们在新城驻扎休整，因其表现积极，被吸收为中国共产党党员。8月19日，任命为中国抗日救国军甘肃第一路军司令。李奉命率部开赴旧城，与红军合兵击败马德胜骑兵。1936年9月底李和义部随红军离开临潭，东进漳县至新寺镇后，遇阻而被打散，两名红军指导员失踪，李和义与几名手下星夜逃回冶力关，在临卓一带潜藏。1939年，李和义藏在卓尼县扎古录镇录

日岔一村民家中时被捕，解押岷县被岷县专员胡守谦处死。

二、李和义对红军占领甘南地区时的贡献

(一)为顺利实施《岷洮西(固)战役计划》中“占领洮州地区”发挥了重要作用。

1936年8月5日中共中央西北局根据党中央指示和当时的形势，制定了《岷洮西(固)战役计划》，其战役纲领中要求“我军以迅雷手段在敌人主力尚未集中洮岷之前，在运动战中大量的各个消灭敌人，先机取得洮、岷、西固地区，主力向天水、兰州方面进展，策应一方面军一致消灭敌人为目的。……第四、第三十一军为二纵队，以夺取洮州旧城消灭该地敌人之目的。成功后主力向临洮方面活动，并以一部向夏河、临夏发展掩护我军左翼侧”。

李和义于1933年西进新疆未能成功，从玛曲渡口返回临潭途中又遭鲁大昌截杀，便投奔夏河拉卜楞黄正清处避居一二年。后黄感到他保护李已是力不从心，便向李建议，投奔共产党，因为黄在1925年反抗马麒占领夏河的斗争中就与共产党员宣侠夫结识，在宣侠夫的帮助和支持下成立了“藏民文化促进会”，并取得了反马斗争的胜利。

恰逢1936年，中国工农红军到达甘川边境，8月19日红四方面军一纵队在徐向前的指挥下进入大草滩，继而向岷县进发。先头部队包围了岷县城，发起了二郎山战役。“在红军包围岷县城时，有个叫李和义的来找朱总司令（据说他曾在鲁大昌部下当过旅长），说他联络了许多人马，要求跟红军一块走。朱总司令给了他个‘游击司令’的头衔，让他自己招兵买马，组织队伍”。牙含章同志曾记述到“当时有一个人叫李和义，临夏县人，曾在旧军队中作过事，当红军二、四方面军到达岷县时，李和义率领数百个农民参加了红军，其中就有王仲甲”。李和义与王仲甲在岷县清水参加了红军，并得到朱德、张国焘、徐向前的接见。

临潭古称洮州，是甘南南部重要的贸易重镇，也是从汉区进入青海、四川藏区的咽喉之地。新城是当时的临潭县政府的住地。旧城是重要的茶马互市。攻占洮州意味着占领了进入川青藏区的门

户。红二四方面军未到甘川边境时由国民党新编十四师鲁大昌部团长李希发驻军，红军到达甘川边境后，于1936年8月9日，鲁大昌电召李希发撤往岷县，此时临潭县城除几个警察维持秩序外，几乎是一座空城。李和义对临潭的情况了如指掌，所以他建议红军进占洮州，进而相机进攻临洮和兰州。这也与中共中央西北局《岷洮西战役计划》不谋而合。

1936年8月14日红军先头部队十二师以李和义王仲甲为向导走出了马营仓，沿洮河而上经羊化桥、新堡沟，翻红山到达临潭新城，兵不血刃地占领了临潭县城。8月19日红军在新城成立了临潭苏维政府，李和义被朱德亲自任命为“中国抗日救国甘肃第一路军”司令。当日李和义以中国抗日救国军甘肃第一路军司令部名义发布《给西北汉回蕃各族父老兄弟姊妹》的布告。“红四方面军在甘南休整期间，是以‘中国抗日救国军甘肃第一路军’的名义向全军和人民群众发布命令的”。8月24日，红四方面军四军和妇女团先头部队在李和义部的配合与引导下占领了新城西60多里的旧城。李和义率部配合十师和妇女团与马部芳部马彪旅展开激战，“9月13日马彪部攻陷旧城四周的红军工事，红十师退守旧城城内，马彪围旧城七日，红军殊死战斗，李和义奉命支援，配合红军骑兵师解旧城之围。9月19日，马彪部被红军和李和义重创，退至陌务旧寺，9月21日马彪部退出黑错”。使红十师和妇女先锋团顺利撤出旧城，随大部队转移。使红军顺利完成了《岷洮西战役计划》“攻占洮州的战略意图”。

(二)积极协助红军协调与当地藏族土司的关系。

红军到达临潭后，西路工委书记黄火青同志亲自抓统战工作，其时卓尼土司杨积庆持守土自保的态度。黄火青同志派李和义与杨吉庆秘密联系，表示红军不进入卓尼藏区，杨吉庆遂即秘密遣人到新城送书信及礼物。

夏河麦吾千户杨步云是李和义的朋友，1936年8月杨步云派遣完代才让去临潭旧城送慰问品与红军接触，“并带回来大量的红军宣传印刷品，

在马步芳部队的驻防区黑错(今合作)张贴散发”。

黄火青同志记述道:“卓尼大土司姓杨,那时才几岁,据说家里有电台,和美国人往来。我们通过李仲芳和他有过信件来往,他还送过我们一匹马。解放后,他当了地方人民代表,曾到过北京。洮州有个麦吾土司,我们也和他联系过”。“在这数十日中,他组织的妇女群众,给红军做鞋袜,缝织干粮袋等。总之他为红军做了不少休整工作”。

(三)李和义提供的真实的地情地况,使张国焘在“洮州会议”上最终改变了西进主张,挥师北上会宁会师。

1936年9月16日至18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在岷州城西三十里铺召开了扩大会议,会议否定了张国焘西出青海、新疆,企图另开局面,而反对北进与一方面军会师的主张,会议重新肯定了甘孜会议确定的北进方针,决定一、二、四方面军在会宁大会师,制定了《通(渭)庄(浪)静(宁)会(宁)战役计划》。

1936年9月23日,朱德来到漳县前敌指挥部,召开了西北局会议,张国焘在会上软硬兼施,意图推翻岷州会议的决定,与会同志为顾全大局和团结,暂时同意了张国焘西进的主张。此前朱德同志为张国焘出尔反尔的态度,曾愤懑和无奈地给中央发了电报“我是坚决遵守这一大原案,如将此原案推翻,我不能负此责任”。

漳县会议后,徐向前带领先头部队向洮州进发,“过了洮州向老乡调查,据老乡说,现在黄河对岸已进入大雪封山季节,气候寒冷,道路难行”西进遇阻,徐向前返回洮州,将调查情况向朱德、张国焘汇报,并提出不能西进,应挥师北上。9月27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在洮州新城召开了会议。朱德、陈昌浩、徐向前等大多数同志同意北上会师,反对孤军西进。但张国焘仍坚持西进计划,在十几个小时内给中央发了四次电报,谈西进理由,会议在激烈的争吵声中进行。这时需要一个熟知当地地情地况的人来提供情况,而李和义就成为最佳人选,因为徐向前走的是临潭以北永靖黄河渡口,宣告了渡河的失败,李和义1933年上新疆时走的是临潭以西玛曲黄河渡口,他也以渡河失败而告终。

黄火青同志在他的回忆录中详细记述了洮州会议前后及张国焘向李和义询问渡河的具体情况,“张国焘同意北上后,朱总司令来了电话,叫我们做出发准备,又交代我们把李仲芳的队伍带走。那时正是七八月间。我们正准备出发,忽然又接电话,叫我们准备粮食,并说后面还有队伍来。我们一听,心中打鼓,又走不成了。当天陈昌浩、李卓然和傅钟等几个人骑马来到洮州,我们倾部队所有,热情招待了他们。他们知道我是反对张国焘的,当着我的面一边吃饭,一边议论,我听出来是不赞成张国焘西去的行动,要和他斗争。原来张国焘中途变卦,不愿去陕北,想渡河西进,在河西搞出个局面,再来和中央谈判,四方面军几个头头中只有周纯全同意他的意见。上述几个人到来以后,张国焘随后也来了。他们在一间大房子(可能是一个教堂)里开了一天会,还把李仲芳找去调查过河路线,据说李仲芳告诉他,这一带四面是高山,水流湍急,无处渡河,也没有渡河工具。因此,张国焘只好转头来,前往会宁与中央会合”。

“洮州会议”让张国焘改变西进计划的原因,除党中央对张国焘的批评和明确指出:“若去青海,只限青海一角,同时以后行动困难,也不是夺取宁夏战役的原来计划”外,李和义提供的地情地况则起了决定性作用。在此情况下,张国焘才同朱德、陈昌浩、徐向前联名向中央发出北上电报,表示北上会宁与一方面军会合。四方面军总部于二十九日下达了北进静、会地区的命令。

三、李和义“叛变革命”问题的辨疑

(一)李和义“杀害红军政工人员,叛变革命”问题的由来。

关于李和义叛变革命的问题,至今未见有关这方面的组织结论。但这种提法由来已久。解放前中共陇右工委负责人牙含章同志也不肯定的说:“另据有的同志调查,李和义叛变了革命,杀害了红军派去的两名政工人员进山当了土匪”,《临潭县志》:李和义“9月底随红军离开临潭,东进漳县至新市镇后,于10月初竟反戈叛变,杀害红军干部,星夜逃返冶力关,再度啸聚莲花山,杀人抢劫,破坏森林,盗卖文物,无恶不作”。马旭《中国抗日

救国军甘肃第一路军司令员——李和义》一文中说：“红军走后，李和义率部追随东进时，看到红军前有堵截，后有追兵，处于逆境，前途暗淡，就动摇了心旌。所以，他随红军东下到漳县新市镇时，叛变了革命”。该文还以文学的手法具体描述了杀害红军的过程，“一天吃过晚饭，天擦黑时，李和义就鬼鬼祟祟地组织了十多个凶气十足的彪形大汉，点为刽子手，并给手下传令‘脱帽秃头为记’深夜持刀杀害了党派给他的红军政委及红军共产党员，接着暴露出强盗的面目，狰狞的说：‘杂娃们，现在你们去抢红军的杂媳妇，杂女孩（红军女同志），谁抢到就是谁的！’，这些匪徒们等不得这一声，蜂涌拿抢，暴无人道，致使新市镇大遭乱难，哭喊之声截道。这一残暴举动，使李和义恶名大震。从而在漳县他无立锥之地，星夜沿山流窜，返逃到冶力关，再次带人屠刀啸聚莲花山林，这一次，他杀人放火，盗卖莲花山大量文物，大辱莲花山风景，破坏森林，贩卖木材”。当然，在诸多说法中黄火青同志的说法最具权威。黄火青同志在红四方面占领临潭后，是中共甘肃省委下属的西路工委书记，在红军占领洮州的四十天中，一直工作在临潭，与李和义长期相处。59年后的1995年，他在回忆录中说：“李仲芳的队伍随我们只走了一天，就杀了护送他们的两个指导员，把枪拖跑了”，1988年，黄火青同志还曾给《甘南概况》办公室写来了同样内容的信件加以证明。按照黄火青同志的说法，李和义杀害的应是护送他们的两个红军指导员，而非派在李和义部的政工人员。

（二）李和义“叛变革命”的辨疑。

1. 李和义“叛变革命”的时间和地点的辨疑。

从上述李和义杀害红军，叛变革命的各种提法来看，都是一种笼而统之的说法没有具体的时间、地点，没有事件经过，马旭的《中国抗日救国军第一路军司令——李和义》一文的文学描述又不足为据。黄火青同志的说法只交待了有这回事，而无时间地点，当然我们不能苛求一位耄耋老人在时经49年后的漫长岁月后准确地描述当时事件发生的经过。但李和义和他的队伍在红军撤离洮岷地区，向会宁会师途中在漳县脱离革命，则是

据可考的。这从一个老红军董邦的回忆中可以印证：“李和义原来跟我们走，走到新寺镇一个堡子（漳县新寺镇）。我们没有打开，李不知怎么进了堡子，就没有出来”。另外其时间和地点问题我们通过采访李和义最小的儿子李元喜时，他为我们提供了一条重要的信息，据他的大哥李寿成（李和义大儿子，任李和义独立营营长）事后对他们讲，他们是农历8月15日到新寺镇被打散的。查1936年农历8月15日正是公历的9月30日。黄火青和李和义是在9月27日中共中央西北局洮州会议结束后于28出发，董邦在他的回忆录《忆征程》中，勾勒出了大致的行军路线“红军由临潭返回岷县，我们在哈达铺稍事休整后，经过理川、红崖等地向漳县新寺镇开拔”，正好于9月30日下午到达漳县新寺镇，也符合黄火青同志“随我们只走了一天”的说法。

2. 李和义在漳县新寺镇杀害护送的红军指导员，叛变革命的辨疑。

景生明《甘南民变史略》中在有关王仲甲的事迹时记述到“1936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经过卓尼、临潭、岷县、临洮一带，……王仲甲即去临潭水磨川与勒巴佛结识，又与鲁大昌部的团长李和义取得联系，策动一个团的起义，组成抗日义勇军，随四方面军西进，被敌阻击打散”。牙含章记述道：“后来红二、四方面军向陕西转移时，李和义带领的那数百个农民脱离了红军，而被国民党的军队打散了”。而董邦的“李和义原来跟我们走，走到新寺镇一个堡子（漳县新寺镇）。我们没有打开，李不知怎么进了堡子，就没有出来”。据李元喜老人讲，他大哥李寿成从漳县新寺镇逃回后给他们讲，他们在新寺镇遭到着装统一而身份不明的手枪队的阻击，被打散后逃回冶力关的，红军的政工人员他们确实没杀。在枪林弹雨的战场，谁也顾不了谁，两名红军指导员没有下落。李和义的两个营长，即黑营长李盛荣和北山的黄营长也在这次战斗中下落不明，未和李一起逃回临潭。李寿成等始终认为阻击他们的是黄火青派来的红军为剪除异己而消灭他们。因为李和义和黄火青在冶力关期间，为让李和义断后，李认为他的人马装备差，没有战斗

力,坚持要和黄一起走而发生争执。李最后执行了黄的命令,一路断后,黄带队先行。根据董邦提供的信息,李和义是和董在一起行军的,而未和黄火青一起走,董也没有提到李和义杀红军政工人员的事,因为这样大的事件,董不可能不知道,也不可能不提到,如果李和义要叛变、要杀红军,那么董邦必在被杀之列。

反而我们认为董邦就是黄火青同志提到的“护送他们的两个指导员”之一,因为董邦当时是红四方面军保卫局的战士,1932年他任过红军连队副指导员和党支部书记。他从岷县返回临潭就是为了护送李和义的队伍。他回忆道“李和义原来跟我们走,走到新寺镇一个堡子(漳县新寺镇)”。 “记得由临潭返回岷县途中,我带着四五个人沿途进行游击侦察”。根据这些资料,董邦从临潭到漳县新寺镇,一直是和李和义同行的。他回忆道“在行军的那天下午,前面的部队已越过新寺镇堡子到达新寺镇,我们总保卫局与大队脱了节”。而且红四方面军总保卫局长曾传六的警卫员施悦就于当天牺牲于新寺镇堡子。董邦在会宁城住了几日,又受保卫局曾传六局长的派遣率队返回到天水地区的甘草店、车道岭一带打游击,所以没有返回到四方面军原部队,而是跟随总司令部朱总司令直接去了陕北延安。“……陕北前进的。经过问明情况,才知道我们的大部队已经过了黄河,向河西走廊挺进了。四军的一位政委告诉我们说‘上面有命令,没有过黄河的就不过了,向陕北走’。这样我们就跟四军的同志一同前往陕北”(董邦《忆征程》)。直赶到静宁城边,才碰到四军的同志,他们是折回向其后又派往天水搞地下工作,将原名董振国改为董邦,因而我们推断“护送他们的两名指导员”并没有被杀害,而且还一直活到新中国建立后的1995年(董邦同志于1995年去世——笔者按)。其实在那种复杂的环境中,黄火青同志误以为护送人员被李和义杀害也在情理之中。

那么,9月30日至10月初,漳县新寺镇究竟发生了什么?查漳县党史记载,9月30日至10月初几日内,新寺镇并没有国民党军队驻扎,而李和义被国民党军队阻击打散似无可能。更不可能是

红军部队的阻击,因为朱德总司令非常看重李和义的这支部队,黄火青同志曾记述道:“张国焘同意北上后,朱总司令来了电话,叫我们做出发准备,又交代叫我们把李仲芳的队伍带走”。董邦他们未打开的堡子驻守的又是何人?2013年10月21日我们专门走访了漳县党史办,据漳县党史办的同志讲,他们的党史资料没有有关李和义在新寺镇杀害红军的记载,他们也没有听说李和义在漳县新寺镇制造残案的事情。而他们为我们提供的是红四方面军驻漳县期间,红三十师在新寺镇收编了当地方海娃、杜伯成土匪武装,组建了800多人的“漳县抗日游击队”,9月30日红军北上时,于当晚游击队正副司令方海娃、杜伯成叛变,杀害红军工作人员,啸聚山林,重新为匪。可见当夜杀害红军,阻击李和义的应当正是方海娃等叛匪。马旭所谓:“蜂涌拿抢,暴无人道,致使新寺镇大遭乱难,哭喊之声载道”的残案正是方海娃匪徒所致。李和义寡不敌众,败回临潭是客观原因造成,而非主观上的叛变革命。那么在当时信息不畅,混乱局势中黄火青同志将方海娃等叛匪的事件误判为李和义所致也是可能的。

3.李和义叛变革命,逃回临潭为匪作歹辨疑。

李和义1936年10月从漳县新寺镇返回临潭,到1939年正月他被捕杀害,仅仅只有两年的时间。在这两年时间中的所作所为,看不出有叛变革命,为非作歹的行为。所谓“啸聚山林、杀人放火、盗卖莲花山文物、大辱莲花山风景,破坏森林、贩卖木材”等都是不实之辞。

王仲甲是1942年甘南农民起义的主要领导人,也是李和义和红军接触的联络人,解放前的中共甘肃地下党组织陇右工委的负责人牙含章曾说:“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当时有一个叫李和义,临夏县人,曾在旧军队中作过事,当红军二、四方面军到达岷县时,李和义率领数百个农民参加了红军,其中就有王仲甲”。王仲甲在红军四方面军北上时,是李和义部的团长,“随四方面军西进,被敌阻击打散,失败后,王仲甲、李和义在勒巴佛的寺院里隐蔽数月”。那么李和义从1936年10月回到临潭到1937年7月芦沟桥事变、抗日战争爆

发,李和义和王仲甲就是朝夕相处,一直没有分开,藏匿于卓尼康多勒巴佛的寺院。

1937年抗战爆发后,王仲甲受李和义委派到兰州寻找共产党。这段资料是牙含章同志提供的,他说“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国共二次合作,八路军在兰州设立了办事处,这时王仲甲,又到兰州寻找共产党的关系,他和王子元同志接上了头,当时王子元根据八路军驻兰办事处的指示,在兰州组织了一个‘甘肃在乡军人抗日联络委员会’,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李和义、王仲甲、肖焕章同时来到兰州,参加了‘甘肃在乡军人抗日联络委员会’。王仲甲和肖焕章就是在这个时候,在这个组织里互相认识的。王子元同志当时还和八路军驻兰办事处处长伍修权同志见过面。他们的日常工作则由当时的中共甘肃省委派来的窦志安同志领导”。

王仲甲和李和义是形影不离的忠实战友。他们从漳县新寺镇返回临潭后,于今临潭羊沙乡政府驻地羊沙庙手刃了反动民团的营副朱秀山,朱是临潭冶力关解家磨人,是当地民团营副,红军撤离冶力关时朱秀山纠集地方势力杀害了当时在冶力关的红军代表、工作队队长徐登云等5位同志,朱秀山的双手沾满了红军烈士的鲜血。李和义和王仲甲亲手除掉了这个刽子手,为红军战士报了仇。王仲甲1948年被捕,1949年甘肃解放的前夜被国民党政府杀害于张掖,1981年被中共甘肃省委追认为中国共产党党员。肖焕章、王仲甲都是忠诚的共产党员,坚强的革命战士,王仲甲与李和义自参加红军后,就形影不离。1936年10月李和义王仲甲从漳县新寺镇逃回,在勒巴佛寺院隐蔽数月,到1937年派王仲甲到兰州寻找地下党,至1938年3月李和义和王仲甲到兰州参加“甘肃在乡军人抗日联络委员会”,到1938年下半年“联络委员会”取消,回到临潭,1939年初即被逮捕,这就足以说明李和义杀害红军政工人员,叛变革命,在冶力关为匪破坏森林,盗卖文物,杀人放火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4. 从1943年甘南农民起义,对李和义叛变革命的辨疑。

按常理推,李和义叛变革命,应投降反动政府,以谋取高官厚禄,但是事实证明,他并没有这样做,而是和坚定的革命者王仲甲一起,隐匿民间,以图东山再起,重举革命义旗,其后王仲甲领导甘南农民起义恰好证明了这一点,可惜由于走漏风声,李和义在卓尼车巴沟录日岔村藏匿时被捕,于1939年被国民党岷县专员胡守谦杀害于岷县二郎山,时年38岁。

1943年的甘南农民大起义是一场轰轰烈烈的抗日反蒋的农民运动。“一九四三年的甘南农民大起义中的许多领导人、中坚分子曾参加过‘甘肃第一路’支队(即中国抗日救国军甘肃第一路军——笔者按)。甘南起义的重要领导人王仲甲就是其中的一个”。“据肖焕章同志讲,他和王仲甲大约是在1940年回到临洮衙下集,就开始在贫苦农民中进行秘密串连了一百多人,他们都发下誓言,要选择一个时期同时暴动”。

王仲甲1940年回到临洮衙下集的时间,正是李和义被害的第二年,1943年,甘南农民大起义爆发,李和义的二弟李明义也参加了暴动,在农民义军领袖勒巴佛攻打新城时,李明义、邢生贵、李有清手刃了临潭县长徐文英。1944年邢生贵、李有清、李明义被捕,被岷县专员胡守谦杀害于徐文英墓前,以祭奠徐文英。此三人视死如归,高唱花儿“脚户骡驹儿走四川,杀了吃人的狗县官,棉花挂至刺上了,给穷人把仇报上了”,而据有的人调查,最后一句词是“给李和义把仇报上了”。

李和义是中国共产党甘肃革命史上的一位重要人物,他为红军为革命做出了重要贡献,是最终惨死在反动政府屠刀下的历史人物,我们不应以一句简单的“叛变革命”来全盘否定,而应正视当时的社会环境,客观的历史现实,实事求是,客观公正地给予评价。

(作者单位:临潭县地方史志办公室)

杨志范与“杨诗三百首”

王杰

一、我所知道的“杨诗三百首”

1966年,文化大革命初起时,我是甘肃酒泉二中初中六六级毕业班的学生干部。当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大城市开始把矛头指向党政领导机关的时候,兰州铁道学院的六七个学生,来到酒泉县城(酒泉专署驻地)串联,进行反对中共甘肃省委的宣传活动——因为此前中共甘肃省委决定免去兰州铁路局局长和党委书记职务。此举对我们这些远离省会又唱着“共产党好”长大的血气青年学生来说,是不可容忍的大逆不道,很快就与兰州铁道学院的学生形成了对立态势。9月初的一个晚上,在酒泉二中能容纳40多人的会议室里,酒泉二中拥护县委一省委的学生,把兰州铁道学院的几个学生围在中间,进行已具围攻气势的辩论。辩论持续到大约十一点,在火药味越来越浓的时候,突然进来了三四个干部模样的人,其中一位类似秘书的年轻人介绍另一位戴金丝眼镜的高个,说这是中共酒泉地委副书记杨志范。杨志范平心静气讲话,很快把辩论双方上窜的火气平息下来了,辩论散伙了。这是我近距离初见杨志范。

大约在1967年冬天,见到酒泉中学学生组织在酒泉钟鼓楼西墙上贴出的大字报“公布三反分子杨志范的材料——杨诗三百首”。酒泉中学是酒泉县城当时唯一设高中的学校,两个高三班的学生中有写字好手,大字报字很耐看。大字报说杨志范是在反右倾运动中即已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老三反分子。还有什么内容,因为一扫而过,看过就忘了。1968年3月间,驻校军宣队找我谈话,说酒泉专区革委会新组建大批判办公室,因为我在学校颇有文名,又出身革命干部家庭,所以选准

了我参加。酒泉专区革委会大批判办公室主任由专区革委会副主任、政治部主任王治邦(原中共酒泉地委书记,结合进入专区革委会革命领导干部)兼任,大批判办公室副主任是专区革委会政治部副主任、酒泉军分区政治部主任梁忠。我在宣传组,组长叫谢玉德。1968年5月1日,在酒泉县城四大街主要街口贴出酒泉专区革委会大批判办公室开张的“安民告示”(原名如此),正式开始办公。

大约是5月20日左右的一天,谢玉德安排我起草《酒泉地区革命委员会关于深入批判三反分子杨志范的通知》,并交我一份刊载“杨诗”的《酒联战报》,要我从中选出五十首,加上按语,附文下发。《酒联战报》是当地群众造反组织“酒泉地区红色造反派联合总部”办的对开四版铅印报纸,因酒泉县印刷厂整体参加了这一派群众组织,报纸纸质、印刷质量不错。谢交我的这一期是四版全文刊载“杨诗三百首”的专号,并配有编者按,大意说:杨在工作期间写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人民的反诗二百七十五首,简称“杨诗三百首”,毒草腐化可以肥田,增强免疫力,特予刊载。我通读“杨诗”,见有的有写作时间,还有地点。内容涉及党的路线、政策、干部作风、群众生活各个方面,批评的多,表扬的少,文字简练,读来十分顺口,有的让人过目不忘。如“吹牛吹到房上,红旗贴到墙上,胸前挂的章章儿,肚子里喝的汤汤儿”,“车上套的剪发头,圈里卧的老黄牛”,就是我1968年整理时记得的,至今四十多年过去,依然记忆犹新。我遵嘱完成文件草稿,誊写齐整后呈谢玉德。谢当我的面修改后,在呈签单密级栏注明“秘密”,印数栏注明“50”后,派我呈梁忠主任,再报再签后进入印制发放程序。

后来,我见到正式下发的酒泉专区革委会政治部文。

1968年9月初,我父亲被以最为简单的理由——地下党员被抓进国民党的监狱又活着出来,肯定是叛变无疑——“群众专政”关进了“牛棚”。我向梁主任说明父亲因“叛徒”获“群众专政”事,不宜继续在红色政权工作后,梁说了一句令人终身难忘的“你休息吧”。我离开了酒泉专区革委会大批判办公室。

1979年夏天,当时我在中共酒泉县委宣传部做理论干事,见到县委大院面临主干道西大街外墙贴出一份长达70页,杨志范子女写的如陶斯亮《一份终于发出的信》范式的大字报。从中得知,杨志范在文化大革命中备受批斗肃整,才五十出头,已然故去。

随着年龄增长、文化层次和认识水平的提高,回首既往,深感杨志范乃是认识“左”倾错误的先觉群体分子之一,“杨诗”则是生动反映中共地县领导层次认识和抵制“左”的错误这一层面的真实记录,其敏锐、深邃令人钦佩,语言精妙令人倾倒。遂谋划把尘封的“杨诗”公诸于世,即开始寻找“杨诗”。

我访遍可能知道此事的同学、熟人和朋友,无着。又利用工作关系请酒泉市档案局在当年酒泉专区革委会政治部的档案中查找,但回复:政治部的档案中唯独缺大批判办公室部分。又从甘肃省档案局中的保存地级以上干部档案中复印出杨志范的档案,附有中共甘肃省委组织部1980年某(印中之五角星遮蔽数字)月十二日《一九五九年反右倾斗争材料处理说明》说: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对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平反、改正问题的通知”精神,“已将原归入杨志范同志档案的甄别结论,处分决定,单行材料等材料取出销毁。特此说明。”档案中也无“杨诗”。我仍然不甘心,给酒泉日报写了一篇不到千字的寻找“杨诗”的短文——《四十年后寻故,“杨诗”遗落何处》,恳请知情者帮忙,亦无果。但我仍未放弃。2010年,我退休后受聘在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做教授时,中央档案局一位女司长到此学习。我向她咨询,她告诉

我:材料不会销毁,有可能放在哪个旮旯里,建议我再找甘肃省档案局相熟的领导,让他们下功夫找,说不定能找到。我再度联系甘肃省档案局一副局长帮助寻找,无果。2013年,春节刚过,因事专程赴酒泉。酒泉市地方志办公室接待,并送我一部他们编撰的新近才出版的五卷本《酒泉通史》。返回兰州后,一气读完,意外发现居然收有一部分“杨诗”,真是喜出望外!我即致电酒泉市政府副秘书长、地方志办公室主任孙占鳌索要“杨诗”。不久,酒泉市地方史志办公室刘生平同志电话要我邮箱,随后发来“杨诗”。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也堪费工夫。

1968年我见到的所刊《酒联战报》“杨诗”,似乎均无题,但有的诗末似乎有类如“1959秋、白杨河”时间、地点。刘生平发给我的“杨诗”,不知从何处收集,均无时间和地点,但内容与我当年所见无异。

二、“杨诗三百首”及其内容

(一)“杨诗”和杨志范

据甘肃省档案局的档案,杨志范,1922年4月出生于陕西临潼县斜口镇地窑村一个农民家庭。1937年1月参加红军,同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任中国人民解放军3军后勤部民力科科长,同年12月调酒泉地区工作,任中共酒泉地委组织部部长、地委委员,兼监察委员会主任。1952年任玉门矿务局党委副书记兼工会主席。1958年任玉门市委书记处书记,同年6月任玉门市市长。1959年,任中共玉门市委书记处书记。杨志范将下乡所见、所闻,及群众对主观主义、官僚主义、浮夸虚报等的批评,综合整理成298条——俗称“杨诗300首”,向组织反映,希冀引起重视。但在1959年下半年开展的“反右倾”运动中,杨志范的情况反映被冠以“杨诗300首”,受到批判,杨志范被打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下放企业劳动锻炼。1961年6月,中共玉门市贯彻中共八届九中全会精神,根据杨志范的要求和群众的反映,抽专人对杨志范的问题重新作了调查,认为:“杨诗300首”主要是向组织反映问题,批评不正之风,并非“攻击党的领导”。1962年6月,中共玉门

市委根据调查核实情况，对杨志范的问题进行甄别，并上报中共甘肃省委、酒泉地委，撤销对杨志范问题的处理决定。1964年2月，中共中央西北局任命杨志范为中共酒泉地委副书记。然而“文化大革命”开始，杨志范已被组织甄别平反结论的问题，又再次翻出，酒泉专区革命委员会文件明确杨是“中国赫鲁晓夫为代表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伸向酒泉的代理人，“杨志范一小撮”，杨被冠以“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三反分子”，遭“群众专政”、批斗，备受摧残，迫害。1973年因病情严重转北京治疗，1974年4月21日逝世，年52岁。

（二）“杨诗”的内容

“杨诗”大体以时间为线索，从反映贯彻“左”倾路线既成严重后果横向展开，反映“左”倾路线为祸，铸成“非常时期”农村的方方面面，及当时矫正“左”倾错误的显著效果。

诸如：形势严峻

腊月三九天，北风刺骨寒，
路遇冻死人，沿途牛驴死。
大车七零落，凄凄惨惨寒。

北风寒凄凄，走了几村庄，
没见鸡狗影，没见有猪羊，
未闻猫儿声。

草林丛丛，大地茫茫，
田地荒废，不景之象。

看了七八家，家家都很穷，
生活比较苦，生产很不好。
房屋破又烂，屋内黑漆漆
房上破窟窿，铺的破席子，
被褥很单薄。

住的黑洞洞，几月不点灯，
下雨房子漏，风吹土又扬。

吃饭没有锅，睡觉没有窝。②

情况很严重，缺粮又缺柴，
油盐菜没有，社员看公社。

咳声叹声，哭声骂声，
怨天怨地，人口外流。

对困难发生原因的思考
提起共产风，实在太伤心。
无锅无灶无家禽，不跑不走不甘心。
干不干，三顿饭，干好干坏一个样。
集体的活慢慢磨，干的多了划不着。

吃不穷，穿不穷，单怕分配一拉平。
劳动了一年，一个钱不见，还有啥奔头？

劳动一年，没得果实。
不分好坏，一股风吹。
今年生产，谁还有劲。

现在没有粮，牲口没有料，
饲料留得少，种地有问题。
粮食哪去了，而是没打下。

庄田在地里，牲畜乏瘦死，
牛马野外跑，无人去过问。
牛圈透风寒，牛槽尘土厚，
草料铡得长，圈粪槽头高，
小牛被挤死。

批评公共食堂悖逆民意
七十岁老人，家中有儿孙，
还有白发伴，愿在家团聚，
不愿住敬老院。牙齿没有了，
愿在家吃些软饭，不愿进食堂。

八十老太太，坐在食堂里，
没牙不想吃，想吃稀面条，

家里没有的,按量分给她,
食堂不允许。

双眼瞎子是雇农,他的名字曲占德,
食堂远在一里外,双目失明走不去;
别人捎来饭,饭已结成冰。

路途遥远吃食堂,食堂寒冷儿啼哭。
没油没菜何优越,怎能使人心如愿。

老婆在东,老汉在西,
留下孩子没人管,哭哭啼啼。

组织军事化,等齐要划一,
村庄太分散,群众有怨言。

批评决策想当然,给群众造成困难
屯庄四面不透风,庄园里面暖洋洋。
为了新修居民点,现在大都破坏了。

我们愿住新春社,现在划在梁子沟。
走路远,生产少,孩子喂奶有困难。

夜晚过河去开会,过河路远去生产,
衣服单薄冻病寒,还有人们在埋怨。

批评不顾农忙搞“七无八化”运动,强迫刷白房子、捉麻雀、除“四害”,搞卫生,扫文盲等,影响生产,群众强烈反对:

去年播种时,马虎几天完。
祖国要绿化,集中去种树,
山里找草苗,滩上种树忙,
缺水树早死,劳动真冤枉。

主观主义害死人,脱离群众真危险。
人为紧张自遭殃,事情如此怎能行?

讽刺、鞭挞弄虚作假,骗取荣誉而使群众受苦的所谓“先进”

这个化,那个化,哄人的话。

亩产上万斤,社员一旁笑。
去年四百斤,今年上万斤,
增长太快了,一翻八百差不多。

生产跃进了,牲口没有料,
饲料留得少,种地有问题。

红旗挂在墙上,牛皮吹到房上,
胸前戴的章章,肚子喝的汤汤。

下面干部,不敢顶风,
不说真心话,怕说右倾保守,
怕挨批判,怕被拔白旗,
怕打右派,怕说不是好干部。

群众有怨言,不敢说真话,
说了真实话,怕拿帽子压。

远看一片青,近看分不清,
草深过一尺,草欺棉苗死。

主观主义害死人,脱离实际很危险,
人为紧张自遭殃。

反映农民上水库口粮分在水库,人有事回到家,队长批评食堂不给饭

丈夫修水库,半年未归来,
回来无饭吃,指责加批评。
二次修水库,夫妻痛分离,
途中无干粮,带上煮萝卜。
丫头在水库,劳动修水渠,
半载未归来,无衣冻生病,
现在怎么办,母亲很痛苦。

反映矫正“左”倾错误,落实党的政策农村出现的新变化

毛泽东在北京,就像来过我们这里一样。

共产党教育好,干部一下变了样。

对三张布告满意,对算帐兑现满意,
对干部下楼满意,对划分自留地满意,
对退赔自留羊满意,对放宽政策满意,
对多劳多得满意,对包产满意,
对民主管理满意。

全民算账,当场兑现。
说得痛快,心情舒畅。
吐出怨气,喜笑颜开。
冷心变热心,情绪高涨。

还清账高兴,拍手欢迎,
不背疙瘩,斩断穷根。
权力下放,安了心;

三张布告,扎了根;
冷心变热心,生产有了劲;
有奔头,有盼头,生产高涨。
按劳分配好,起得早,热情高。

很想养家禽,就怕割尾巴。
自留地,不是我们不要,
而是嫌迟了。
当场议论去划地,整地拉粪生产忙。

记录给社员分自留羊时群众高兴的场景:

男女老少蜂涌来,羊羔羔抱在老妈妈怀,
孙儿牵羊爷爷笑,喜颜满面:毛主席好。
爷爷牵羊放青草,孙儿端水忙饮羊,
老妈妈抱羊亲着嘴,灰发皱面笑颜开。

听党的话,跟党走。
忠实执行政策,局部创伤,转危为安,
由胜利走向胜利。

起床早,出勤高,

冷心变热心,生产有了劲。

农村政策调整后过年,农村派片欢乐景象
家家新春联,热炕暖房屋,
墙上新年画,个个穿新衣,
户户包饺子,擀长面,饭菜一新。
春节喜洋洋,到处是人群。

三、简短的结语

新中国史上曾经的“左”倾路线,是一个全方位覆盖的错误,与之相应,反对、抵制和矫正“左”的错误,也是一个全方位的立体的过程。“杨诗”运用农民的语言,真实记录了“左”倾错误路线在农村造成的恶果,客观反映农民和党的地县级干部对“左”倾错误路线自发的抵制和批判的史实证明,对“左”倾错误路线从自发抵制、批判,到彻底矫正,是一个包括从普通农民到党中央领导同志内在各个层级、各个方面的渐进的过程。杨志范就是其中的代表之一,“杨诗”则是能够引发深刻思考,值得一读,颇有价值的好作品。

本文得到酒泉市政府副秘书长、地方史志办公室主任孙占鳌和酒泉市地方史志办公室刘生平同志提供资料的帮助,谨致谢意!

(作者系研究员,甘肃省地方志办公室原副主任)



从晋昌到甘州 从太守到囚徒

——乐庭瓌和莫高窟第 130 窟

夏惠

【内容摘要】莫高窟第 130 窟是盛唐时期的代表洞窟，其供养人乐庭瓌不仅是一位声名显赫的太守，同时也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他在晋昌郡和甘州都曾任太守，并带领甘州军民抗击吐蕃入侵，立下了不朽的功勋，但却为正史所不载。幸有诗人马云奇的诗句为乐庭瓌的一生树立了一座不可磨灭的丰碑。

【关键词】乐庭瓌 供养人 晋昌郡 甘州 墨离军

莫高窟第 130 窟里是有名的南大像，洞窟的高度达 29 米。据唐咸通六年(865 年)的《莫高窟记》载：“开元中僧处谚与乡人马思忠等造南大像高一百廿尺”，又据第 3721 号卷子记载：“辛酉开元九年僧处谚与乡人白(百)姓马思忠等发心造南大像弥勒高一百廿尺”，这就给南大像的营造提供了更为确切的时间，即此窟开始开凿于唐开元九年(721 年)，而 1965 年 10 月，敦煌文物研究所在加固 130 窟时，在南壁盛唐壁画下部发现一孔穴，内有丝织物，其中一件是纪年幡，墨书文字是：“开元十三年七月十四日康优婆姨造播(幡)一口为己身患眼若损日还造播(幡)一口，保(报)佛慈目(恩)，故告。”从书法、错别字看，此康姓女供养人或为康国人。发愿文的具体纪年也证明此孔穴外的盛唐壁画是在开元十三年之后绘制，但这座大窟在开元十三年就已经初具规模了，善男信女开始在此窟前发愿祈拜。不过，洞窟凿好以后，还有一系列的工程做完才意味着一座佛窟的完工。从 130 窟甬道所绘的乐庭瓌及其夫人太原王氏供养人像及保留完整的题记可推知，此窟的最后完成

是在唐代设立晋昌郡的天宝元年(742 年)至乾元元年(758 年)间，也就是说，这一大窟从在崖面上开凿石洞，到塑像、彩绘壁画最后完工，总共耗时 30 年左右。

此第 130 窟，开于开元后期，成于天宝年间，虽经西夏重修，但基本的格局仍是盛唐时的规模。此窟平面为横长形，窟身为方锥形，窟顶为覆斗形。此窟为通顶大佛窟，高 29 米，宽在 17 米以上，长在 20 米以上。窟内依山而塑大佛一尊，高 26 米。为建此佛窟，开有三层甬道：上层甬道是凿佛首用。佛首高 7 米，需运出沙石，运进泥塑材料。中层甬道是凿佛身用。下层甬道是凿下身及腿部用。此佛从上往下凿，万一下身不够尺度，可以掘地补长。如此高大的巨佛，无论远看近看，均无不适之感。尤其没有仰视头小体大的视角差，朝拜者在 20 多米以外，仍可看清佛庄重慈祥的表情。这充分显示了我国古代民间泥塑家的高超技巧和聪明才智。《敦煌艺术之最》云：此佛是莫高窟现存唐代最大的彩塑佛像，也是全国现存唐代最大室内泥塑佛像。这尊佛像的后继开凿和最后完工，可以想见，开凿洞窟和造像的工匠以及供养人乐庭瓌应是注入了不少心血，付出了不少财力的。

此窟的壁画众多，有 11130 多平方米。壁画也很精致，充分显示盛唐的风采。除佛顶部的顶光图案与覆斗形顶部的井心及四披的堆金龙与四蟠龙以及其他若干壁画为西夏时重绘外，其余基本上均为盛唐的作品。南北两壁中部各有一身胁侍菩萨，高达 15 米，是莫高窟内最大的几尊像画，造型均相同：头戴宝冠，半裸上身，颈饰项链、璎珞，手戴臂钏，一手举胸前，一手抚膝，一腿横盘，一腿下

垂,十分别致地坐在莲花宝座上,神态庄严大方。东壁为《涅槃经变》画,画上留有西夏时重画的菩萨像。上、中两甬道的两壁,画的都是供养菩萨。这些壁画都经过精心安排。既表达出虔佛者对佛的崇敬,又表现了供养人特殊的地位和身份。两者之间,佛当然就是主体,是主导,供养人是客体。否则,没有佛的赐福,供养人何来的祛灾受泽?供养人乐庭瓌尽管为官一方,声名显赫,实力雄厚,但他在佛面前,仍是佛的信徒。只不过自感比一般的平民百姓高人一等罢了。

第130窟与乐庭瓌有关的壁画和供养人像有这样三幅:第一幅是东壁《涅槃经变文》画下的“练兵图”,一骑兵跃马腾空回身挽弓射箭,形态生动,旁边一穿着甲冑的兵士在认真观看,这无疑是乐庭瓌军旅生活的写照,同时,供养人选择这样的场景一方面是对自己军旅生活的一种自豪与回顾,另一方面,也凸显了乐庭瓌领军治军的才能。第二幅是北壁龕下的盛唐画:晋昌太守乐庭瓌一家人的男性供养人像。最前面的乐庭瓌,裹软脚蹠头,穿圆领蓝袍,腰带摺笏,双手持香炉,足蹬乌靴,头上张盖,脚踏花毡,肃穆静立,气度雍容大方,是盛唐时典型的贵族形象,也是佛教极为虔诚的信徒形象。其身侧榜题:“朝议大夫使持节都督晋昌郡诸军事晋昌郡太守兼墨离军使赐紫金鱼袋上柱国乐庭瓌供养”。这一题记,将他的散官、执事官、勋官全部如数书出,可以说是一份详尽的唐代“告身”。此题记特用蓝底沥粉堆金字装潢,极尽奢华,以显尊贵的身份。在其后是三子及侍从的画像。三个儿子都裹幞头、着靴、穿袍。长、次子已有官职,着赭袍,捧笏。长子侧榜题为“男朝散郎……清道率府兵”;次子侧榜题:“男承奉郎吏部……”(不清);幼子尚幼,着白衣,双手合十,身侧的榜题唯存“男承……”二字,余均不清。三子之后是4位侍从分别持杖、剑、水等物并立。这一幅画,显出乐家的官僚气派。

第三幅是与北壁对应的南壁龕下的《都督府人礼佛图》,也是盛唐画:是乐庭瓌一家的女性供养人像。最前面的是王氏夫人像,与乐庭瓌像对应,也为超身巨像。王夫人面相半圆,饰抛家大髻,

髻上饰鲜花、宝钿,身着大袍碧衫,肩披降地帔子,胸束石榴红裙,脚穿翘头履,足踏毡毯,头顶伞盖,袖手持缯中捧香炉而立。身傍题记亦用蓝底沥粉堆金作:“都督夫人太原王氏一心供养。”其身后为二女,均着衫裙帔帛,一女梳高髻,饰鲜花,小梳,面帖花纸,双手合十擎花;一女戴凤冠,插步摇,袖手而立。这戴凤冠的女儿可能系出嫁之长女,嫁谁不知。母女之后有奴婢9人,长幼不同,发饰各异,与主人形成鲜明的对照,透露出都督家庭华奢的生活。

第二、第三幅画,是乐庭瓌全家人的供养人像,虽然男女分开,每幅画的人物都不少,男性有8人,女性12人,但都画得主次分明,层次清晰,人物错落有致,已不全是以前的供养人像,而具有了突出的盛唐人物画特点。尤其第三幅以王夫人为首的女性画,背景有垂柳、莲花,蜂蝶飞翔,人与自然结合得完美,使画面栩栩有生意。此画与张萱的《捣练图》,周昉的《烽火仕女图》等,同属一种特性,充分表现了盛唐“人物丰穠”、“肌胜于骨”和“色彩柔丽”的风格。

可以看出,给我们留下珍贵线索的供养人——乐庭瓌,他在历史上曾是一位声名显赫的太守,同时也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但除了留在敦煌莫高窟130窟的供养人题记和敦煌遗书中残存的一些诗句,不仅新旧《唐书》均无传,其他史乘也无记载。那么,乐庭瓌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他的家世怎样,他后来又去了哪里?

关于乐庭瓌,130窟甬道所绘的供养人像下有题记,说他是“晋昌太守兼墨离军使”。顺这一条题记,我们可以摸索到了他的一些线索。据新旧《唐书》的《地理志》与《职官志》记载:唐玄宗天宝元年(742年),改瓜州为晋昌郡,改沙州为敦煌郡;州为刺史,郡为太守;州已改郡,则刺史改为太守(或称使君)。唐肃宗乾元元年(758年),复郡为州,仍置刺史。乐庭瓌任晋昌郡太守,应在天宝元年至乾元元年(742—758年)的17年之间,因为自天宝元年(742年),唐朝改瓜州为晋昌郡,改其长官刺史为太守,墨离军使由晋昌郡太守兼任,乾元元年,改郡为州,复敦煌郡为沙州,晋昌郡为瓜州,改

太守为刺史。那么,到底是这17年之间大约是哪一年?可能是天宝五年(746年)之后不久。这一年,据《旧唐书·王忠嗣传》载:“王忠嗣佩四将印,控制万里,劲兵、重镇皆为掌握。……后频战青海积石,皆大克捷。寻又伐吐谷浑于墨离,虏其全国而归。”王忠嗣是太原祁人,将门之后,勇而有谋,西部(包括河西)都属他掌管。乐庭瓌看来应是他的部下,作战勇敢,且有智谋,深得王忠嗣赏识,不仅拔擢了他,还将妹子(一说堂妹)嫁与他。第130窟中,与乐庭瓌对应的题壁上题有“太原王氏”,即是线索。乐庭瓌跟随王忠嗣“频战青海”屡立战功,声望日高,后又随王忠嗣“伐吐谷浑于墨离,虏其全国而归”。这一年(天宝五载),正是战胜墨离的一年。而实际上,《旧唐书》这一记载并不确切,有夸张之嫌,因为吐谷浑早在龙朔三年(663年),就已被吐蕃攻灭,成为吐蕃附庸。遂有不少吐谷浑部越祁连山投归甘州、肃州、瓜州、沙州,为安置这些投归的吐谷浑部众,唐王朝便在在沙州设置豆卢军,圣历二年(699年),居于祁连山南的墨离川之吐谷浑部向豆卢军请求投唐。其后不久,瓜州设置墨离军,驻以蕃汉之兵,蕃兵及吐谷浑人,因此,墨离军是由吐谷浑墨离部落人马为主的军镇,而墨离军镇的驻地,据考证,当在瓜州西北十里(豆卢、墨离均为吐谷浑语词,墨离是“狼”的意思,吐谷浑以“狼”为图腾,墨离军是“墨离川吐谷浑为主的镇军”)。《旧唐书》记载的王忠嗣所谓“伐吐谷浑于墨离,虏其全国而归。”至多只是将在墨离川(青海省柴达木盆地北,今哈拉湖一带)附属于吐蕃的吐谷浑部落全部虏归罢了,但他的战功显然被夸大了。不用怀疑的是,吐谷浑灭国后,越祁连山前来瓜沙一带投唐的吐谷浑人很多,因此,便在瓜州西北设置了墨离军镇,后来,在王忠嗣的举荐下,朝廷即任乐庭瓌为“晋昌太守兼墨离军使”。如果探索有理,则乐庭瓌官职的来源,夫人为何是太原王氏等问题都可说通,当然,这只能是推测。

在乐太守任职期间,正是唐王朝极为鼎盛的时候,“自安远门西尽唐境万二千里,阊阖相望,桑林翳野,天下称富庶者无如陇右”(《资治通鉴》卷二百十六)。敦煌也好,晋昌也罢,在当时也都极为

繁华富庶。尽管吐蕃屡次来犯,甚至曾在开元十五年(727年),攻陷瓜州并毁瓜州城而去,但此后,数十年间,吐蕃的入侵都受到了沉重的打击。尤其是开元十七年,“瓜州刺史、墨离军使张守珪和伊沙等州兵击吐蕃大同军,大破之”(《册府元龟》卷九百八十六),吐蕃遭受重创,河西相对安定了一段时间。所以乐太守在晋昌郡任职期间,正好是这一段黄金时期,乐太守也度过了可能是他一生中最为安乐的时光,但可以看出,他在晋昌郡(瓜州)任“晋昌太守兼墨离军使”期间,治军有方,经常性地开展练兵活动。同时,郡内人民安居乐业。也只有在这样的時候,他才有精力、财力带着夫人太原王氏及众多家眷,远赴莫高窟礼佛,并对早就开凿了二十余年的大型洞窟给予供养。而且,不会只去一次,应该是至少每年都去的。当政者这样的行为无疑给郡内百姓及驻军以一个极强的引导,可以想见,当时自晋昌郡到沙州莫高窟拖家带口礼佛的,当不在少数,而愿意出资供养的也定然不在少数,由此也就推动了莫高窟开窟造像及佛教艺术的发展。

“安史之乱”后,唐王朝征调河西的兵力往东勤王,河西兵力空虚,吐蕃趁机发展,企图攫取河西。广德二年,吐蕃派重兵围困河西重镇凉州(治所武威),驻守凉州的节度使杨志烈,因兵力不足,“跳保甘州”,凉州为吐蕃所占。杨志烈到甘州后,也感甘州兵力不足,想西行募兵,在西行的途中为甘州沙陀谋杀。大历元年(766年)五月,唐代宗李豫亦倍感势态严峻,任命凉州长史杨休明为节度使,并把节度使的治所由甘州移至沙州,甘州抗击吐蕃的重任由甘州刺史兼建康军使乐庭瓌承担。乐庭瓌善于治军,任“晋昌太守兼墨离军使”就颇有名声,此时已是河西军政界宿将,威望颇高,人称“乐使君”。此时,甘州已改称张掖郡(当时只统辖两个县:张掖与山丹),吐蕃对河西的攻势日益加强。

乐太守到甘州后,运用他的威望,团结社会各阶层人士,积极准备抗击吐蕃的侵扰。出身关中、远游岭南、且与狂草家怀素为友的马云奇,约于大历六年(771年),不远万里,西行到甘州入了乐庭

瓌太守的幕府作幕僚，为保卫甘州抵抗吐蕃出谋划策，乐太守十分器重他。从马云奇的远方投奔，也可窥见乐太守治理甘州政绩之卓著（参见高嵩著《敦煌唐人诗集残卷考释—〈残卷〉作者生平管窥》宁夏人民出版社）。有人曾提出质疑：凉州在甘州之东，凉州既被吐蕃占领，马云奇如何到的甘州？实际上，在甘州的北部尚有一条路可通内地，这条路又称“草原丝路”，马云奇极有可能是通过此路到甘州的。这条路对甘州的固守是起了很大作用的。

唐德宗建中二年（781年）“清水会盟”前，正处在强盛期的吐蕃，想多占肥沃的土地，造成既成事实，逼唐王朝在盟会时承认，吐蕃赞普（即国王）亲自徙帐南山，发动大兵同时进攻甘州与沙州（今敦煌），隔断甘州与沙州的联系。沙州在苦守十余年后被吐蕃攻陷，甘州虽有草原丝路可与内地联系，但在吐蕃的重围之下；乐庭瓌率领的军民，内无粮草，外无救兵，孤城奋战，难以独支，亦于不久后被攻陷。城陷后，乐太守、尚将军、马云奇等要员和幕僚，尽数被俘，连游大德等有名的和尚也同时被俘。吐蕃优待高级将领，将乐庭瓌、尚将军等软禁在灌水（今临泽县黎园河）上游（今肃南康乐一带），马云奇、游大德等押解到青海临蕃（今青海西宁西的多巴）。

从马云奇和敦煌佚名氏的诗得知，甘州与沙州都是建中二年（781年）“清水会盟”前夕，同时被吐蕃攻陷的。攻陷后，唐王朝尚不知信息，唐德宗派遣的会盟代表太常卿韦伦、崔汉衡正在长安与逻些（今拉萨）的万里征途上奔波时，还认为河西仍为唐王朝州郡。到建中四年（783年）在清水（今甘肃清水县）会盟时，折腾了三年，吐蕃的计划全安排好了，盟约也出台了：陇右、河西诸州全归吐蕃；唐王朝只得承认既成事实，河西陷入了吐蕃近七十年的统治。甘州这一段壮丽的历史，史书上缺乏记载。唐宪宗元和八年（813年）成书的《元和郡县图志》云：甘州张掖郡“永泰二年（766年）陷于吐蕃。”比实际沦陷早了十五年。堂堂的唐王朝，竟然不知道自己臣民浴血奋战的实况，昏庸到何等程度！若不是马云奇等人的诗，张掖的这段历史还真成了糊

涂帐。幸有马云奇等的诗作不仅为乐庭瓌树了碑，还纠正了中国正史的谬误，填补了这段历史的空白，弥足珍贵。

乐庭瓌在甘州写下壮丽篇章后，不幸兵败被吐蕃软禁，此时乐已七十余岁了。马云奇在被押解青海曾写《赠乐使君》诗：“知君桃李遍成蹊，故托乔林此处栖。虽然灌木凌云秀，会有寒鸦夜夜啼！”（高嵩著《敦煌唐人诗集残卷考释—〈残卷〉作者生平管窥》录此句为“虽然灌水凌云秀”，张先堂先生发表于《敦煌研究》1995年第三期的《〈敦煌唐人诗集残卷〉新校》考订为“虽然灌木凌云秀”，存疑）从这首诗看，马云奇对乐说：以你的德高望重，住在如此山林里，纵使灌水再怎么山青水秀，也会在寂静的深夜里听到寒鸦的悲啼吧！乐使君在悲戚中，可能就抱恨终老于此灌水之畔了。

乐庭瓌不仅是位德高望重的太守，更是位虔诚的佛徒。乐庭瓌在任晋昌太守兼墨离军使时，多次带全家仰“三危佛光”，从晋昌到敦煌做佛事功德。晋昌距离敦煌有一百多公里，但在信佛者来说，不算什么障碍。莫高窟第130窟绘有乐庭瓌全家的等身供养人像，这不是一般百姓或大户人家所能做的。所谓等身，即和实际真人一般高大；所谓供养人，是指供养佛的人。供养，佛教用语，亦作供施、供给。供养有两类：以香花、灯明、饮食等供佛、菩萨，称为“财供养”；以讲经说法，利益众生，称为“法供养”。敦煌莫高窟供养人的供养，主要为后者——“法供养”，因为供养者并不需经常供财物，而是图画经法，在壁画边角上写上自己的姓名，祈求佛、菩萨的“保佑”与祛灾降福。后来逐渐发展，供养人把自己的像也画上，后来甚至画到佛的讲经说法图中，直接聆听佛的讲经说法了。北魏以后，特别到了唐代，有权有势有财的供养人，就自己雇人开凿洞窟，将供养人画在显著的位置。这类窟称为“功德窟”。推翻吐蕃统治的英雄、被唐王朝册封为“归义军节度使”的张议潮，世守敦煌。他的侄子（也是继子）张淮深为他开凿的莫高窟第156窟，绘有张潮统军出行图，和其妻宋国夫人出行图；张议潮一家人都作为供养人，画在显著的地方。这是供养人像达到登峰造极地步的表现。但乐

庭瓌的供养人像,还在此前约百年,正处在承前启后阶段。乐约于天宝五载(746年)前后出任晋昌太守兼墨离军使,也算是有权势、财大气粗之人了。但他没有专门为自己开凿功德窟,因为当时还不到专门为自己开凿功德窟的时候。他利用了一个已开凿多年尚未完工的大窟,出资供养,可以说是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

乐庭瓌一家的供养人像,除了表现他们显赫的家世,虔诚的崇佛外,使我们了解到佛教、佛教艺术发展的某些脉络和乐庭瓌一家概况的珍贵资料,同时对研究唐代绘画艺术也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参考,更使我们了解到,乐庭瓌从晋昌到甘州,从声名显赫的太守到被吐蕃囚禁的囚徒,他善于治军,勤政爱民,使晋昌郡人民安居乐业,同时虔诚礼佛,为莫高窟艺术留下了珍贵的史料;他带领

甘州军民,孤军奋战十几年,在抗击吐蕃扩张的斗争中,建立了卓越的功勋,实在应该在历史上记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参考文献:

[1]潘玉闪,蔡伟堂 敦煌莫高窟第130窟窟前遗址发掘报告[J].敦煌研究,1982,(1)。

[2]钱伯泉 墨离军及其相关问题[J].敦煌研究,2003,(1)。

[3]高嵩 敦煌唐人诗集残卷考释 宁夏人民出版社,1982年。

[4]徐俊 敦煌诗集残卷辑考,中华书局,2000。

(作者单位:敦煌市志编纂工作委员会办公室)

酒泉市地情信息网建成开通

酒泉市史志办公室从四月份开始了酒泉地情信息网的筹建工作。经过半年紧张有序的精心筹划设计,9月10日酒泉市地情信息网建成开通。

酒泉地情信息网是以“打造学术精品、传承历史文化、推动改革发展”为宗旨,以建设酒泉大百科全书为目标而创建的综合性门户网站。网站主要包括历史沿革、领导简介、工作动态、文件法规、领导讲话、图载酒泉、历史文化、地情资料、成果交流等九大信息库。“历史沿革”简明扼要记录了从远古时期到新时期酒泉行政区划、建置沿革等历史变迁;“领导简介”录入了全市副县级以上领导干部目录;“工作动态”包括图文信息、工作计划、工作总结、最新工作进展、重大活动、公告公示、文件通知等七块内容;“文件法规”包括中央、省上、市上所有史志方面的文件及相关规定;“领导讲话”包括中央、省上、市上领导关于史志工作的讲话;“图载酒泉”分人文酒泉、风景名胜、文物古迹、文

化艺术、社会视野等五大版块,以影像的形式记录了酒泉从古至今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社会事业演变历史;“历史文化”包括历史人物、历史文化研究、历史文化论坛三大版块;“地情资料”包括自然资料、行政区划、县市区概况、市级部门机构职能、人口普查、经济普查、年度统计、政治、农业、工业、商贸、交通、建设、历史文化、社会事业、国土资源、环境保护、经济综合等18个版块;“成果交流”主要展示了市史志办近年在史志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果。

网站不仅拥有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资源和酒泉最新最前沿的信息资料,还为社会各界提供了系统、全面、丰富、及时、准确、实用的第一手信息。酒泉地情信息网的开通,将为促进酒泉经济社会事业发展,推动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建设发挥重要的作用。

秦长城西起地点——铁关门

潘硕珍 王树勋

1981年11月20日,临洮师范讲师孙益民、博物馆干部王楷关于秦长城起首的论文在《兰州青年报》发表。该文认为秦长城起于今甘肃省临洮县城北三十里墩杀王坡。1991年10月由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甘肃古代史话》就采用了这种观点。类似的观点还有:“公元前272年,秦国在今临洮设置了陇西郡,在今庆阳西南设置了北地郡。战国后期,为抵御匈奴的侵扰,秦昭襄王开始修筑长城。公元前213年,秦始皇下令把战国时秦、赵、燕三国的长城连接起来,修筑了西起临洮、东到辽东的万里长城。”(《甘肃历史》,甘肃教育出版社,2002年7月)

根据《史记·蒙恬列传》记载:“始皇二十六年……秦已并天下,乃使蒙恬将三十万众北逐戎狄,收河南;筑长城,因地形,用制险塞,起临洮,至辽东,沿袤万余里……”《史记·匈奴列传》也写道:“后秦灭六国,而始皇帝使蒙恬将十万之众北击胡,悉收河南地,因河为塞……起临洮至辽东万余里。”台湾学者柏杨在他的史学巨著《中国人史纲》中,对司马迁对秦长城的记载没有异议:“这个在当时长达二千余公里而被称为‘万里’的长城,东端起自辽东半岛辽东郡(辽宁辽阳)的东南,西端到临洮城(甘肃岷县),使本来分为三段的长城——燕王国长城、赵王国长城、秦王国长城连而为一。”《文献通考》也谓“岷州,蒙恬军筑长城所起也。”又据张传玺、杨济安合著的《中国古代史教学参考地图集》“中国古今地名对照表”注解,秦王朝时期的临洮就是今天的甘肃岷县。中学历史教材即采用秦长城西起甘肃岷县的观点。陇西县教育委员会编辑的乡土教材《陇西历史常识》(1992年12月第1版)写道:“甘肃境内的长城是秦昭襄王

时期,约在公元前272年前后开始修筑的。西端起自现在的岷县,经临洮、渭源、陇西、通渭、静宁进入宁夏,再到甘肃镇原、环县、华池与陕西的秦长城相接。”

秦昭襄王时修筑的秦长城,起点可能是陇西郡的治所狄道(即今甘肃临洮县)境内,而秦始皇令蒙恬修筑的万里长城,应该是对战国秦长城西端的延伸,当时叫做临洮,即今之岷县。史学家史念海撰文《黄河中游战国及秦时诸长城遗迹的探索》(发表于《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78年第2期)认为,秦的北长城系秦昭襄王时所筑。《隋书·地理志·括地志》载:“秦长城首起临洮西二十里。”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高等院校文科教材《中国古代史》(上册)写道:“据考察,它是由现在甘肃岷县城西十公里处开始兴筑,沿洮河东岸,到今临洮县境,绕县城东行,至宁夏固原县附近……”公元前213年,秦始皇命大将蒙恬修筑万里长城,西起地点仍然是今甘肃岷县。《太平寰宇记》称:“长城今州西二十里崆峒山。”又据《岷县古物调查表》(民国)记述:“崆峒山即今西大沟寨观音湫池(当地叫五台山)。”山下铁关门村,临洮河形势险要,据该村识字的老年人口述,原有古长城遗址,后因代代挖取,今已荡然无存。境内长城遗址,有待进一步挖掘。岷县学者景生魁在《秦长城西端遗址探索》一文中提出:秦长城西起甘肃岷县城西十里镇境内的铁关门。如同嘉峪关是明长城西起地点一样,岷县十里镇境内的铁关门是秦万里长城的西起地点。铁关门与岷山乡跌马城遗址隔洮河相望。《岷州卫志》记载岷县境内有秦长城的遗址。洮河北岸的岷山山梁上发现有断壁残垣和烽火台。洮河在岷县茶埠镇转过弯后向北流去,从茶埠镇经西江

镇到维新乡的山梁上有墙体和壕沟遗迹，并发现了大块秦瓦。因此，我们认为景生魁有关秦长城西端问题的考证是有说服力的。岷县诗人齐发一也相信铁关门是秦长城在岷县的起点，有诗为证：“雄关坚壁建于秦，史册书载信可真。我愿探幽访胜者，铁关门前去问津。”（《长城残垒》）2013年3月，笔者与岷县十里中学的王树勋老师去铁关门考察，当地一姓折的村民，大约60岁，说铁关门在旧社会成了村民躲避匪患的堡垒。

（作者单位：甘肃岷县二中）



北宋岷州和尔川寨考

包孝祖

关键词：北宋 岷州 和尔川寨 糜川寨 建置 迁移

内容提要：和尔川寨是北宋政府设于岷州的一个正规建置寨，但不见于《宋史·地理志》和《元丰九域志》的记载。直至今日，也不见于学人著述。本文根据《续资治通鉴长编》的记载，通过考察北宋岷州堡寨的设置和地理位置，得出和尔川寨设置于熙宁七年（1074），于熙宁十年（1077）迁移、更名为糜川寨的结论。可补《宋史·地理志》和《元丰九域志》之缺漏。

和尔川寨是北宋政府设于岷州的一个具有正规建置的寨，但不见于《宋史·地理志》和《元丰九域志》的记载。直至今日，也不见于地方志书与学人著述。凡言及北宋岷州的建置，地方志书与学人著述均以“三堡、五寨”概括，而“五寨”之中，并无“和尔川寨”。和尔川寨似乎消失于历史，无影无踪。但是，北宋岷州的和尔川寨确实存在过，下详

考之。

和尔川寨的设置

岷州在唐朝“安史之乱”后陷于吐蕃，脱离中原王朝，历三百余年。熙宁六年（1073）九月，北宋政府在“熙河开边”之役中，收复岷州，使其归中央政府直接管辖。熙宁七年（1074）开始，北宋政府逐步完善岷州的建置。先是在二月，将隶属秦州的长道、大潭二县（相当于今天西和、礼县的大部分地区及宕昌、舟曲部分地区）划于岷州管辖。接着，便在岷州直辖地区（今岷县全部及宕昌部分地区）建立堡、寨，和尔川寨便在此时设立。

关于和尔川寨的记载，首见于《续资治通鉴长编》（下称《长编》）关于高遵裕的一条记载中。

高遵裕时为岷州收复后的首任知州。熙宁七年（1074）二月甲申（十六日），因闻知熙河路经略使王韶赴京复命未归，吐蕃大将鬼章率大兵二万多人，乘机包围河州官军，北宋河州知州景思立轻敌冒进，被围踏白城（在今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

积石山县),战死。接着,鬼章“乘景思立踏白之败,围岷州,蕃僧温遵率容、李、龙族应之,道路不通者几月。或请退保,遵裕曰:‘敢议此者斩!’岷城卑缺,守者恐。遵裕登西门,遣偏将及包顺引兵纵击,选精兵百余骑,由南门鼓噪而出,合击之,贼遂败走”。

这次岷州保卫战,历时近一月。经过守城官军与地方酋豪包顺所领蕃兵的浴血奋战,岷州城终得保全。高遵裕因之被加岷州团练使衔,包顺被迁为内藏库使,赐金带、上等锦袍及绢三百匹,其余人等分别迁官、赐绢。

在鬼章大兵围城的二十多天中,“蕃僧温遵率容、李、龙族应之”,“而龙氏寔破和尔川砦”。因为岷州收复不久,辖内蕃部并未完全服帖,一有风吹草动,即伺机反叛。故容、李、龙三族蕃部,便在蕃僧温遵的鼓动下反叛,特别是龙氏部族,还攻破了官军守卫的“和尔川砦(寨)”。鉴于此,岷州知州高遵裕在守城得胜后,告示岷州汉蕃军民,悬赏捉拿龙氏部族,“以二十(匹)缣募取龙氏一级,斩捕几尽,以其地招弓箭手”。

这次岷州城攻守之战,发生在熙宁七年(1074)的二、三月间。据上述情形可知,和尔川砦在此前即已存在,但不是具有正规建置的“寨”,而是具有防卫功能的一般堡寨。

和尔川寨成为岷州具有正规建置的寨,是在两个月之后的同年五月。《长编》卷二百五十三载:“是月(熙宁七年五月),置岷州荔川、和尔川、闾川三寨”。作者特地注明,“今依实录,并书之”。所谓“实录”,即记载皇帝日常活动与每日国家大事的历朝“实录”,这里指《神宗实录》,其准确性是毋庸置疑的。

大约是因被龙氏部族攻破,岷州官府意识到了此寨的重要意义,和尔川寨才被升为建置寨的。

和尔川寨最后一次出现于史籍,还是因为鬼章的入侵。事情发生在熙宁九年(1076)十一月:

熙宁十年(1077)春正月,戊子,熙河路经略司奏:“洮东安抚司言,鬼章结连南北诸羌入寇岷州城寨,占据铁城,诱胁青唐等族,日夕摇动,已有附贼者。崇仪副使、知岷州种谔与东头供奉官、走马

承受康识计议,十一月辛巳帅兵赴和尔川寨,翌日至铁城,遇贼,斩首八百八十二级,及杀宗哥首领等。本司勘会鬼章引宗哥之兵,驱胁熟羌,深入寇边,赖包顺、马忠密请出兵,谔、识能用其言,将佐协力,迎击取胜”。

这次战斗,距上次鬼章围城已两年半时间,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政府在岷州站稳了脚跟,不是被动守卫,而是主动出击。和尔川寨能够为上千人马提供一定的食宿保障,且使鬼章不敢轻易攻取,显示了其成为建置寨以后的实力。

这是熙宁十年(1077)正月的记录,也是和尔川寨最后一次出现于史籍。此后,和尔川寨便如烟雾飘散,不见于任何史籍。

和尔川寨的地望

那么,和尔川寨具体位于岷州的什么地方呢?

《长编》中仅有的上述三条有关和尔川寨的记载,均未指出其具体方位。

作者的考证结论是:和尔川寨位于北宋岷州西北边界附近、铁城堡之南不远处,即今岷县维新乡元山村。

以下几点,足以支持这个结论:

一、上引《长编》卷二百八十中“崇仪副使、知岷州种谔与东头供奉官、走马承受康识计议,十一月辛巳帅兵赴和尔川寨,翌日至铁城,遇贼,斩首八百八十二级,及杀宗哥首领等”一句表明,从岷州州治(今岷县城)出发,至铁城,须经过和尔川寨。因为铁城(遗址在今维新乡元山坪)在岷县城的西北方向,和尔川寨必在铁城与岷县城之间。那么,和尔川寨当在铁城遗址以南、岷县城的西北方向。

二、上引“十一月辛巳帅兵赴和尔川寨,翌日至铁城,遇贼……”一句表明,和尔川寨距离铁城不远。今岷县城距铁城四十五公里,以一般之行军速度,一日即可到达。但为了恢复体力,保证战斗顺利进行,北宋岷州的军事指挥者选择了在距离铁城最近的和尔川寨休整过夜,以便次日士兵以充沛的精力,迅速投入战斗,一举取胜。若和尔川寨距铁城较远,则失去了休憩一夜、恢复体力的意

义。事实也证明了这一决策的正确,北宋军队“将佐协力”,取得了“斩首八百八十二级,及杀宗哥首领等”的胜利。

三、今岷县维新乡元山村,有一地名,叫“和儿上”,在维新乡政府驻地之南不远处的山冈上。此地恰好位于铁城遗址之南、岷县城的西北方向,距铁城约两公里多。这一地名,当由北宋“和尔川寨”一名衍化而来。此为和尔川寨位于今岷县维新乡元山村之最为有力的证明。

四、以寨、堡的设置方位和防卫意义揆之,也可说明和尔川寨位于今岷县西北部——维新乡元山村“和儿上”一带的合理性。北宋寨、堡的设置,大都以州治为中心,分布于一州的东、南、西、北各个方向,对州治形成护卫之势。熙宁七年(1074)五月所置的岷州荔川、和尔川、閬川三寨和遮羊、穀藏二堡,是北宋收复岷州后首次设置的建置寨堡。荔川寨在今宕昌县理川镇,方位在今岷县城(北宋岷州州治,下同)之东南;閬川寨在今岷县閬井镇,在岷县城正东。同年,尚设置二堡。《元丰九域志》(下称《九域志》)卷三“陕西路·岷州条”载:“堡三。熙宁七年置遮羊、穀藏,十年置铁城。遮羊:州东(此处误载,实为正北)一百里;穀藏:州西四十里”。

这样,加上原有的位于正南的临江寨,已在正东、东南、正南、正西、西北、正北各个方向,对州治形成全方位的护卫之势。和尔川寨设置于州治的西北部,不正是一个完满的布局吗?

和尔川寨消失的原因

和尔川寨的消失,与铁城堡的设置有关。

铁城遗址位于今岷县维新乡元山村的“和儿上”北面,相距“和儿上”两公里多。此地突兀高耸,地势险要,攻守皆宜。洮河绕其东、北两面,西面为甘南藏族自治州临潭县境之磨沟,有磨沟水流动;东北方向跨洮河为甘南州卓尼县辖地。“鸡叫一声鸣三县”,在历史上的多数时期,铁城都是岷州的西北边界,甚至有几个时段,曾是中原王朝与西部少数民族政权的分界线。今日,铁城之地也是定西市与甘南藏族自治州的分界线。

《水经注》“河水(二)”：“洮水又西北径步和亭东,步和川水注之。水出西山,东北流出山,径步和亭北,东北注洮水。”此“步和川水”疑即今磨沟水,“步和亭”疑为秦汉时在元山坪所置之军事机构。

康熙四十一年所纂《岷州志》载:“铁城:古址在城西北九十五里。吐蕃鬼章宜结所居。宋熙宁中,州守种谊破鬼章于此”。光绪三十三年《岷州续志》载:“铁城:宋鬼章青宜结所居。守将种谊破鬼章于此,在城西北九十里之元山坪”。光绪末年《岷州乡土志》载:“洮水又北经中寨西,至石门沟,东沟水从西来注之。又经元山坪东,有水从西来注之。二水皆源于洮州界,疑即《水经注》之步和川水也。元山坪有铁城故址,吐蕃鬼章所筑也。”

如前所述,铁城的军事地位一直十分重要。但熙宁七年,北宋岷州设置寨堡,为何仅及于和尔川,而不占领两公里外的铁城?主要原因是,岷州刚刚收复,无暇顾及周边众多的零星反叛势力。隳厮罗子孙的势力伺机反扑,地方蕃部各自为主,或顺服,或受命于隳厮罗子孙木征、董毡等,估计铁城一带当时被地方反叛势力占领着(铁城以西为洮州,当时尚未收复)。熙宁七年春天,鬼章围攻岷州城的同时,蕃僧温遵率容、李、龙各族应之,龙氏部族还攻破了和尔川寨。那么,龙氏部族就很可能占据着铁城。在百废待兴的创置时期,岷州政府自然是不会为此而大动干戈的。

两年半以后,北宋岷州政府已有足够的力量,腾出手来对付周边的零星反叛势力,完善建置和防务体系。上引《长编》卷二百八十所记载的熙宁九年(1076)十一月,“鬼章结连南北诸羌入寇岷州城寨,占据铁城,诱胁青唐等族”,岷州官军与蕃兵,将佐协力,在铁城取得“斩首八百八十二级,及杀宗哥首领等”的胜利,就是明证。经过这次战斗,岷州政府收复了铁城。铁城的地位如此重要,北宋政府自然要在这里设置堡寨了。《长编》卷二百八十三载:“是月(熙宁十年六月),置岷州铁城堡”。《宋史·地理志》《元丰九域志》均记载,铁城堡,熙宁十年置。

既然已经在两公里外设置了铁城堡,那么,和

尔川寨显然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和尔川寨自此不复见于史籍的记载。

和尔川寨的移动与更名

但是,史籍之中,却多出一个糜川寨来。

《宋史·地理志》“岷州”条:“砦五:(秦州临江砦,熙宁六年,割隶州。七年,置荔川、糜川、閤川,又置宕昌。)临江,荔川,糜川,閤川,宕昌”。

《元丰九域志》“岷州”条:“寨五:(雍熙二年置临江寨隶秦州,熙宁六年隶州,仍置荔川,七年置糜川、閤川、宕昌。)”又记:“糜川。州东二十里”。

这两种权威史籍,均记载北宋岷州五寨中,有“糜川寨”,且一致认定糜川寨置于熙宁七年。而《长编》中则无关于设置糜川寨的记载。二者互相抵牾。

《九域志》编成于北宋元丰年间,《宋史》由元人脱脱等编纂而成,其《地理志》基本承袭了《九域志》的内容。而《长编》则由南宋李焘撰成,晚于《九域志》。按理,当以“时人记时事”的《九域志》为准。但是,《长编》历来以记载详实著称,且关于和尔川寨的设置,乃据《神宗实录》的记载而编入。李焘不会无缘无故地杜撰出一个和尔川寨来,这是应当肯定的。事实的真相,还应以当时的情理来推之。

熙宁十年置铁城堡以后,临近只有两公里地的和尔川寨,已是多余(和尔川寨已在铁城堡的有效防卫之内)。故岷州政府将和尔川寨南移,置于糜川(今岷县梅川镇红水村),更名为糜川寨。

梅川地势开阔,洮水南来在此地转而西北流去,秦汉时期即是临洮县(今岷县)的门户。《水经注·河水》:“洮水又东北流,屈而径索西城西。建初二年,马防、耿恭从五溪祥圃谷出索西,与羌战,破之,筑索西城,徙陇西南部都尉居之,俗名赤水城,亦曰临洮东城也。”索西城俗名赤水城,此城即在今岷县梅川镇红水村。

因糜川寨距岷州城仅三十多里(《九域志》载“糜川,州东二十里”,误。),北宋置糜川寨于此,可以有力地防卫州城,起到二级防线的作用。同时,

北去一百里经遮羊堡,达通远军(今陇西县),西北顺洮河而下,达铁城堡。加上州城本身的防卫体系,形成了一个完备的防卫网络。如此谋划,可谓周密矣。

《元丰九域志》《宋史·地理志》将设置糜川寨的时间系于熙宁七年的原因,恰好说明这一推断是正确的。因为和尔川寨就是熙宁七年设置的,而糜川寨是由和尔川寨迁移、更名而来的,论及其设置时间,当然以熙宁七年为准。《九域志》编纂时,它的名称已更为糜川寨。因之,便有了《元丰九域志》“七年置糜川……”、《宋史·地理志》“七年,置荔川、糜川……”的记载。

《长编》中不见和尔川寨更名为糜川寨的原因,当是更名之类的小事,不需要、不值得记载,仅此而已。

了解了这些,便会明白,《元丰九域志》《宋史·地理志》与《续资治通鉴长编》关于和尔川寨、糜川寨的记载,貌似互相抵牾,实际上是一致的。



(作者单位:岷县地方史志办公室)

甘州丰富的民间文化

黄杰

民歌

甘州是历史悠久的文化名城，数千年来又是多民族聚居之地，因而有着丰富的传统文化，民歌即为其中重要的一种民间文化形式。历史上有史料可查的，西汉时河西一带匈奴民歌相当丰富，因年代久远，均已失传，其中留传下来最有名的一首：“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繁息；失我胭脂山，使我妇女无颜色。”

历代民歌，多为民间口头上代代相传，很少有文字记载。在流传过程中，又经民间艺人不断加工完善，形成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口头艺术形式，千百年流传下来，成为民间长久保留的民歌珍品。

民歌的内容，多为反映男女爱情、生活情趣、风土民情、寓言故事以及劳动人民生活苦难等方面。反映男女美好爱情的有《花五月》《送情哥》《黄姑娘》《五哥放羊》等；反映生活情趣的有《纺棉花》《卖水饺》《闹王哥》《姐儿逛街》等；风土民情方面的有《十二月花》《拉骆驼》《珍珠倒卷帘》等；寓言童话故事有《小老鼠告状》《白鸢吊孝》等；反映劳动人民苦难的有《打庄墙》《熬长工》《穷人多》《沙娃上工》等。

音乐

甘州的民间音乐，主要是甘州曲子、宗教音乐和戏曲音乐。

甘州处在丝绸之路的要冲，东西方文化交流在甘州留下了很深的轨迹。早在西汉时，匈奴占据河西，匈奴人有胡笳和鞞鼓，这是河西最早的乐器。五胡十六国时期，后凉吕光将龟兹乐带回河西，北凉王沮渠蒙逊吸收龟兹、胡羌音乐，创造《秦

汉伎》乐舞。北魏太武帝灭北凉后，改《秦汉伎》为《西凉乐》。这些乐曲经过再创造，形成了具有独特韵味的西凉州曲、八声甘州等，后传到中原。

隋唐时期的宫廷音乐皆以西部音乐为主。其时《西凉乐》进一步发展，形成了“凉州”、“甘州”、“伊州”等部大曲，“甘州”大曲的名目下又有多种小曲，如“甘州漫”、“甘州破”、“甘州子”、“甘州遍”、“八声甘州”等曲牌。唐玄宗开元四年（716年），河西节度使杨敬述向宫廷进献的《波罗门曲》，即选自甘州佛教音乐《西凉州呗》，此曲被改制为《霓裳羽衣》舞曲后，风靡于长安宫廷内外，成为唐代乐舞艺术的代表作。河西节度使盖嘉运向唐玄宗进献的边塞曲《甘州》，由曲教坊制成大曲，演出时各种角色共达153人，足见规模之大。诗人元稹有诗《琵琶诗》，特意描写边塞曲《甘州》演出的情景：“学语胡儿撼玉铃，甘州破里最星星。使君自恨常多事，不得功夫夜夜听。”唐诗人岑参游河西时，也在诗中盛赞甘州歌舞天下无双。

唐《教坊记》所列杂曲中，有《甘州子》与《北庭子》。有关这两支舞曲，我国学者发现在日本典籍中有记载，而且都与甘州有关。《甘州子》传入日本后称《甘州乐》，为小曲，四人舞。日本《古事类苑·唐乐》载甘州乐所咏诗云：“燕路霸山远，胡光易水寒。茫茫风藻动，冷冷阳气闲。残花卢江白，老花菊岸丹。竹惊暖露冷，落桑寒飏阒。”《北庭子》传入日本后为中曲，四人舞。据日本典籍记载，《北庭子》又名《西凉州》，与《轮台》《甘州》皆为西凉风俗，唐代婚礼时演奏。《轮台》源自燕支山（焉支山）一带民歌。唐代传入日本的歌曲还有《早甘州》，其曲谱

至今珍藏于日本皇宫。

民间的小曲、小唱也是一种音乐。甘州民间流行的曲子有《莲花落》《哭五更》《苦柳青》《甜柳青》《山坡羊》《大红袍》《沙帽翅》《满天星》《菠菜根》《茉莉花》等40余曲。

宗教音乐主要是佛教音乐和道教音乐。甘州的佛教音乐起源于《西凉州呗》。大佛寺所藏明英宗钦赐的佛经中有一部永乐十五年刻本《诸佛世尊如来菩萨尊者名称歌曲目录》，收藏南北佛曲344首。在佛曲目录中有非汉语标音的15首，其中有蒙古语的“纳不尔赛罕”（即“秋光好”）、“也不罢”（即“去也”），反映了古曲的腔调是融合了多民族的营养蕴育而成。现在吹奏的佛教曲牌有《钦天阁》《马道陵》《五更辞》《小桃红》《西番赞》《将军令》《得胜令》《醉太平》《海水湖》等四五十曲。

道教音乐主要见于民间丧葬、祭祀、打醮等活动中，道士所打击的法器和吹奏的乐器均自成体系。清末，道教打击乐器逐渐与佛教音乐及民间音乐相融合。道教音乐一直延续至今，民间丧葬依然离不开道家的打击和吹奏乐。

戏曲音乐主要是流行于西北地区的秦腔音乐和眉户音乐。

清代乾隆年间，甘州出了一位民间音乐家王珊苔，在《甘州府志》上留下了闪光的一页。

舞蹈

甘州历史上有狮子舞、胡腾舞。唐代，狮子舞、胡腾舞传到长安，白居易有诗《西凉伎》记述了西凉歌舞在长安的景况。唐玄宗根据《波罗门舞》改编的《霓裳羽衣舞》，杨玉环舞之，历史上传为佳话。清代学者徐养元写道：“轻歌妙舞，多出西凉。”西凉州之名，最早是指甘州，后来才移至武威。

清代时，民间舞蹈渐渐与社火合为一体，每逢春节闹社火，民间舞蹈在社火表演中得到充分展示，营造出浓郁的节日气氛，民间舞蹈也因而得以世代相传。

新中国成立后，城乡广泛开始传唱革命歌曲，音乐和戏曲工作者深入群众，学习民间音乐舞蹈，用旧曲填新词的办法，创作了《新织手巾》、《新绣荷包》等新歌舞。“文革”之后，甘州的音乐舞蹈得

到了很好的创新和发展。最突出的表现是，涌现出了一批从事音乐创作的作者，创作出了大量新的歌曲。

甘州早期进行音乐创作的有甘州中学高级教师杨继文，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音乐创作，至九十年代，创作各类歌曲七十余首，其中有不少是歌唱河西风情的歌曲。这些歌曲多次获省级以上奖，有六首入选《中国潮金曲选》。

社火

社火最早是每年春天将至时为了活地脉而敲锣打鼓载歌载舞的一项民间活动。“社”字由“示”和“土”组成，表示“祭土”的意思。社火的排练和演出都要放火，名曰煨火，因此称之为社火。

古时社火表演仪式十分隆重，有很多讲究。社火从排练到结束均要煨火。原传，社火在每年冬季腊月十五以后开始排练，在排练时先由老者用麦草在排练场地中央放火，焚香、化表、燃腊，然后方可排练。腊月二十三，社火队伍全部穿戴化装进行彩排，在村庄主要地段进行，俗称“扫街”，完备之后所有人员均围火而转，由老者宣布停练。春节过后，正月初八正式进行，俗称“装身子”。“装身子”仍然由老者放火、煨火，在表演场地的中央和东、西、南、北方都要放火，谓之五方大祭（吉）。社火队伍所到之地都要燃火迎接，待社火队伍过火堆之后，就鸣炮欢送。社火在表演地由接待者焚香燃腊，而后才可进行表演。表演完毕仍由接待者在社火队伍走出表演场地后要放火，谓之“谢火”。

社火于年前腊月十五开始排练至腊月二十三停练，次年正月初八开始演出至正月十五。正月十六日由老者宣布停演，二月初二再进行表演，名曰：闹土地。这一天表演完毕后，其队伍在排练地仍由老者放火，所有演员、道具都要以火相烤，然后便将全部道具进行火焚，由老者用酒沿排练地祭洒，名曰“谢身子”。社火的整个程序为：排练、表演、谢身，每个程序要有火，谓之社火。

甘州社火有秧歌、高跷、旱船、太平车、舞龙、舞狮、春牛、跑驴、戏蝶、腰鼓、霸王鞭、太平鼓等。

民间社火主要在春节期间演出，乐器有大鼓、大锣、小锣、手跋、三弦、二胡、唢呐。

社火队以秧歌为主要阵容，固定角色有领舞的膏药匠、四鼓、四花、四棒槌、媒婆、末末子等。

社火的表演形式有大场子、小场子、作场子三种。演出时，由膏药匠（老者）带领，摇动手中的铃铛指挥队形变化。开场时先由膏药匠唱一段吉祥颂词，如：“太阳出来照西海，西海现出观音来，招财童子两边站，利市仙官紧跟来。”膏药匠的唱词多是即兴创作，根据表演场景临时编词，例如：“这个地方好地方，新打的庄院四方方，人丁兴旺财源广，一年能打万石粮。”全是吉利诙谐的词语，讨得观众欢喜。膏药匠唱过，一阵锣鼓喧天，接着大场子开始表演，变换着各种队形，其间又穿插着高跷表演，演唱民间小调，还有一个“打搅儿”的出来说几段逗笑的快板，气氛十分热闹。清代诗人曹学禹在《竹枝词》中描述陕西旅甘商会组织社火表演的盛况：“鱼龙杂戏卸装才，取次连番胜社开。闻得沿街锣鼓响，陕人岁岁闹春抬。”

花灯

历史上甘州民间素有元宵节放花灯的传统习惯。清代至民国时，甘州城大街上有用灯架摆设的“排灯”，门前和庭院悬挂的“吊灯”，还有专场摆设的“鳌山灯”、“九曲黄河灯”、“太乙八卦灯”，各家各户还制做许多各种各样的花灯，因多用素绢、素纱制成，故又称为“纱灯”。古时著名的纱灯书法绘画家有张心斋、邢汝典、冯子美、薛理堂、王国贞等。绘制内容多为三国、水浒、西游、红楼梦故事人物和山水花鸟。

建国后，文化部门曾搜集清代纱灯作为珍藏保存至今，但在“十年动乱”期间，元宵灯会被当作“四旧”横扫，还有一些流散在民间的纱灯被当成四旧付之一炬。从八十年代起，政府大力提倡春节文化活动，每年春节期间积极组织元宵节灯展，迅速形成高潮。每年元宵节，甘州城乡都成为一片灯海，成千上万盏各式各样的花灯争奇斗妍。碱滩镇东古城村还摆起古代流传下来的“九曲黄河灯”，吸引了远近四乡乃至山丹、民乐的人们前来观看。

焰火

甘州的焰火也有久远的传统。焰火的花样有菊花、茉莉花、大丽花、沙枣花、柏子花等。制做方

法是用苇秆、竹丝扎成各种架子，摺成圆形花环，用各色颜料彩绘，每层内装各种不同的焰火原料，一层一层连接起来，根据其大小不同，有10层、12层不等，多者可达20层。点燃时，将花环悬在空中，高达数丈，点燃导火线后，先燃下层，继而上层垂下，继续燃放，一层层接续不断。每层燃放时都有名目，有“天官赐福”、“万福来朝”、“西天取经”、“水漫金山”、“九龙杯”、“九连环”等，最后一团焰火升空爆炸，名曰“天女散花”，天空一片光彩夺目。

曲艺

甘州的曲艺演唱起源于古老的《甘州曲子》，又受中原地区“唱赚”及鼓子词的影响，渐次形成以唱为主、配有简单乐器、兼有道白和表演的说唱艺术。甘州的曲艺富有民间气息，内容丰富，曲目众多。流传较广的曲目有《打甘州》《小李剑征东》《侯美英反朝》《武迎春进宝》《雷宝童招亲》《二姑娘害相思》等。

历史上从事曲艺演唱的人地位低下，常受到欺压迫害。最典型的事例是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甘州颇有名气的曲艺演员张白话在南清明堂说唱《武松三打白虎庄》，说到白虎庄主放出黑狗扑向武松时，惹恼了当时被称为黑狗的警察，竟将艺人张白话一顿暴打，以致身受重伤，含冤而死。

宝卷

宝卷是河西民间所特有的一种说唱形式，是民间在冬闲时依据流传的说念唱本，自娱自乐，一人念唱本、众人唱和的文艺形式，是独具特色的民间传统文化。

甘州宝卷历史悠久，流传甚广，保存下来的有40多种。其内容大体上可分为三类：一、反映社会生活，二、民间故事，三、历史传说。反映社会生活的有《烙碗记宝卷》《红灯记宝卷》《丁郎刻母宝卷》等，此类宝卷数量较多，艺术质量也好。来源于民间故事的有《何仙姑宝卷》《孟姜女哭长城宝卷》《沉香劈山救母宝卷》等，此类宝卷虽来自民间传说故事，但其间或多或少含有一些迷信色彩。历史传说类宝卷有《包公断案宝卷》《薛仁贵征东宝卷》《康熙私访宝卷》等。

民间念卷有一定的仪式,听卷的众人围坐在热炕上,中间的小炕桌上放一盏铜灯,念卷先生开始念卷之前先要洗手、漱口,然后双手捧卷,用庄重的口吻念出一段开场诗:“某某宝卷初展开,亲朋好友都听来,天下太平民安乐,风调雨顺春常在……”而后开始正式念唱卷文,每唱一句,听卷的人都要齐声接唱一声“阿弥陀佛——弥陀佛”,营造出一种纯朴原始的艺术气氛。

甘州宝卷中的《仙姑宝卷》,是明清时期甘州人根据本地素材所创,内容是黑河岸边的柳仙姑在黑河上修桥的传说故事,极具甘州地方特色。

评书

评书起源于宋代的评话,清末民初时传到甘州,俗称为“说书”。评书艺人多在茶社书场演出,甘州城区各街道有多家茶社书场,如五凤楼、胡家花园等处,钟鼓楼上也曾一度设起书场。过去,评书是民间一项重要的群众文化生活。

甘州著名的评书艺人和主要书目有:陈福林(艺名冬娃)的《隋唐演义》,赵洪图的《黄(天霸)杨(香武)传》,崔志和的《七侠五义》,石贵山的《三侠剑》,王炯午的《绿牡丹》,黄艳春的《杨家将》,彭云杰的《童林传》等。

剪纸

早在1500年前的南北朝时期,剪纸就已流行于丝绸之路的甘肃和陕西一线。随着军队屯垦戍边和移民的迁入,中原的剪纸艺术也随之渗入当地,使甘州的剪纸艺术融合了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艺术精华。

甘州的剪纸艺术,一为专业的剪纸工艺,二为民间剪纸。专业的剪纸工艺有婚嫁用的“鸳鸯”、“双喜”、“并蒂莲花”、“心心相印”等,有固定的程式,缺少变化和创造力。民间剪纸的形式丰富多彩,有窗花、门笺、喜花、炕围花、鞋花、枕顶花、图腾门神、灯花、花样等。其内容有花鸟虫鱼、人物、狮虎及田园风光、劳动场景,有着多姿多彩的想象空间和鲜明的艺术特色。剪纸的技法有将纸折叠剪出的对称式、连续式的折叠剪;有用剪子镂空以显示图案,不破坏整张纸四边外形的阴线剪;有不保留整张纸外形,剪出各种图案的阳线剪;还有彩

印剪贴,以突出立体图案,增强色彩对比的衬色剪等等。除窗花、门笺、喜花外,还用于乡村的彩灯、祝寿和祭祀品中的装饰。也做妇女绣做花鞋、荷包、枕头的花样。上世纪八十年代,靖安乡七十高龄的农妇陈普氏的剪纸作品《交尾鹿》入选第二届中国艺术节内蒙,甘肃民间美术展,专家评论此作构图奇特,并选人《甘州市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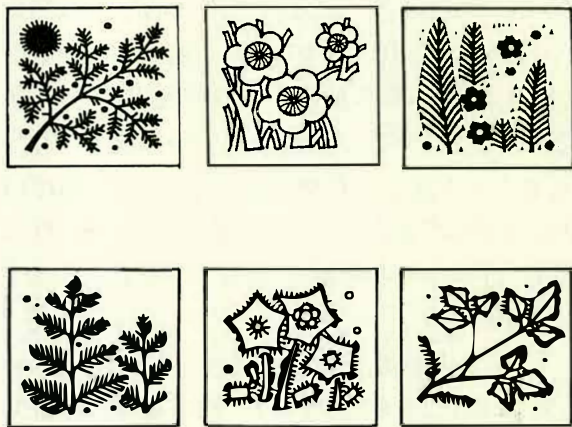
刺绣

刺绣是中国优秀的传统工艺,有着悠久的历史。根据古墓出土的刺绣实物,早在商代,中国就已有刺绣工艺品。秦汉时期,随着丝绸之路的开通,刺绣艺术传入甘州。人们开始用刺绣装饰自己、美化生活、传递友谊、寄托感情。

甘州刺绣的用材,有丝绸、丝线,也有土布、五彩棉线。刺绣花样繁多,应用广泛。有实用类的鞋垫、袜底、腰带、枕头、肚兜、裤带等;有观赏类的衣领、童帽、荷包、口袋片、台布等;有礼仪类的钱包、笔包、烟袋、寿帐、挽联等;有宗教类的佛像和寺庙装饰等,而且都具有很强的装饰效果。

甘州民间刺绣的技法有挑花、纳花和筒花等,刺绣时先绘制图案花纹,而后按花纹确定针法,花样层次分明,鲜艳美观。筒花也叫剃花,用于刺绣人物、动物和题字。

(作者单位:张掖市甘州区地方史志办公室)



解读酒泉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

桂发荣 王兰 王霞

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又称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无形文化遗产，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2003年10月17日第三十二届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确定的一个新概念。它相对于物质文化遗产而提出，是世界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酒泉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与大自然及人类自身进行协调和搏斗过程中逐渐积累起来的智慧结晶；是民间世代相承的、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是人类以口头或动作方式相传，具有民族历史积淀和广泛、突出代表性的民间文化遗产，是历史文化的“活化石”、“民族记忆的背影”；是民间个性、民间审美习惯的“活”的显现。它依托于人本身而存在，以声音、形象和技艺为表现手段，并以身口相传作为文化链而得以延续，是“活”的文化及其传统中最脆弱的部分。酒泉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留着形成酒泉民间文化的原生状态和文化渊源，有着不可估量的民族价值、文化价值和历史价值。

一、酒泉民歌

酒泉民歌，是酒泉人民在生产劳动过程中口头演唱的歌曲，是人民群众集体智慧的结晶。酒泉民歌生动地反映酒泉的文化背景、风土习俗和审美情趣，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和鲜明的地方色彩。酒泉以其独特的自然环境、人文景观蕴育了色彩瑰丽的地域文化。酒泉民歌深深扎根在酒泉这块广袤的沃土上，质朴而鲜活，言简而意深，既有新鲜活泼的民俗生活事象的写真，又有古老深沉的地域文化内涵的显现。酒泉民歌是酒泉人民在漫长的社会生活实践中，依据自身多年生活经历、劳

动体验、社会变革现实的陶冶创作、传播、继承发扬而形成的。表达了酒泉人民的思想、情感、意志、要求和愿望；具有强烈的现实性、地域性、随时代的变迁而标新立异的特征。

酒泉民歌是酒泉人民群众即兴创作，口传心授，在世代相传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与人们的社会生活有着最直接、紧密的联系。酒泉民歌表现形式和手法简明质朴，平易近人；艺术形象鲜明生动，言简朴实，琅琅上口，感情真挚，风格多样。酒泉民歌大多以唱为主，兼有道白；曲目众多，韵文为主；内容庞杂，文字质朴；曲调活泼，旋律流畅。朴素而清新，诙谐而风趣，富有浓郁的乡土气息。

酒泉民歌多采用富于生活气息和地方特色的口语，具有生动性、鲜明性、地方韵味性和形象渲染力。酒泉民歌歌词的用韵，句式不拘，以七字句和五字句为主，二、六、九等字句灵活构句入篇的也不少。句法参差多变，淋漓酣畅地表情达意。歌词多用上下句结构，上句比兴，下句点主题，句尾押韵。歌词的用韵，一般是偶句末字押韵，也有一韵到底的，有两句或四句转一韵的，琅琅上口，如：“天连地来地连天，龙恋大海虎恋山，老君爷恋的是个煤炭山，孙悟空恋的是花果山。”“手提篮儿上山坡，山坡后边摘豆角(jue)。正行走来抬头看，遇见娘家的亲哥哥。手搬青石就地坐，妹妹有话对你说。”除常见的单段式歌曲外，还有大量的套曲。这些民歌，多以表达悲喜、抒发情趣或投枪舞匕等为题材，从某个侧面，唱出了劳动人民对生活的直接感受，观点明确，爱憎分明，词朴曲油，感染力强。颇有诗句美、音乐美之感。

酒泉民歌大多以数字入歌,用“五更”“四季”“十二月”等数字序和时间序作为基本体式。酒泉民歌常见的有《十杯酒》《十间房》《十劝人》《哭五更》等。数字的运用,使民歌别开生面,表现出很强的艺术感染力,如《十道黑》:“张飞骑马阳街走,手提长枪一道黑。姐儿在房中照镜子,弯弯眉毛二道黑。瞎子么抱的三弦子,自弹自唱三道黑。粉皮墙上么挂褡子,四四方方四道黑。三尺白绫么下染缸,不上颜色捂到(五道)黑。羊肉包子么冷不吃,拾到蒸笼馏到(六道)黑。张果老骑着黑驴子,不下驴子骑到(七道)黑。老鼠么跌到个面缸里,扒扒嚓嚓扒到(八道)黑。医生么守着个病娃娃,打上艾灸灸到(九道)黑。瞎子么手提二百钱,撒到街上模模糊糊拾到(十道)黑。”将数字与谐音巧妙地揉合到了一起,形象而贴切地增添了艺术魅力。在数字的表现上,还有一种独特的体式称为“珍珠倒卷帘”,将民歌从一唱至十,再由十唱至一,这种表现形式极大强增加了民歌的趣味性和艺术感染力。

酒泉民歌在曲调上受北方戏曲音乐的影响,具有典型的西北戏曲风味。酒泉民歌类似于说唱音乐和民间小唱,音域宽广,音调高亢。多用地方方言作衬词,以演唱叙事性歌词居多。如《钉缸》:“轱辘子啊本是个小钉匠啊,(梅啊那儿香啊)夙朝那个每日(哎哟哎哟)游遍四方啊,哎(梅哟那儿香啊)亲哥哥为啥(哎呀呀)还不回”等就运用了较多的方言和衬词,衬词本身没有词汇意义,只起舒缓语气的作用,增强歌词的节奏感。方言和衬词、衬句的运用,使歌词在充满关切的亲情之余,又不失调侃的随意自在,让人感到像和乡亲聊天一样的生动、不做作,跃动着生命的活力,给音乐的表现力和人们的感受力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酒泉民歌恒久的生命力来自于酒泉人民群众对生生不息的情与爱和对美好生活的不懈追求。酒泉民歌传唱普遍而广泛,是酒泉灿烂的非物质文化传承的精髓。这些歌承载着酒泉人民对生活的憧憬,对爱情的追求,对家乡的热爱,对沃土的依恋,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粮。酒泉民歌所表现的人民群众的思想是最真实,最深切的,堪称

为时代的回声,历史的橱窗。酒泉民歌在千百年的人世沧桑变化中,也在不停地变化、发展,至今已形成一个完整的艺术整体。在浩如烟海的民歌之林,酒泉民歌像春天田野里的野花,连片密布,摇曳生姿。

酒泉民歌的种类很多,比较有代表性的属劳动号子歌、时政歌、生活歌等。

劳动号子歌是酒泉人民在劳动过程中直接伴随体力劳动而唱的歌。它产生于劳动,服务于劳动,在劳动中起着组织指挥劳动,鼓舞劳动情绪和调动劳动者积极性的作用。酒泉民间伴随劳动演唱的有田间号子歌、打夯号子歌、打(碾)场号子歌、伐木号子歌、修堤号子歌等。劳动号子歌的演唱形式虽然很单一,但唱起来很有气势,气氛也很浓,大家很快就能产生共鸣。如《打锤号子》:“手拿么铁锤么开矿山(呀),开出那矿山好炼钢(依呀呼咳呀呼咳)。妇女么拿起么八磅锤(呀),要和小伙比竞赛(依呀呼咳呀呼咳)。”一幅热火朝天的劳动场景跃然纸上。劳动号子的歌唱方式是一领众和。领唱者往往就是集体劳动的指挥者,领唱部分常常是歌词的主要陈述部分。如《拉碾号子》:“(领)乡里的老哥们哎,(众)咳哟\ (领)统统准备好哎,(众)咳哟\ (领)一下走开了哎,(众)咳哟\ (领)两下拉转了哎,(众)咳哟\ (领)统统把腰勾倒哎,(众)咳哟\ (领)才能把力用上哎,(众)咳哟\ (领)有心把棉袄脱哎,(众)咳哟\ (领)脖子勒的慌哎,(众)咳哟”等句子短小,节奏有力,生动地表现了众人齐心协力拉碾子打场的情景。

时政歌是人民群众有感于切身的政治状况而产生的民心歌,它反映了劳动人民的理想和为理想而奋斗的精神。时政歌一般篇幅短小,句数和字数都比较自由,没有固定的格式。如“骑虎不怕虎上山,骑龙不怕龙下滩,决心革命不怕死,死为人民心也甘”,语言坚定有力,毫无矫饰晦涩之处。如民歌《才盼着铁树把花开》这样唱道:“多少年来多少代,才盼铁树把花开。共产党来毛主席,领导咱们见光明。中国人民大解放,受苦百姓见太阳。以前关进阎王殿,如今打开铁锁链。咱都成了自由人,国家大事也能管。”抒发了解放初期劳动人民

当家做主时欣喜若狂的神态。酒泉民歌不但题材新颖,而且音乐格调更加活泼、热烈、开朗、明快,充满了向上的激情和乐观主义精神。如《劳动竞赛歌》:“(干部)劳动竞赛哪一队呀做呀么做得好呀?(社长)第一队干起活来效率高呀么效率高。(二队)嘿!干活效率高他们怎么样的高呀?(社长)队长带头大伙情绪高。(干部)劳动竞赛还有哪一队呀做呀么做得好呀?(群众)还有哪一队好哇?(社长)第二队干起活来质量好呀么质量好。(一队)嘿!干活质量好他们怎么样的好呀?(社长)播种施肥样样做的好。(二队)实行密植田苗均匀粮食产量高。”通过干部、群众一问一答,展现了两个生产队互相竞争,各不相让,鼓干劲,争上游,奋发建设更加美好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时代精神。

生活歌是反映酒泉人民家庭生活和日常劳动生活方面的歌。如货郎用歌声来叫卖,农民用歌声来祈雨,逢年过节时用歌声来庆祝、娱乐,男婚女嫁用歌声来增添喜庆气氛,喝酒时用民歌来猜拳,用歌来讲述传奇故事,用歌来搞社交,甚至上坟哭灵也以歌代哭,乃至奇人怪事,以歌传之;好人好事,以歌颂之。如:“镰刀斧头老镢头,砍开大路穷人走。”将美与丑、善与恶、痛苦与欢乐,革命与反动、剥削与被剥削等,通过鲜明、生动的咏唱,表达歌者的思想和情感。

二、酒泉民间谚语

酒泉民间谚语是流传于民间通俗易懂、言简意赅的韵语短句。具有语句精练,句式整齐,篇幅短小,口语化、韵律美,“以片言明百意”的特点。在语句中将抽象的概念寓于具体形象中,加上浓浓的乡土语言,念起来琅琅上口,听起来倍感亲切,品起来魅力诱人。它是人民群众在生产实践中创作的民俗文学作品;是人民群众集体智慧的结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酒泉民间谚语从组合情况看:一是由单句依靠语序直接组合而成。大多以两个单句组合而成,也有三四个单句组合的形式,如“耳听为虚,眼见为实”。二是借助关联词组合而成。如“宁可无了有,不可有了无”,“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谚语带有浓重的地方口语。例如“瞎猫碰着死耗子”、“兔

子不吃窝边草”,虽然用语比较粗俗,却是实实在在挂在嘴边,流传于民间具有浓郁生活气息的语言。

酒泉民间谚语的口语性不仅表现在它的通俗,还表现在它善于巧妙地挖掘生活中的事例来进行描述,给人一种既熟悉又新颖的感觉。例如“按着葫芦抠子儿”比喻用强硬的手段逼人讲真话,这类谚语具有极强的意蕴,它能启发人们由此想到彼,体会其中的道理。

酒泉民间谚语是节奏、韵律、声律美的语言。酒泉民间谚语的节奏和诗句的节奏相似,例如“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若还不报,时辰未到”。语句不论长短,都显示出均匀整齐的美感。比喻是酒泉民间谚语中最常用的修辞手法。例如“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不仅能使谚语有具体可感的形象,而且表达含蓄,产生一种言在此而意在彼,“言近旨远,辞浅意深”的语言效果。对偶在酒泉民间谚语中也大量采用,例如“渔人观水势,猎人望鸟飞”、“穷在路边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通过这种矛盾着的正反两个方面来说明问题的实质,形式上整齐匀称,声韵和谐,内容上相辅相成,对立统一,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酒泉民间谚语是生命力强的语言。酒泉民间谚语产生于民间,流传于民间,散落在民间,作为古老的文明传承形式之一,它特立独行,就像个浪人,救雨救风,就是不惜自己。它将自己活跃在大众的口头,以最为平常的口吻,最为熟悉的口气,最为平民化的方式,展现着它的神奇与伟大,展示着它的平凡与长生不老。酒泉民间谚语涵盖了劳动、生产、生活、发展的方方面面,蕴含上至做人做事的道理,下到种田耕地的经验。它是“民间文化大花园”中的一枝永不枯竭的鲜花,是社会大家庭中独特的文化现象。

酒泉民间谚语是不朽的语言。千百年来,酒泉民间谚语咏诵者比比皆是、传承者不计其数,它们受到人们的追捧喜爱,随着时序的更新温故知新、辞旧创新。有的为文学遗产所接纳,有的被正规文化所招安,有的成了箴言,有的至今还徘徊在民族语言的大花园之外。

酒泉民间谚语是寓情于理的语言。酒泉民间谚语里有些讲道理的方式又是以不讲“礼”的形式来表现的,但它的道理的确是不分贵贱的、不留情面的。如“庄稼一枝花,全靠粪当家”,用“花”和“粪”一雅一俗来说明庄稼要想长得好是要靠肥的道理。它将道理置身在一个“俗”中,娓娓道来,不缓不急,言情说教,道理重重。

酒泉民间谚语是传授经验的语言。酒泉民间谚语是人们生活经验的总结,它更多的是传递一个信息,告诫人们稍安勿躁,尊重自然规律。其最大的特点是三言两语,点石成金。如“天燥有雨”,是在总结了天文地理、人情事故基础之上的经验之谈。如“人燥有祸”,人燥就易怒,难以自制,你犯错的几率就会加大,错犯得多了,祸就接踵而至。如“日中则偏,月盈则亏”,说明地球的自传和公转都是永恒的,不会随人的主观意志而转移。

酒泉民间谚语是超时空的语言。如“是龙就腾,是虎就卧,是卖菜的你就好好活着”。在酒泉民间则说,“龙门则跳,狗洞要钻”。就是说人在得意之时犹如神仙,人在争取利益之时犹如猛虎,人在落难之时犹如丧家犬。酒泉民间谚语的超时空,反映着它要反映的事实,表达着它要表达的情绪,思考着它要思考的课题,解释着它要解释的一切。

酒泉民间谚语是智慧的语言。酒泉民间谚语中充满了人类群体的智慧,它绝不是某一个名家名人的独撰,也不是某一个语言大师的专利。它不将自己附着在名家身上,始终以无名氏的名义向人们告白,它就是一句话,在俗语中反映着生活的智慧,智慧的生活。在内容上,酒泉民间谚语几乎涵盖了生活的各个方面,上到做人做人,例如“树怕空了心,人怕没良心”、“金钱如粪土,人格值千金”。下到生活生产,例如“长虫过道,大雨要到”、“寒从脚起,病从口入”几乎无所不在。有这么一句谚语“夜不观宝”,你看它说得多么聪明。夜黑人急,观宝之时难免偏差,加上环境的左右,也许你非但捡不了便宜,反而会上大当。到了白天,稳稳当当地看,方方面面地寻思,更有利于你对宝贝的理解。

酒泉民间谚语是聪明人的语言。酒泉民间谚

语本身聚集了劳动人民的聪明才智,总结了平民百姓的生活经验,反映了沧海桑田的变化规律,最后又凝结为人民群众惯用的语言。同时这一语言形式寄予人民群众的智慧是有声有色、有滋有味、有理有节、有术有道的,如“子孝父心宽”告诫人们怎样才能让父辈放心呢,你就好好地实行孝道吧!因此,我们可以说谚语是人民群众集体智慧和聪明人创作的结晶。

酒泉民间谚语是哲理性的语言。它通俗到极点而又精致到极点。如“朝露贪名利,夕阳忧子孙”、“妻贤丈夫无灾”、“水大漫不过船”等。每一句都蕴含着丰富的哲理,且用谚语表现出来。如“春雨贵如油”。这则谚语尽人皆知,水与油根本没有可比性,怎么雨就比油还贵呢?关键是这个春字,点活了主题。春雨对小麦的生长极为有利。有了春雨,小麦可顺利地抽穗灌浆,有了这个春雨,万物更生……难道这春雨不如油贵吗?这个经验,在城里生活的人们并不在意,而在农村,看到辛劳的人们对雨的期盼时,便让人一下子明白了此话的分量和哲理。

三、酒泉民间歇后语

酒泉民间歇后语是劳动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人民群众在生产实践中创造的一种特殊的语言,是一种定型的、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浓郁生活气息的语言。酒泉民间歇后语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凝结着历史的记忆,既是昨天的历史、生活的实录,同时也是今天生活现实的写照,又是未来非物质文化发展的重要基础。

酒泉民间歇后语在自身个体的产生或消失上体现出时代特征。酒泉民间歇后语在不同社会历史时期,它反映的物质、文化、意识形态、人们的精神生活的内容是不同的,如:“导弹打飞机——同归于尽”、“高速公路——畅通无阻”、“大雁跟着飞机跑——落后了”、“高楼里的电梯——能上能下”、“酒后开车闯红灯——一错再错”等,构成方式与时代血脉相通。新事物、新现象的层出不穷为酒泉民间歇后语的发展注入了活力,应运而生的酒泉民间歇后语,体现现代人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带有浓郁现代色彩,不同程度地打上时代的烙

印,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时代前进的步伐。如:“飞机上挂暖壶——高水平(瓶)”、“大炮打苍蝇——小题大作”、“打字机上的字盘——横竖不成话”、“上午最后一节课——饿狼传说(电子游戏名)”、“今天星期六——胜利大逃亡(电影名称)”。

酒泉民间歇后语在自身个体的产生或消失上体现出地域特征。地方语言的产生,为同一对象的事物表述注入了地方风味特色,充当为酒泉民间歇后语句子中的成分,便产生不同的效果。比如:“脚巴骨拴秤砣——进退两难”、“背锅子穿上夹夹子——遮不了丑”,“脚巴骨”、“背锅子”等是酒泉方言,其他地方的人听了只能是一头雾水,似懂非懂。“马铃薯”俗称“山药蛋”、“土豆”“洋芋”不同地区的方言组成酒泉民间歇后语,其结果就不同。如:“山药蛋下坡——滚球”、“土豆下坡——滚蛋”、“洋芋下坡——滚球”等。进入不同的乡村,其表述也不尽相同,显示出鲜明的地方特色。

酒泉民间歇后语在自身个体的产生或消失上体现出行业特征。酒泉民间歇后语来自不同行业人的口中,由于从事的行业不同,关注的对象也就不同,形成和使用的方式也不一样。如:“横垄地里拉碾子——一步一个坎”、“马鞍子套在驴背上——对不上号”等。反映农民的生产 and 生活方式,透视出了从事农耕业的特点。如:“剃头挑子——一头热”、“卖瓦盆的——要一套有一套”、“卖瓦盆的摔跟头——乱了套”、“卖盐的喝开水——没味道”、“卖棺材的咬牙——恨人不死”等。毋庸置疑,一看就知道来自于那个行业,爽口而又带有浓郁行业韵味的酒泉民间歇后语使人对该行业的从业特征一目了然,产生好感。

酒泉民间歇后语在自身个体的产生或消失上体现出口语特征。酒泉民间歇后语幽默生动的口语特征明显。大多是劳动人民在生产 and 实际生活中为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而自发创造的,从一开始它就自觉地带有劳动人民的口语风格。如:“瘸子背罗锅——卑躬(背弓)”、“开豁裸的镊子——一毛不拔”、“黑老哇笑猪黑——模一样”等材料来源涉及到各种事物、人物、动物、植物、鬼神和各种器物,是劳动人民特别熟悉的,与生产生活息息

相关的。

酒泉民间歇后语在自身个体的产生或消失上体现出幽默特征。酒泉民间歇后语广泛流行于人民群众中,通俗易懂、自然朴实、生动活泼而又含蓄幽默,颇具有诙谐和讽刺意味。酒泉民间歇后语幽默的笑声具有社会历史文化内涵,能让人在笑声中体味深层的东西,领悟相应的社会人生道理,让人在笑声中受到教育,得到启发。如:一帮离休的老朋友一起聚会说到离休人员一年少于一年,就用“黄鼠狼拖鸡——越拖越稀”,这黄鼠狼当然是指死神,大家大笑。有人没看破前尘,拖着病体为儿孙服务个不停,朋友劝她不要“蛤蟆垫床腿——硬撑”了,她扑嗤一声笑了起来。豁然明白了自己所处的境地。

酒泉民间歇后语在自身个体的产生或消失上体现出艺术特征。酒泉民间歇后语它所体现的不仅仅是作为语言载体的实用价值,而且是作为艺术化了的语言载体的修辞价值。

一是运用拟人的修辞手法。如:“黄鼠狼给鸡拜年——假慈悲”,黄鼠狼吃鸡是它的本能,巧妙的用拟人的修辞手法说成“黄鼠狼给鸡拜年”当然是“假慈悲”了。用拟人手法构成的酒泉民间歇后语由于抓住被拟物各自的特点,因而真切自然,感染力强。

二是运用夸张的修辞手法。如:“蛋壳垫桌脚——支撑不住”、“高射炮打蚊子——大材小用”、“八十个人抬轿子——好威风”等酒泉民间歇后语有意识地突出、夸大事物的本来面目,渲染事物的本质,将抽象的说事生动化,“蛋壳垫桌角”、“高射炮打蚊子”、“八十个人抬轿子”等,运用夸张的手法,给人以形象生动之感,引起人们强烈的共鸣,使人在动感中领略丰富的美感。

三是借用双关的修辞手法。有利用词语的不同含义构成双关的,含蓄幽默,耐人寻味。如:“墙上挂门帘——没门”,“没门”表面上是指“没有房门”,实际上是指“没有门道、没有办法”。“和尚打伞——无法(发)无天”,“和尚打伞”,表面上的意义是“没有头发也看不见天(无法无天)”,实际上是利用“发”与“法”字音相近,用谐音相关的词语

构成双关的,诙谐活泼,意味深远。

四是运用比喻的修辞手法。有明喻、暗喻之说,如:“聋子的耳朵——摆设”,“聋子的耳朵”让人很容易就想到“摆设”,这里用“聋子的耳朵”比喻“摆设”,这是明喻。如:“芝麻开花——节节高”的实际意思是表示的“日子过的越来越好”或“预见事物的发展情况愈来愈好”;“铁公鸡——一毛不拔”通常用来形容极度吝啬的人,这些是暗喻。

酒泉民间歇后语在自身个体的产生或消失上体现出俗气特征。酒泉民间歇后语来源于乡土、运用于乡土,是劳动人民现实生活的创作,如: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酒泉人民的日子过的一天比一天红火。尤其是农村农民的住房由以前的土坯房到砖土木结构房,从砖土木房到一砖到顶的小康房的变化等新景象的出现。人民群众为了表达心中的喜悦心情,便有“俏媳妇戴凤冠——好上加好”的酒泉民间歇后语。如:解放前的酒泉农村,磨面时大多使用石磨,磨盘是圆的,拉磨的毛驴反复转圈,为了防止头晕,磨面时必须将毛驴的两只眼睛用布(俗称“捂眼”)蒙起来,毛驴看不见路,只能用耳朵听主人吆喝,这样便产生了酒泉民间歇后语“磨道里的驴儿——听喝”、“屎壳郎爬进磨道里——充大耳朵驴”等。随着生产工具的变革,石磨随之被淘汰了,自然也就不需要牲口拉磨了,这句酒泉民间歇后语也就不常用了,但“听喝”、“充大耳朵”等含义深蕴的语言还在形象地鞭挞着那些遇事不加思考,惟命是从者和不懂装懂,一知半解,打肿脸充胖子的虚假行为。

四、酒泉民间故事

酒泉民间故事是人民群众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创作的民俗文学作品之一,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千百年来,酒泉人民在生产实践中传说、演绎、创作形成了许多具有地域特性的民间故事,它深深植根于民众之中,每一则故事都散发着一股浓郁的乡土气息。酒泉民间故事是酒泉劳动人民共同创造的精神财富,它以一种质朴的乡土尊严和生命力;一种永恒的地域文化感染着一代又一代乡亲,诠释出酒泉历史风度、乡村活力、人间温情。它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

部分,有着永恒的艺术魅力和感染力,蕴含着英雄主义、乐观主义、人道主义等崇高思想品德。给人们以知识、教诲、鼓舞和希望。

酒泉民间故事反映着酒泉人民群众追求理想,渴望平等、和谐、幸福生活的一幕幕憧憬。酒泉民间故事以古朴纯真的文学手段,以通称的人物、广泛的背景,演绎着完整富有情趣的故事情节,展现出广大劳动人民向往美好生活的一缕缕情感;以普通民众的生活遭遇及理想愿望为叙述重心,用巧妙的虚构方式,编织了一篇篇富于趣味性、教育性为一体的篇章。酒泉民间故事种类繁多,有的贴近实际生活;有的饱含神奇幻想;有的诙谐幽默;有的寄寓哲理从而构成一座多姿多彩的民间文学库。集中反映着广大劳动人民的“心声和期待”;蕴含着神奇的幻想色彩;体现着具体鲜明的育人蕴含。如:《一个铜板》这则故事,以老铁匠夫妇在教育儿子方式上所持的不同态度和做法为例:父亲要儿子靠劳动去挣铜板,可母亲却偷偷的给铜板,连续两次都被父亲识破而将铜板掷进火炉,但儿子都无动于衷,因为钱不是他靠劳动挣来的,所以他根本就不知道珍惜。第三次,当他真的凭劳动挣来了一个铜板,父亲又把铜板扔进火炉里时,他向炉子扑去,一边哭诉一边在炉灰中摸索自己挣来的钱,父亲说:“孩子!现在我相信,这是你用汗水挣来的钱。前几次你为什么无动于衷,因为那是别人挣来的钱,掉了好不心痛。这次是你自己用汗水挣来的吧?”故事中的父亲从表象上看不是一位爱孩子的人,做法有点过激,不是一般人的所做所为。但他让孩子从失败中汲取教训,反省过错,重塑品德,体会人的本能和人性的本质。父亲的智谋和挚爱伴随着理性的头脑而显得更为深切动人。更可取的是故事中蕴藏着极为深刻的现代教育理念,堪称育人之佳品。

酒泉民间故事表现人民群众热爱祖国、热爱家乡崇高精神,体现着劳动人民的无私奉献、顽强拼搏的斗志和气魄。酒泉民间故事着力讴歌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模范英雄人物,愤慨诅咒为非作歹,好逸恶劳的坏人坏事。如《霍去病的红柳鞭杆》:“汉朝骠骑将军霍去病在焉支山大败匈奴后,

眼看全胜在望,战马却断了粮草。但他并没有因此而后退,反倒是在苦苦思索解决粮草的办法……。”体现出骠骑将军霍去病没有因处境的凄苦而丧失战胜困难的勇气,表现出坚忍不拔的人生意志。如这种类型的故事在酒泉民间流传的极多。有古代的,现代的,也有发生在今天身边的。对塑造人们良好的思想品质都有着深刻的引导力,潜移默化化的功能是永存的。

酒泉民间故事大多带有“神奇”的幻想色彩,构造出一个个寄托人们理想愿望的梦幻世界。酒泉民间故事素材大多来自于“神话”传说,基于现实生活但又超越实际生活,借助想象,如在梦幻类故事中,现实生活中许多不可能实现的事情却成为可能,故事中的神魔仙怪常常人格化,参与人类生活,比较典型的有《田螺姑娘》、《蛇郎》等。有些描述宝物的故事,更是神乎其神,把个自然物神化成具有神奇魔力的宝剑,把民众日常生活用品,描述成了神奇无比的宝贝、改变主人公命运的救星、惩恶扬善的利器。动物类故事,将动物人格化,通常采用拟人、夸张的修辞手法,使动物开口说人话,并赋予人的思维和情感,将动物的天然习性和社会人的个性联系起来,使得动物世界成为现代人世界的折射和投影。如《猫狗结怨》等故事,形似“动物世界”,却神似“人间百态”,成为两个世界的巧妙融合的天堂,形象的勾勒出了一幅寄寓丰富而又蕴含深刻社会动态、人生哲理的画卷。

酒泉民间故事从内容上看具有隐喻性和象征性的特点。酒泉民间故事运用以物喻人的手法,间接含蓄地反映人类生活现实和理想愿望,追求神似而不是形似。有表达人类“忘恩负义”的短篇。如《吴良心与神鱼》:以打渔为生的吴良心,无意间网到一条十几斤重的大鱼。吴良心欲杀大鱼,在大鱼几次三番的央求下,吴良心以索要钱吊、金元宝为由供养着大鱼。但因贪心当官,将大鱼献出后,人、财两空。得以“不讲天理,没有良心”的说法。还有彰显以弱小者战胜强敌,表达人们与恶势力斗争的勇敢精神和渴望胜利的美好愿望的中篇,典型的如:《小枣核》、《小黄龙》等,这些故事从表象上看,似乎荒诞无稽,神奇怪异,不符合现实,不符合

常规,逻辑性也不怎么样。但正是在这种怪诞离奇的背后,深刻地表现了作者对现实生活的理解和概括,表达了人民大众不拘泥于既成事实、不安于平庸的愿望和追求,在想象和幻想中构造理想的生活,强烈要求现实生活更加丰富多彩。怪诞离奇中包含了严肃的思考,变型中蕴含了象征的意味。

酒泉民间故事在类型上体现出人物设置程序化、类型化,并遵循着“二元对立”的美学原则。酒泉民间故事最常见的有两兄弟、三姐妹或哥仨、姐俩、两个伙伴等,如:《蛇郎》说的是三姐妹,但着重讲的是大姐和三妹的故事,所以仍算是“两姐妹型”。人物形象的表述上大多是美与丑、善与恶、机智与愚蠢、勤劳与懒惰、勇敢与怯懦、憨厚与狡诈、诚实与虚伪等相互对立的性格类型。如《南山与北山》:位于酒泉南北的两座山为了证实谁诚信,订立盟约“白天长,夜间不长”。南山信守诺言,而北山却为了炫耀自己,偷偷违约了。玉帝知道后认为,对不守信用的应该受到严厉惩罚,于是一把火将北山烧成了死山。这则故事酒泉民间广为流传,已成为老人们教育娃娃,要做诚实守信孩子的教材。更有趣的是《真假新娘》的故事,以男子和女子从小的约定——男子错娶新娘——男子奇遇白莲花——男子以花寻到真新娘为主要情节,表述机智、勤劳、憨厚的男子为追求幸福而恋恋不舍的信念。故事情节结构程序化的“三段式”(“三叠式”)结构类故事的情节往往都经历三个层次,如遇到三道难题、经历三次考验、三次历险等。如《巧媳妇》中的巧媳妇在三次反复测验中轻松地获胜表现了巧姑的聪明才干和乖巧伶俐。

五、酒泉民间幽默与笑话

酒泉民间幽默与笑话集结了酒泉劳动人民的智慧与才华,是酒泉民俗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酒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内容之一。酒泉民间幽默与笑话,是经过艺术加工后能引人发笑的谈话或故事,是一种风趣幽默的语言表达形式。民间笑话与幽默是劳动人民在生产实践中创造的流传于民间的能引人发笑并在逗笑的同时阐释着某种哲理的语言文字。有颂扬社会正气的,也有鞭挞、讽刺、揭露社会丑恶现象的;有的是一句短语,有

的则是一个小故事。讲者津津乐道，听者滋滋有味。笑声中体味含义，欢乐中感悟哲理。酒泉民间自古以来就有“人生无处不幽默，人生无处不欢笑”和“笑一笑，十年少”之说。在现实生活中，人们总是乐于开开玩笑，逗乐助兴，增信提神。民间艺人更是乐于创造、收集笑话与幽默，择机传诵，创造欢快的气氛。笑话与幽默应用更多的则是借助人们追求欢笑的心理需求，运用夸张、比喻、借代等修辞手法，乐中带幽，幽中带讽，讽中带理的调处事端，现在已成为化解矛盾，消除隔阂的有效工具。走进乡村院落、学校、机关、车间厂房……。只要听到笑声，十有八九是谁又说了个笑话段子。

酒泉民间幽默与笑话，突出说笑对象的本质特点。酒泉民间幽默与笑话结构精巧，短小精悍，尖锐泼辣。如：近些年盛行炒股之风，社会上部分有点经济实力的人都参与到了炒股之中。为了讽刺这种一哄而上，盲目炒股的现象，酒泉民间流传出了《炒股》：地摊上五个擦皮鞋的摊位，只有一位老大爷在干活，排队等待的客人有好几位，等的很不耐烦了，一位心急的人责问，其他人呢？大爷说：股市交易时间，都去看盘了！客人感慨：这年头，是个人都去炒股了，大爷！您怎么没去炒股啊？大爷不在意地说：我那股票停盘才一个月。这种笑话最初是以口头文学的形式出现的，先由一些有心人从生活中捕捉和挖掘出一些人和事（老大爷炒股），编成小段儿（“大爷！您怎么没去炒股啊？”“我那股票停盘才一个月！”），说给他人听。因为内容有趣、可笑，就会“一传十，十传百”，很快地传播开了。在其流传的过程中，内容又不断地去粗取精，情节又不断地丰富发展，甚至在不断演绎加工过程中自觉不自觉地运用夸张、反复等修辞手法逐步完善成章，慢慢的形成了逗笑的段子。

酒泉民间幽默与笑话富有情趣，能使人情不自禁地发出会心的微笑。酒泉民间有“没有笑话就没有情趣”的俗语。会心的笑是一种由审美情感引发的笑，是愉悦的表现，常常表现出的情趣性使人能够轻松地愉快地接受、掌握且印象深刻、不易忘记。如《口香糖》：一个女同学坐在座位上，嘴里拚命地嚼着口香糖，脚却伸到课桌旁的通道里，被老

师发现了。“小丽！”老师严厉地大声叫她。女同学道：“老师，什么事？”老师指责说：“把口香糖从嘴里拿出来，把你的脚放进去！”

酒泉民间幽默与笑话有弦外之音，言外之意，耐人寻味的含蓄美。酒泉民间幽默与笑话用诙谐的语言、形象化的手法，暗示着自己的想法，启发他人思考，使人们在笑中联想、推断，领悟其中的含义。如：《盖章》：期中考试后，老师让学生把试卷给家长看后写上评语并盖章后交上来。某学生的试卷没有家长的盖章，老师便把学生叫到办公室后问道：“你没有把你的试卷让父母看吗？”学生说：“看过了。”老师有点生气的问道：“那怎么没有家长的盖章？”学生指着手臂上的被竹竿打的伤痕说：“章盖在这里。”

酒泉民间幽默与笑话回味悠长，能使人获得美的享受和体验。酒泉民间幽默与笑话在轻松之中包含着深沉，妙语之中蕴涵着睿智，人们可以在笑声中得到启示，意会到知识的内在逻辑，并进而识别真理与谬误、正义与邪恶，懂得生活的哲理，从而获得一种美的体验。也可以使人们在无足轻重的东西之中领悟更深刻的含义，欣赏到它所放射出的精神火花，并使人笑过之后得到深刻的启迪。如《卖中药》：有个人初次做中药生意。一天有事外出，吩咐儿子看守药店。一个顾客要买牛膝和鸡爪黄连，那儿子愚笨，不识药名，找遍竹筒（盛药材的器具）也寻不到，便砍下自己耕牛一只脚和两只鸡脚售给那个客人。父亲回来知此事后，大笑道：“客人如果要买知母、贝母（中药名），你岂非连母亲也抬出来卖了？”民间笑话与幽默所产生的深邃笑声里蕴含着严肃的话题、高尚的品质、美好的愿望、善良的情意以及崇高的精神等。

酒泉民间幽默与笑话有喜剧美的因素，再现了美感的愉悦性特征。酒泉民间幽默与笑话或为矛盾百出，或为荒唐滑稽，或为巧智奇思。令人发笑的内容，无论是什么审美对象，都能唤起人们审美的喜悦和愉快。通过令人发笑的语言调遣使人轻松、愉快、爽心。综观古今酒泉名人，凡是成就大事者，无不具有幽默说笑的细胞。他们有崇高的理想，渊博的学识，心胸宽广，待人谦和。他们遇大事

而不惊,遇挫折而不怒,而是用小小的笑话来扭转颓势。不必捧腹大笑,不必脍炙人口。有时一个微笑,一个小小的恶作剧,就会让听者豁然开朗,拨云见日。如《踩了一脚》:一位战士在公交车上不小心踩了某小姐一脚,小姐转过头张嘴就骂:“瞎了你?”这位战士却笑着说:“对不起,小姐,我不是故意的。如果你心里觉得不平衡的话,请你也踩我一下?”这一幽默的回答,顿使小姐尴尬得羞红了脸。

酒泉民间幽默与笑话是调节气氛、制造亲切感、消除疲劳和紧张感的一剂良药。酒泉民间幽默与笑话能消除人们的困窘之境。如《彼此彼此》:有位周先生接过陈先生递过来的名片,看了一下说:“东先生,久仰,久仰。”陈先生接过周先生的名片说:“你是吉先生?”周先生听了不高兴:“我姓周,怎么扒了我的皮,我哪里得罪你了。”陈先生说:“我姓陈,兴你割我耳朵,就不兴我扒你的皮?”机智敏捷的对答,诙谐幽默,风趣雅致,留给人们的是无穷的回味、联想、追思。

酒泉民间幽默与笑话是化解人生纠葛、解决夫妻矛盾的稀释剂。如:有对年轻夫妻经常吵得不可开交。太太唠叨不休,骂丈夫是一个好吃懒做、没有出息的老公,说自己是鲜花插在牛粪上。一会儿丈夫从楼梯上走下来,诙谐地向老婆说道:“尊敬的夫人,牛粪到了!”丈夫的自我解嘲,使太太破涕为笑。还如:有位业余作者跟妻子吵架后,几天互不说话。妻子一气之下便写下了离婚申请。这位朋友看出问题的严重性,便灵机一动,拿起一张铅印退稿单,和妻子开起了玩笑。他写到:“来稿收到,经反复研究,不予采用。现将原稿退回。谢谢支持!”其妻看后,忍俊不禁。夫妻和好如初。民间笑话让人感受到谦逊和豁达,能使紧张的气氛变得轻松,使陌生的心灵变得亲近。

酒泉民间幽默与笑话是家庭生活的润滑剂。酒泉民间幽默与笑话能使烦恼变为欢畅,使痛苦变成愉快,将尴尬转为融洽。如:一对夫妻在驾车外出途中吵了一架,谁都不愿意先开口说话。最后丈夫指着远处农庄中的一头驴说:“你和它有亲属关系吗?”妻子答道:“是的,夫妻关系。”故事中的笑话恰到好处地表达了自己怨而不怒的情绪,听

上去自然天成,娓娓动听。

酒泉民间幽默与笑话是社交的兴奋剂。酒泉民间幽默与笑话给人们带来了许多笑声,使人们在笑声中得到启迪,它好像融融春光,好比湿润细雨,好比潺潺流水,它孕育着人与人之间愉快、祥和的气氛,常可以化干戈为玉帛,使剑拔弩张的双方相视一笑,握手言和,使平凡的事情变得富有情趣,为呆板的生活添了一道风景。如《不服“输”》:有个人自称下棋很有名。一天和人家下棋,却一连输了三局。第二天,有人问他:“昨天下了几盘棋?”那人答道:“三盘。”又问:“谁胜谁负?”答:“第一局我没有赢,第二局他没有输,第三局我要和,他又不肯。”这死要面子的调侃让人捧腹,言语中透出一股调皮可爱。

六、酒泉民间歌谣

酒泉民间歌谣是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一种民间文学表达形式,是酒泉人民大众创造的精神文化财富,是酒泉劳动人民生活、生活经历的真实写照,也是普通百姓内心情感世界的真实表露。它流露着民众的心声;反映着民心的所向;抒发着百姓的爱憎;体现着群众的审美情趣;渗透着人民群众对社情的反响。不同时期,会产生不同的歌谣,而不同时代的歌谣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酒泉民间歌谣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酒泉民间歌谣是不同社会时期历史文化的缩影,对了解酒泉社会实情、考察民情民意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反映时代变迁的歌谣有:“五十年代全民炼钢,六十年代全民备荒,七十年代全民下乡,八十年代全民经商,九十年代全民皆当董事长”等。随着现代传播手段的兴起,歌谣创作与流传极为盛行,歌谣内容与当前复杂、多元化的社会发展变化有着深刻而紧密的联系。社会变迁越纷繁复杂,普通民众的草根智慧越显现得出奇。如“酒泉人喜洋洋,农村建起小康房。座座新房真气派,安居乐业把歌唱。感谢政府感谢党,齐心协力奔小康”。还如:“党中央来真英明,放宽政策得人心,搞好生产责任制,田产黄金地产银,放宽政策好处多,恢复农民唱山歌,农民田都分到户,家家粮食收得多,政策威力果然强,冰冻如山怕太阳,家家户户好生产,

每人年年有余粮。”可以说是社会风气、社会现实的真实写照和时代变迁形象的浓缩描绘。

酒泉民间歌谣具有浓郁的地域特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酒泉人民始终过着贫困、苦难的日子。有歌谣曰:“旧社会,苦又累,穷苦人,活受罪,吃了上顿没下顿,衣服补丁擦补丁;一年盼的一年富,年年穿的没裆裤”。这样简洁的言语,真实的写照,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人民当家作主,生活犹如“芝麻开花节节高”。酒泉民间歌颂共产党、歌颂社会主义、歌颂新生活的歌谣层出不穷。如:“旭日初升照田间,讨赖河畔好风光,翻身莫忘共产党,饮水常思挖井人”等歌谣,道出了酒泉人民翻身不忘本的感激之情。又如:“天顶一粒星,地下开书斋,农民学识字,从此无青盲”等歌谣,唱出了党和政府重视普及扫盲教育,人民群众文化素质逐步提高的喜悦心情。中共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了酒泉大地。勤劳勇敢的酒泉人民经过30多年的艰苦创业,“城乡经济大发展,荒漠戈壁建高楼”。历史上曾经是“重农而轻商”的酒泉人,纷纷跳出农门闯市场,迈进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行列。农村人在城里买上了楼房,过上宽畅富裕的小康生活。歌谣曰:“农民承包责任田,生产有了自主权。不愁吃来不缺穿,免了皇粮又补钱。农业生产大发展,人均收入几十翻。免学费、办医保,各种摊派都减少。有事就用电话说,不用人跑受折磨”。这些通俗易懂、朗朗上口、朴实率直的语句,形象的反映出了改革开放以来酒泉人民在物质生活、精神生活等方面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

酒泉民间歌谣具有鲜明的生活气息。酒泉民间歌谣是人民群众抒情言志的口头诗歌,是劳动人民内心世界的自然流露,是广大民众内心情感和现实社会生活的情感抒发,也是酒泉人民群众对社会生活、历史宗教、民俗文化的真实体现。这些通俗易懂的字里行间浓缩了老百姓的喜怒哀乐,涵盖了人世间的悲欢离合。尽管其中也有不少灰色的、庸俗的、垃圾式的作品,但歌谣创作人群之众、传播人群之广、作品数量之多,是任何时代都无法比拟的。如反映吃喝方面的有:过去是“早

晨是硬梆梆,中午是红薯桩,黑(he)了改个顿,还是红薯汤”。现在富裕人家肉都吃腻了:“城里人实在怪,不吃大肉吃酸菜,一日三餐烧一盘,酸菜比肉下得快”等。还如乡村“沼气好,沼气亮,改了厕所改厨房;净了嘴,清了肺,干干净净奔小康”,充分彰显了酒泉新农村建设取得的喜人成就。

酒泉民间歌谣具有独特的民俗色彩。酒泉民间歌谣折射着社会生活纷繁复杂的现象,记录着历史变革的事实和发展的轨迹。不同时期的歌谣是人民群众生活史、心灵史的记录,是社会历史、时代生活、风土人情的一面镜子,是社会现状的一束特写镜头。如“民谣无姐打不成”和“民谣无假戏无真”,反映了酒泉民间青年男女爱慕之情,思夫(妇)之意,婚姻喜悲之感,感情纯朴真挚,说事论理情真意切。如:“麻石头磨盘左转呢,要推个雪花白面呢。肝花肠子都想断呢,把干哥哥几时才见呢。哥哥出门半年了,妹妹揪心似地想着呢;由不得的念叨你,眼泪可股子地淌着呢”,这种滚烫率真的语言,不加任何修饰,把个爱情吟唱的达到了极致。还如“窗子扯得开开的,儿子养的乖乖的。窗子扯得亮亮的,儿子养的胖胖的”、“地上放个箱箱儿,养下娃娃是双双儿,地上放个柜柜儿,养下娃娃是对对儿”。这些简洁精炼、合辙押韵的歌谣折射出了部分民众“多子多孙多福寿”的传统观念。20世纪70年代末,国家强力推行计划生育政策,“若要富,少生孩子多植树”、“生男生女都一样,个个都把学堂上”之类的带有浓郁新生育观的歌谣广为流传,为计划生育政策的贯彻落实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还如:“生出女娃莫嫌弃,女娃一样有价值;不信你看花木兰,替父从军有战绩;生男生女一样好,女儿同样能养老;养男养女都莫慌,只要聪敏又健康,生男生女都一样,长大都能做栋梁”等歌谣的出现,不难看出,“一对夫妇只生一个,不求数量求质量”的生育观已成为现今普通百姓的主流思想意识,促进了国家计划生育政策的落实,助推了社会经济的发展。

七、酒泉民间顺口溜

酒泉民间顺口溜是民间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咏诵在劳动人民日常生产、生活中。产生于口

舌,漂浮在耳边,流传于时空,无名无姓,自生自灭,但可以肯定的说酒泉民间顺口溜是酒泉民间文学艺术之林的一片“绿叶”,它流传于社会缝隙之间,是老百姓刚刚随口谈起的,有的来自于舞台剧本,有来自街头巷尾,有的来自宴席酒会……不管它源自哪里,其丰富多彩的内容或褒扬,或称颂,或劝诫,或教育,或宣泄,都是酒泉老百姓的集体创作、集体学说、集体传承,不仅具有广泛的民俗特色外,还具有深邃的地域文学特点。

酒泉民间顺口溜易于上口,幽默诙谐,生动形象。如《喝酒规则》“感情深,一口闷;感情浅,舔一点;感情薄,喝不着;感情厚,喝不够;感情铁,喝出血。”读来易于上口,形象逼真。一些顺口溜句式长短不一,如“蚊子踢死驴,蚂蚁踩塌桥,小老鼠抓住个大狸猫”。从语音、语法到修辞表现出一套完善的系统特色,其在语音形式上最大的特点是“押韵”。如《防病养生》“衣服/早补/补丁小,有病/早治/痛苦少。常洗/衣服/常洗澡,常晒/被褥/疾病少。生活/一懒/生百病,日子/一勤/生百巧”,语音节奏鲜明,富有极强的节拍感。

酒泉民间顺口溜用词精当,鲜明的形象色彩跃然纸上。如“穿着料子,挺着肚子,拖着调子,画着圈子”。酒泉民间顺口溜讲究句式排列整齐,语句与语句之间多用相等的字数,相同的句式,甚至词性都得到了对应。如“花大笔大笔的钱,流大把大把的汗,喝大口大口的油”。有些酒泉民间顺口溜搭配异常,看似不合规范其实自有奥妙在其中。如“梳着失恋的头型,迈着多情的脚步;长了一双破烂的眼睛,还到处寻找爱情的雨露”。有些酒泉民间顺口溜省略甚多,不少句子看上去没有“脑袋”,缺少主语。如《拒贿歌》“明含着笑,暗张着嘴。芝麻勾西瓜,小鱼钓金龟。送烟酒,腐蚀胃。送糕点,堵住嘴。洁身的,拒污秽。上钩的,拉下水。得意的,你犯罪。甜在表,毒在内。同志们啊,劝你莫受贿”。

酒泉民间顺口溜在修辞方面运用恰当。如用比喻表白爱心的顺口溜“世纪广场是你的位置,胡杨树叶是我的心。大湾城是我们的历史,万里长城是我的情”。有采取隐喻的手法抒发爱慕之情的,

如《我心中的你》:“你是早上的面包,夏天的雪糕,冬天里的棉袄,黑夜里的灯泡,山东人的大蒜,四川人的辣椒”。还有采取类比的手法歌颂党的惠民政策的顺口溜,如《看病》:“过去日子不怎好,生了重病医院跑,回家自己掏腰包。如今党的政策好,有病就往社区跑,普通住院也报销”。酒泉民间顺口溜大多用“的、子、了、要”等字、词,运用比喻、借代、双关、夸张、反复、仿用、排比、对偶、顶针、回环、反语等传统修辞格创作而成。如《想当初看如今》:“想当初,牙如铁,生吃牛肉不用切,现如今不行了,每餐豆腐和猪血。想当初,腿如铁,日行百里不用歇,现如今不行了,出门都要奥迪接。想当初,耳如铁,天上下雪有感觉,现如今不行了,雷鸣电闪都无知觉。想当初,发如铁,头发硬的顶翻过,现如今不行了,满头顶着浪柴沫”。除了以上方式外,顺口溜产生的方式还有很多。

酒泉民间顺口溜反映的是民众的心声和日常生活。酒泉民间歌谣表达方式千奇百怪,从思想和内容方面分析,可以分为褒扬和贬抑两大类型。从产生的方式来看,酒泉民间顺口溜最常见的是模仿衍生,如在小学生中传诵的《李白家的月饼》“窗前明月光,有饼没包装。举头望明月,低头闻饼香”。在中学生中传诵的《徐志摩家的月饼》“悄悄的我收了,正如你悄悄的送。我挥一挥衣袖,不透露一点口风”。偶尔在朋友的书信中仿写的顺口溜《琼瑶家的月饼》“我有一块月饼,不知与谁能共?多少秘密在其中,收饼之人能懂,饼外情深意重,饼内目的重重。迎来送往俱无踪,徒留一帘幽梦”。有的顺口溜采取一问一答的形式。如《吹牛》“天空为何那么黑?只因牛在天上飞。为何牛在天上飞?只因你在地面上吹”。

酒泉民间顺口溜伴随着有趣的故事应运而生,读来忍俊不禁。酒泉民间顺口溜的传播速度和以前讲故事似的口耳相传已是今非昔比,网络顺口溜和手机顺口溜虽为老百姓提供了更加强大的宣泄渠道,但它却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对社会有减压作用,另一方面也将一些负面因素“放大”,蛊惑社会,欣赏顺口溜应当明辨事理,摒弃糟粕。如:一天骤降大雪,滴水成冰,县令、秀才、财主

三人在一起饮酒赏雪。席间,三人吟诗颂雪。秀才吟道:“大雪纷纷落地”。县令续曰:“都是皇家瑞气!”财主吟道:“再下三年何妨?”这时,窗外有人接了一句:“放你娘的狗屁!”三人探窗一看,原来接诗的是个在雪地里冻得瑟瑟发抖的乞丐。一首顺口溜与四人的地位、心胸高度吻合,可谓寥寥四句,境界全出,被誉为“古今绝对”。

酒泉民间顺口溜是褒扬社会正气,弘扬社会精神文明的“窗口”。时常挂在酒泉老百姓口边的顺口溜,边创作,边咏诵,边修改,边传播,构成了对社会正气的高度赞扬和对社会畸形的严厉批评。如《部队新气象》“部队生产支援地方,团长政委治军有方。自力更生储备物资,劳动模范得到嘉奖。刻苦训练枪炮鸣响,争先创优年年中榜。各大军区兵多将广,富军强兵保卫国防”体现了老百姓热爱祖国,热爱军队,热爱军人的思想。先进性教育活动在全市全面启动后,顺口溜随之产生“端正态度最重要,学与不学两个样,做到老来学到老,先锋模范作表率,先进性质来体现,共产党员是旗帜,上为国家分忧愁,下为百姓解难题,位卑未敢忘忧国”。这首顺口溜既浅显易懂,又反映了民心。如《新年祝语》“爱情洋洋得意,身体阳刚有力,事业扬眉吐气,生活幸福甜蜜”道出了幸福的酒泉人喜悦的心情。

酒泉民间顺口溜中蕴含着规劝和善意提醒。如2003年“非典”期间流传的“非典在作怪,病毒传播快,通风勤洗手,口罩酌情戴,重视不恐慌,健康好心态,我一份关爱,你健康常在”。劝人们采取勤洗手的办法预防疾病的传播。现在,健康成为大家茶余饭后的热门话题,如“个人少受罪,家人少受累。节省医药费,造福全社会”。从“小家”说到“大家”,唱出了每个酒泉人的共同心声。还如《教子歌》“出自己的力,流自己的汗,自己的事情自己干。自己吃的自己的饭,靠人靠天靠祖宗,不算是酒泉汉”等,都是教育大众的典范。过去个别地方喝酒风盛行,引起了全社会的关注,顺口溜“喝得家庭没油水,喝得伤肝又伤胃,喝得老婆分开睡,喝得送了黑发送白发”,以此规劝人们戒酒。

酒泉民间顺口溜是社会的“天气预报”和“晴

雨表”。由于顺口溜的特殊性,出口成章无法署名,也就谈不上承担责任和风险,因而,有的顺口溜锋芒毕露,甚至一针见血。如《别看》“别看咱们厂子闲,办公大楼赛宫殿。老板坐着豪华车,三天两头去赶宴。别看我们厂子亏,老板天天端酒杯。别看厂里经费少,时常还往国外跑。别看厂里已超员,年年还有‘编外编’。别看咱们厂子穷,办公大楼气势雄。别看咱们底子薄,吃喝费用没少过。别看税收年年减,豪华装修年年搞。”对食品问题流传着“吃荤的怕激素(瘦肉精),吃素的怕毒素(残留农药),喝饮料怕色素(工业染色剂),能吃什么心中没数”。老百姓对社会腐败现象的挖苦颇具耐人寻味。如“喝烧酒七八两不醉,干工作什么都不会”,揭露了个别工作人员身上存在的消极庸俗现象。

酒泉民间顺口溜是老百姓放松身心、取笑逗乐的一种方式。酒泉民间顺口溜在调侃情爱的同时,又隐含着对“出轨”现象的谴责,如“老婆是电视,情人是手机,在家看电视,出门带手机;破产卖电视,发财换手机;偶尔守电视,整天玩手机;固定的电视,移动的手机;电视频道免费,手机欠费就停机”。如《喜新厌旧》“握着老婆的手,好像左手握右手;握着小姐的手,好像回到十八九;握着女同学的手,后悔当初没下手;握着情人的手,酸甜苦辣全都有”,老百姓既宣泄了日常生活的各种压力,又给日常生活增添了活跃的气氛。如《恋爱果》“相恋相爱青苹果,暗恋相爱无花果,一见钟情开心果,自由恋爱无结果,真心相爱吃糖果,偷情相爱吃苦果,闪电相爱吃禁果,多情相爱吃后果”。还有一些涉及生活俚语的顺口溜也值得读一读,如《女人的素养》“漂亮的女人养眼,聪明的女人养脑,善良的女人养心,温柔的女人养神,才气的女人养性,健康的女人养身”蕴含的哲理具有借鉴意义,它“润物细无声”的附着在每一个人的周围,其传播范围非常广阔,传播的形式也多种多样,在朋友聚会中、英特网上、茶楼酒肆、田间地头获得这些信息。

(作者单位:金塔县地方志办公室)

《庆阳市志》初稿评审暨《乾隆》《新修庆阳府志》《民国》《庆阳府志续稿》点校本发行会议



2013年12月26日《庆阳市志（1986-2010）》初稿评审暨乾隆《新修庆阳府志》民国《庆阳府志续稿》点校本发行会议在庆阳举行。会议由副市长、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常务副主任辛刚国主持，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主任栾克军书面致辞，市委、市人大、市政府、市政协、军分区分管领导出席会议。省地方志志办副主任钱旭出席会议并讲话。咸阳、延安、天水、平凉、定西等周边市及陇东学院专家、学者，庆阳市各部门、各县区负责人、退休老干部代表、修志专家等70多人参加会议。

《庆阳市志（1986-2010）》，采用小编章体，正文设65章、390多节、180多万字，是《庆阳地区志》（通志）之续。该志2009年正式启动编纂，2013年11月完成初稿。

乾隆《新修庆阳府志》42卷60余万字，汇集了庆阳自唐以来到清乾隆一千余年间自然、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民俗等方面的史料。民国《庆阳府志续稿》记录了清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至民国二年（1913年）150多年间发生在庆阳的重大事件。两志均由庆阳市地方志办公室组织力量，利用两年时间，予以点校，分别由中华书局、甘肃文化出版社出版。

马世英 书法作品欣赏

